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民族救星

 **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毛泽东之路(2)  
民族救星

## 第一章 奠基西北

### 一 柳暗花明

中国的西南部，云贵川交界地区，山林莽莽，沟壑纵横，河流湍急，道路崎岖。

遵义会议后，红军部队在这千山万壑之间辗转行军，以求摆脱敌人。这时的中央红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已没有任何重武器，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和山炮，蒋介石调集约140个团30余万人的兵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堵截，企图歼灭红军于黔北地区。能否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为党和红军寻找新的落脚点，是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新的考验。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了遵义城。

人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在春寒料峭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虽饥寒疲惫却斗志昂扬。毛泽东也行进在队伍中间。途经娄山关时，毛泽东向身边的警卫员说，这娄山关像是贵州的大门，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警卫员劝他骑马上山，他却说我自己可以走。他拄着木棍，行走在雪后泥泞的山路上，双脚沾满泥浆，不时地同身边的人谈论着……

这种大踏步地进军，已不再是长征初期的退却逃跑主义，而是在毛泽东指挥下的迂回曲折、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揭开了战略转移中争取主动的崭新局面。按照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部署，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沿大娄山脉向川黔边界的赤水方向进军，准备经川南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攻。

1月24日，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到达土城，随后继续北进赤水，但在途中遇敌，战斗未果。1月27日，左路纵队红三军团亦抵达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在进军土城途中，边走边察看地形，只见道路两边均是山谷地带，如敌军孤军深入，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峰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合围歼灭敌人。27日下午，中路纵队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也抵达土城地区。

土城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镇，顺着山坡与小河之间的小路走进镇里，街巷几乎全是石板路。毛泽东到达土城后，住在一家绸缎铺后面的一孔大石洞里。在土城，毛泽东得知川军两个旅四个团正向土城方向前进，遂决定集中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在青杠坡地区歼灭尾追之敌郭棋勋师，打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通道，在中革军委部署战斗的会议上，毛泽东形象他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想一口是吃不下的。于是，他命令红一军团于28日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土城镇以东三至四公里处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军以迎头痛击。为打好这一仗，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往红三军团前卫第四师指挥，参谋长刘伯承到红五军团指挥。

1月28日凌晨，红三、五军团向土城以东约4公里的青杠坡之敌发起进攻。战斗异常地激烈，枪林弹雨中红军勇猛冲锋，一度占领敌人的主要阵地——银盆顶。但在敌之增援部队赶到后，红军阵势立即处于危急状态。

此时，毛泽东已发现情报有误，原以为敌军是两个旅四个团约六七千人，而实际上是四个旅八个团共1万多人，而且川军的战斗力比黔军要强得多。

就主观指挥而言，令红一军团北上奔袭赤水城，分散了兵力，未能集中优势兵力。毛泽东意识到战局的严重性，立即派人通知红一军团急返增援，但红一军团返回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赶到。而此时战斗愈益激烈，红五军团阵地被敌突破，红军伤亡重大。敌抢占山头，向土城进逼，一直打到设在镇东白马山的军委指挥部前沿。白马山后就是赤水河，若不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红军只能背水一战，局势岌岌可危。紧急关头，朱德亲临前线指挥。战士们见总司令直接参加战斗，士气大增。但敌人仗着兵多势众，武器优于红军，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向红五军团阵地进攻。鏖战多时，有的红军战士的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便同敌人展开白刃肉搏。刀光血雨中，敌我双方均有伤亡，红军战士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

在敌军打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毛泽东命令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干部团是由原红军大学和公略、彭杨两所步兵学校及特科学学校合并组成的，英勇善战。干部团以其出色的战斗力击溃了敌军的进攻。下午两点多钟，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迫使敌军退却。红三军团也牢固控制了一块高地。

毛泽东此时深感土城之战不能再打下去了，一是因为地形于我不利，河流多；二是敌大批援军将要赶到，敌强我弱；三是这一仗再打下去将是一场消耗战，我军损失大大。因此，在阵地巩固之后，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人开会。根据原定由赤水河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这一情况，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毛泽东还提出，为渡过赤水河，军委领导实行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拂晓前架好浮桥，另外，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由此，红军开始了一渡赤水河的行动。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支流，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穿行于川、滇、黔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 400 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宽处有三四百米，窄处一二百米。在敌军蜂拥而至的严峻时刻，能否在赤水河上迅速架起浮桥，保证红军主力渡河，成为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深知干系重大。28 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询问情况，鼓动大家加快速度。到 29 日拂晓前，终于搭好了浮桥。红军部队将笨重物资扔进赤水河中，趁夜雾尚未散去，分三路在猿猴（今元厚）、土城一带胜利地渡过了赤水河。

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过河，红九军团和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担负起阻击敌军的任务。二师四团在青杠坡与追击之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几乎每个连都伤亡大半。当四团完成阻击任务，最后几名红军战士渡过赤水河时，敌人已尾追到河边。红军战士立即砍断浮桥的缆绳，烧毁浮桥，将敌阻断于赤水河东。红军暂时摆脱了敌军的追击。

一渡赤水是在上城之战失利，红军不得不放弃北渡长江入川的意图之后所采取的行动。土城之战是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指挥的第一仗。对身经百战的毛泽东来说，这一仗也许是得不偿失的。但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过的，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而毛泽东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十分善于总结经验，审时度势，化被动为主动。当他看到战局不利时，果断地提出放弃

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西渡赤水，终于暂时摆脱了敌人。后来红军在回师东进取遵义途中，有的敌军俘虏曾不服气他说：“你们要在那里（指泸州至宜宾间）过江，早叫我们吃掉了。”红军战士则说：“你当了俘虏也没变得聪明些，中国这样大，路这么多，我们哪里走不得，为什么一定要往你们乌龟壳上碰！”

红军西渡赤水后，暂时甩掉了川黔之敌，从2月7日至9日先后到达云南扎西镇（今威信）。

扎西镇坐落在群峰起伏的乌蒙山中。这时，正值春节。冬末春初的高原，气候寒冷，天空雪花纷飞。在这里，党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会中讨论了红军整编问题和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最后决定以云、贵，川三省边界地区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为此，中革军委于2月7日向各军团首长发布了《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

红军连日奔波作战，生活极为艰苦。为了统一全军思想，鼓舞士气，党中央在扎西向军内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还总结了上城之战的教训，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毛泽东认为主要教训有三条：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有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大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红一军团北上。同时毛泽东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追之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按照扎西会议的决定，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两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为使部队适应辗转行军、连续作战的需要，必须放弃许多笨重物资。毛泽东为此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卫生部有一架调光机，他们舍不得丢掉。卫生部负责人来找毛泽东请示。毛泽东看着他说：“你们那个‘爱克斯光’机听说要几十个同志轮流着抬，爬山涉水大家都很辛苦。离开江西以来，你们用过吗？”卫生部长说：“没用过。”毛泽东说：“就是嘛！没有用的东西，还要好多同志抬着它。你让这些同志到连队去，都是好战士嘛！”毛泽东还说，“在遵义就讲了，我们虽然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可不能什么都带上，像大搬家一样。我们要打破敌人的堵截，到抗日前线去。这是目前最紧要的。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就是做这件事，现在在扎西还是要做这件事。”卫生部长仍有点恋恋不舍，自语般他说：“真可惜！”毛泽东说：“可惜什么？我们早一天赶到前线去打敌人，这些东西敌人都会给你准备好的。”

整编后，部队更为精干，为在云贵川的沟壑之间辗转作战作好了准备。

此时，蒋介石预期红军将向长江进军，便调集薛岳兵团和云、贵两省敌军组成“追剿军”第二路军，企图把红军合围剿灭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西和以北的狭窄地区。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利用敌人判断我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乘黔北敌军薄弱，出敌不意，先入川南，再重回贵州，使蒋介石合围计划落空。

1935年2月11日，在云贵山区的寒春和冷雨中，毛泽东和部队又出发了。红军踏着泥泞的山路进入四川的叙永、古商一带。一天，毛泽东在一个叫白沙的村子刚住下，军委二局一位负责同志就跑来向毛泽东报告，敌军正

向扎西方向部署进攻。这种动向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因而他高兴他说：“那好！”敌军显然摸不清毛泽东的意图，行动总比红军晚一拍。

红军离开叙永、古商后，于2月18、19日先后到达赤水河边，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毛泽东在太平渡同参谋人员一起登上了一只尖头小船，向对岸驶去。船小人多，颠簸得很厉害，不时有水溅到船上，打湿了他的衣衫。他站立在船头，和摇橹的群众谈笑风生，此时，部队中虽然还有些人不理解这种忽东忽西战术的目的是什么，但毛泽东心中已规划好了二渡赤水后打一个遵义之战的全部蓝图。

同毛泽东全局在胸、充满信心的状况相反，蒋介石一直没有搞清红军的真正用意，红军渡过赤水，矛头所指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打乱了敌军部署。敌又慌忙调集兵力，企图阻挡红军进入遵义，挺进黔北。但敌之主力大多聚集在扎西附近，重新部署兵力尚需一定时日。毛泽东的战术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毛泽东决定，乘迫击之敌尚未到达之时，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

2月24日，红军占领桐梓。当晚，毛泽东到达桐梓。他一到住处，马上同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开会，商讨攻打娄山关计划，彻夜未眠，直至东方发白才散会。

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之巅，位于桐梓、遵义两县交界处，是由川南通往遵义的必经之地。娄山关两侧群峰耸立，怪石林立，周围是悬崖峭壁，只有中间一条路曲折盘旋，地势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能否夺取娄山关，成为遵义之战成败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把这一硬仗交给了彭德怀，由他指挥一、三军团主力攻打娄山关。

2月25日晨，月色未褪，晨霜满地，战士们披星戴月，昼夜兼程赶往娄山关。连日来的行军作战使战士疲惫不堪，但部队仍以强行军速度赶路，终于抢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赶到娄山关。英勇善战的彭德怀以正面进攻、两翼包围，迂回的战术，猛攻娄山关，终于拿下了娄山关关口，占领了娄山关左侧的制高点金山。后战斗几经反复，枪弹声嘶杀声震荡峡谷。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终将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4个团的敌军大部歼灭。27日，敌残余部队沿川黔路逃往遵义城。

攻下娄山关，再取遵义就如探囊取物。遵义城以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为界分为新城老城。2月27日下午，红军逼近遵义城，黄昏时便已控制了新城。又经一夜激战，红军于28日凌晨占领了遵义。从娄山关到遵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主力已被歼灭。

攻下遵义后，毛泽东沿着一渡赤水前的行军路线又来到了娄山关。一个多月前，红军撤出遵义，途经娄山关。那时毛泽东虽重回领导岗位，但红军一直处在长征初期失利的阴影笼罩之下，红军前途未卜。此番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娄山关。自古为兵家必争的娄山关，而今就在红军战士脚下，在毛泽东的脚下。毛泽东登上山顶，向前望去，满山都是红军部队。与红军行进的方向相反，大批俘虏正往桐梓方向走去。毛泽东在山顶和战士们谈话，询问战斗情况。战士的伟绩，指挥者的胜利，诗人的豪情，一起涌入他的心头。一首战士的颂歌油然而生。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真实地再现了红军从拂晓至黄昏鏖战在娄山关的战斗场面。从此

娄山关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越过娄山关，战斗仍在继续。毛泽东一贯主张，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70\_0011\_1.bmp}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娄山关还在酣战时，他就在考虑并部署以后的战斗了。按照他的意图，红军拿下遵义后，迅速控制了城外的制高点老鸦山、红花岗、插旗山等地，以待国民党中央军增援王家烈余部时予以迎击，实现遵义之战的全部部署。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长征以来一直追在红军后面的蒋介石的嫡系吴奇伟的五十九，五十三两个师，正昼夜兼程向遵义赶来，在距遵义 10 多里的忠庄铺设立了指挥所。

2 月 28 日，战斗打响。吴奇伟部骄横一时，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多次向遵义城西南侧的老鸦山一线阵地进攻，老鸦山主阵地一度丧失。红军战士与敌人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在最危急关头，毛泽东、朱德命干部团出击，配合三军团的部队勇猛反击，夺回主峰阵地。红军虽付出不少代价，但将敌人阻于山下。

正当三军团的士兵在老鸦山一线全力以赴坚守阵地之时，毛泽东和朱德命令一军团出动。一军团以一部兵力绕至敌侧翼准备出击敌后续部队，又以一部兵力直插敌军指挥所所在地忠庄铺。黄昏时我军实行全面反击。在老鸦山，敌阵营一片混乱，打不能打，跑不如地方军阀部队跑得快，两个师的大部在老鸦山一带就丧失了作战能力。吴奇伟见势不妙，下令逃跑。

毛泽东深知追击战对于整个战役的重要，下令一、三军团不顾一切疲劳，乘胜追击逃敌，要扩大战果至消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

红一、三军团遵照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紧紧跟踪吴奇伟部，追了整整一天，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吴奇伟马不停蹄，逃至乌江边。尽管薛岳有令不得撤回乌江南岸，只能死守北岸，但吴奇伟顾不得这许多，在少数侍从的保护下逃往南岸。其他部队尚未过河，红军即赶到。吴奇伟见状匆忙下令砍断南岸的桥索，浮桥一断，吴奇伟部下 1800 多人乱作一团，丢盔弃甲，只好向红军缴械投降。

3 月 1 日，遵义战役结束。5 天中，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敌两个师又 8 个团，共计 3 万多人，缴枪 2000 多枝，子弹 10 万多发。这是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遵义战役进行时，按照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部署，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担任牵制敌人的任务。他们以一个团的兵力，在良村、温水一带辗转作战，拖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 3 个旅共 9 个团的兵力。待敌发现这不是红军主力，转而追踪红军主力部队时，娄山关、遵义早已被红军攻克了。

事实表明，毛泽东用兵艺术的确出神入化。一个月以来，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我军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军部署就绪，我军却又打到别处去了。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指挥艺术，此时趋于成熟。

在红军欢庆胜利之时，蒋介石却在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

辱”。为雪遵义之耻，他亲自策划对红军的下一步围攻，调兵遣将，令郭勋祺3个旅会同黔军向遵义东北进攻；周浑元纵队的3个师由仁怀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刀靶水地区，策应周浑元部作战，防止红军向遵义东北、西南方向运动。蒋仍估计中央红军有东渡乌江与萧克、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可能，因而又在乌江沿岸作了周密部署。

红军为便于统一指挥作战，3月4日，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决定攻打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师。但由于敌人固守在工事里不肯出来，红军未能与之决战。于是军委决定主力部队至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迎敌。

此时，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打鼓新场为黔北重镇，王家烈残部在此据守。中央在鸭溪开会讨论这一问题（遵义会议后，凡有重大作战行动，张闻天总要召开20多人的会议讨论决定）。当时，出席会议的人大多同意进攻打鼓新场。而毛泽东认为，滇军主力正在向打鼓新场一线运动，此战断不可打。但军委大多数同志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坚持己见，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出辞职。事实上，如果红军进攻打鼓新场，不但面对黔、滇军，周浑元、吴奇伟、孙渡、郭勋淇部也会迅速赶来，红军将面临身陷重围的境地。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的意见也并非新鲜事。在中央苏区时，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则不同。现在是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军，红军又处于穷山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成千上万人为之流血奋斗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因此，毛泽东不愿轻易放弃个人主张，表示只好服从。会后，他连夜找到周恩来，让周恩来暂时晚一点发布命令，还是想一想，并力陈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害关系，说服了周恩来收回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周恩来是在遵义会议上被委托为对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他的态度在党内、在军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恩来的转变，最终促使多数人转变。第二天，中央军委发出指令，收回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事实表明，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确有远见卓识的目光。就在军委发布命令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当天，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同时也为了适应频繁战争需要，改变那种遇有重大行动就召集20多人的中央会议的情况，保证军事领导的集中统一，根据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这为毛泽东进一步施展他的军事才华提供了又一个便利条件。在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将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月的黔北，春光明媚，景色宜人。在这一片诱人的春色中，最令蒋介石迷惑不解的是红军的行动。3月1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为贯彻政治局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决定攻打鲁班场。红军本想在运动中歼灭敌军，但驻守在鲁班场的周浑元部队却固守在碉堡不动。薛岳怕周部被红军吃掉，令吴奇伟率部增援。待吴奇伟抵达仁怀时，红军又突然撤出战斗北进，于3月16日攻占茅台。毛泽东品尝了举世闻名的茅台酒，随即率部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红军一过河，毛泽东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一个团向北行军到达四川的古蔺县。该团沿途虚张声势，行进中拉开距离，红旗飞扬，标语传单四处散发，引人注目，作出一种红军主力要北渡长



江的姿态。兵不厌诈，毛泽东的用意就是要迷惑蒋介石，让他以为红军要渡江。

果然，蒋介石以为红军徘徊于川滇黔边境，是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他在这一地区部署了 50 万至 70 万部队，各部队之间的防区紧密衔接。他绝没有想到，当各路敌军向川南纷进之时，毛泽东又突然率部于 3 月 21 日晚，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然后又掉头南下，从纷纷向北追击的敌军间隙中穿插疾进，与敌相对而行，跳出了蒋介石严密部署而尚未完全合拢的包围圈。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薛岳仍说共“匪”由茅台渡河后分两路西窜，直至 26 日仍判断红军从古商西窜的可能性较大。蒋介石得知红军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后，大力恼怒。他飞抵贵阳，亲自督战。但他没有想到，随之而来的事态变化更令他措手不及。

遵义会议上，曾有人讥笑毛泽东不过是读了点“孙子兵法”而已。毛泽东立即反问：你晓得孙子兵法有几章？现在，正是源于中国古代兵法的声东击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避实就虚等战术，把红军从危局中解救出来，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活剧。而毛泽东在导演这些活剧中，为这些源远流长的传统兵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还在第三次渡赤水河时，毛泽东就在策划大规模的战略行动。本来，遵义会议后红军在云贵川一带与敌人兜圈子，就是试图建立根据地，寻找一个休养生息的落脚点。但事实证明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很大。因此，部队应实现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为此需要创造渡江的条件，寻找合适的渡江地点。毛泽东把这一地点选择在云南。他精心设计了三渡赤水，将敌主力引向川南，再突然四渡赤水，用意就是调动敌人尤其是滇军，为实现战略目的创造条件。他曾说，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行动。

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突然给红九军团下令，要他们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上大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佯装红军主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红九军团不负重托，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制造假相，机动作战，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与此同时，红军主力一、三、五军团在 3 月底开始南渡乌江。3 月 31 日晚，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作为先头部队抵达乌江边。当晚，天气骤变，狂风裹挟着暴雨扑向岸边与江面，湍急的江水格外翻腾。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红军战士以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战胜了乌江天险，打开了通往南岸山上的通道，控制了渡口。天亮后，红一师主力全部过江，随即乘胜迂回到乌江下游的几个渡口的后方。红军主力除九军团需牵制敌人外，全部渡过乌江。敌主力被甩在乌江以北。

南渡乌江后，毛泽东将一、三军团分开，让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扬言要打贵阳，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在贵阳城外摆开阵势，把通往贵阳方向警戒起来，而红军主力却从离城 20 多公里的地方往西南行进。

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城督战。由于主力被调往乌江以北“围剿”红军，因而贵阳兵力空虚，只有第九十九师 4 个团，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得知红军正准备进攻贵阳后，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并准备好了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毛泽东的“诈兵”术的确成功。不仅敌人迷惑不解，信以为真，就连红军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明底细，不知其详，当毛泽东和身边警卫人员到达离贵阳很近的息烽县境内，听说先头部队离贵阳只有 20 多公里时，都纷纷议论：

“这下蒋介石可跑不了啦！”他们止不住问毛泽东：“主席，这次我们要真打贵阳了吧？”毛泽东却笑答：“不忙，不忙！”毛泽东并非真想攻占贵阳，他只是要调动滇军。果然，蒋介石电令滇军孙渡纵队火速赶到贵阳。孙渡一到，蒋介石大为高兴，又是嘉奖又是犒赏。而红军却从贵阳至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部队一过湘黔公路，甩开了敌人，如同插上了翅膀，一日行军120里，连克数县，渡过北盘江，尔后进入云南境内。这一带敌兵力空虚，且多为地方保安部队，因而红军进兵顺利，几乎日下一城。

在云南境内，由于军阀龙云把精锐部队派往贵阳，省内无重兵。4月23日红军进入平彝县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连呼“上当！上当！”但悔之亦晚。他命薛岳亲率周浑元、吴奇伟、孙渡、李温市各部及黔军尾追红军。薛岳以孙渡为前锋，分三路向红军袭来。

进入云南以来，毛泽东一直同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一起，走在部队的前面。往往是干部团的一个营在前，毛泽东及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干部团的其他部队在后。有几天连续下雨，河水上涨。毛泽东骑在马上，在雨中徐徐而行，显得有些忧虑。他对陈赓和宋任穷说：现在，我们先后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了贵阳和昆明，这便于我们采取突然行动，神速地抢占金沙江渡口，全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至此，陈、宋才明白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为了实现抢渡金沙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毛泽东经常通过干部团的电台与各部队联络。现在，他又通过电台发布指令，施行他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他要红一、三军团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又让他们迅速向北穿插；留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的滇黔边继续牵制敌人。他要让敌人相信，红军将取昆明。

一军团的红四团奉命佯攻昆明。夜晚，毛泽东来到红四团，向干部们讲述了形势和任务，鼓舞大家的斗志，佯攻昆明的部队在昆明附近大造舆论，到处张贴标语：“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先头部队一直抵达离昆明仅30多里的地方。城内的外籍人员纷纷撤离昆明。龙云急电令孙渡回昆明，请求薛岳援助，并部署滇军严密防守。毛泽东的目的已达到：让敌军调往昆明守城，我军则趁机北渡金沙江。

就在佯攻昆明大造声势，搞得热火朝天时，红军主力突然兵分两路直扑金沙江。

4月27日，红军在曲靖公路上伏击了一辆汽车，缴获了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及大批礼品。毛泽东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他还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当晚，这份地图就派上了用场。作战参谋在刚缴获的地图上，用红铅笔标出了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最近的龙街、皎平、洪门三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

4月28日，为确定党和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再次集会，讨论如何部署军队、抢渡金沙江以及北上四川等问题。会议在作战科办公室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三条意见：

一、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

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调集近 70 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为其先锋，离我后卫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三天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从进入云南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地图上，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地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随后，毛泽东对渡金沙江的具体方案作了详细的部署。会后，孔石泉、王辉按照毛泽东的发言记录，拟写了《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经周恩来审阅后于 4 月 29 日发出，《指示》指出，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军团为左纵队，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央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前锋，抢占皎平渡口。五军团作后卫，诱惑敌人，使其以为我军仍要进攻昆明。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选择渡江地点，过江后与主力部队会合。

四月底的云南天气渐热，满山遍野郁郁葱葱，花木繁茂。战士们无暇欣赏南国春色，只是日夜兼程，以每日至少 50 公里的速度急行军。毛泽东指示务必在 4 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因敌尾追部队只需三四天路程即可追上我军，所以毛泽东强调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红军三路纵队沿途不与敌军恋战，飞快驰向金沙江边。各路大军按指定时间到达各渡口。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为长江上游的一部分。奔流的江水冲入海拔 5000 多米的哈巴大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削出了 3000 多米的大峡谷，即举世闻名的虎跳峡。金沙江的龙街渡口和皎平渡口，都是较大的渡口。金沙江盛产黄金，江底流沙聚集，江边受日光照耀，闪闪映出金黄色。金沙江流经四川、云南交界处的部分称金沙江，四川宜宾以下称长江。金沙江两岸都是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自皎平渡至江边山势更陡。

当红军抵达指定渡口后，发现因地势、水流及敌机袭扰等原因，在龙街与洪门渡口都无法过江。于是全军都集中到皎平渡。

干部团于 5 月 3 日夺取皎平渡后，刘伯承与宋任穷过江察看了渡口，认为无法架桥，只能靠船只运送部队。先头部队先后找到 6 只船和 1 只渔船，这 7 只船就成为数万红军的渡河工具。

随干部团行军的毛泽东一到江边，就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研究渡江问题。天将拂晓时，毛泽东和干部团陈赓上船，渡过了金沙江。一下船，毛泽东又同刘伯承商议红军过江问题去了。警卫员陈昌奉为毛泽东选择了江边山上的一个潮湿的山洞作为住宿、办公的地方。他为找不到房屋或好一些的地方过意不去，毛泽东却不在乎，认为住在山上石洞里可以看到对岸部队行

军和渡江的情况。他把两个装文件的铁皮箱子对在一起，当作办公桌，在石洞里指挥千军万马渡江。当红一军团聂荣臻等人渡过金沙江时，毛泽东正在石洞里等候他们，一见他们便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为了抢时间，7只船昼夜不停地运送红军。经九天九夜苦战，红军全部人马终于及时渡过了金沙江。红军渡江两天以后，国民党中央军才尾追到金沙江边，而红军已到了会理。敌人只得望江兴叹。

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战役也就结束了。毛泽东曾对陈毅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毛泽东自1935年1月重返领导岗位以来，指挥红军千里转战，高度机动，大范围的迂回，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示形于东而形于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可谓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就连毛泽东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昆明，至渡金沙江，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确实高明。从此，红军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没有辜负遵义会议及全军将士的重托。

渡过金沙江不久，1935年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城外的一个叫铁厂村的地方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确定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任务，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会议还批评了林彪的信。

林彪的信源于他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同意见。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部队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不可能不多跑一些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本是战争中常有的事。但林彪一直埋怨说部队走的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佯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时，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指挥。聂荣臻批评了林彪的做法，并对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求朱毛下台，主要是毛下台。对此，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并对林彪“走弓背”的意见反唇相讥道：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但毛泽东以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这就为以后的分歧埋下了伏笔。实际上它与彭并无关系。

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过去决定红军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现在看来有可能实现了。现在要抓紧有利时机，努力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尽快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的斗争。红军下一步的任务是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秦邦宪等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并决定继续北进，到川西创建苏区。

红军在会理休整数日后，又继续北上了。

## 二 北上南下之争

离开会理后，红军为了避免敌机袭扰，避开四川炎热的白天，大都是夜间行军，5月23日部队抵达冕宁城。从冕宁到大渡河还要经过彝民区，由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不当，长期以来彝民与汉族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和冲突，要通过彝民区有一定困难。而此时蒋介石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兵力堵截红军，红军必须尽快通过彝民区，抢在蒋介石部队之前占领渡口。

毛泽东经一夜行军，和朱德、周恩来一起进入冕宁城。刚进城就有参谋人员报告，说前面有个大山岙，山那面就是“倮倮国”。“倮倮国”的人不准部队通过，已发生冲突了。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不能叫‘倮倮国’，那是彝族兄弟。他们暂时不了解我们，让部队先停下来。”

参谋人员走后，毛泽东对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说：“你们看怎么好？”刘伯承说：“已经派出先遣队去做工作去了，我也准备去一下。”毛泽东说：“那好嘛！你们四川人交个朋友嘛！”接着，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衣服、枪，送给彝族同胞。他特别交待说：“要告诉部队不准开枪，不准伤害彝族群众！”

刘伯承身受重托，与果基家支的彝民首领小叶丹“敌血为盟”，传为佳话。小叶丹亲自护送红军，为红军通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部队不仅比较顺利地走过了彝民区，而且还播下了革命火种，一批彝族青年加入了红军。

毛泽东在过彝民区前，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做好准备，多带些米，并要求他们准备好送给彝民兄弟的礼物。他说：“前面要过彝族区，他们的生活很苦，你们不要想到那里去搞东西。和过苗族区一样，那里的东西一点也不要动。”他还说，彝族人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少数民族，他们不是恨我们汉人，他们是痛恨国民党和军阀。他又说，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都是四川人，他们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很高兴的。

当毛泽东来到彝族聚集区时，一些群众怀抱火红的大公鸡向他跑来（彝族对待尊贵客人的礼节），围着他说着热情的话语。毛泽东边走边向他们亲切地点头，并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双手放在胸前表示谢意。毛泽东走出很远以后，还站在高山上回首遥望彝族群众，举起双手再一次向他们致意。

出彝族区后，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部队沿安顺场一线运动。这一带仍是峰峦回环的山区，山势陡峭，沟深水急。红军马不停蹄，急速行军，先头部队于5月24日到达安顺场。

安顺场是大渡河的一个渡口。大渡河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流入岷江而转入长江。大渡河水深流急，漩涡翻腾，遍布礁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马来此，前有大渡河，后有清兵，最后被围困于此，全军覆没。蒋介石认为，红军到此必重演当年石达开的悲剧，于是调动10万余兵力，策划了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图谋将红军歼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抢在蒋介石兵力部署完成之前渡过大渡河，是粉碎蒋介石的企图的关键所在。

为夺取安顺场渡口，刘伯承和聂荣臻亲临南岸，观察渡河战斗。红军以十七勇士首先渡河，迅速夺取北岸渡口。大队红军开始渡河，但只有两条小船，速度很慢。

第二天夜间，毛泽东来到了安顺场，林彪也率部队到达了。毛泽东一到安顺场就赶往渡口，找先遣队的负责同志开会。毛泽东听取了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十七勇士飞舟强渡大渡河的经过。当说到蒋介石妄想要红军作石达开第二时，毛泽东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当毛泽东得知渡河困难时，立即决定红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过不了河，而敌人李锡衍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将面临巨大危险。毛泽东当时就作了具体部署：一师和干部团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渡河后从东岸北上赶向泸定（安顺场位于大渡河由北向南然后向东的拐弯处，由安顺场渡河是从南岸向北岸，渡河之后则是沿东岸北上），由林彪带领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北上赶向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 340 多里行程，要求在两天半内赶到。毛泽东强调说，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的大部队才能全部渡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失败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大渡河东西两岸，两支英雄部队隔河相望，并肩前进。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沿西岸行军，边走边打，接二连三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昼夜兼程，日行军 240 里，终于 29 日晨抵达泸定桥边。

毛泽东在到安顺场的第二天下午，也冒雨出发了。山路蜿蜒曲折，加上下雨路滑，行路十分困难。为了鼓舞士气，驱赶疲劳，毛泽东不时和身边战士交谈，有时还讲一些小故事。

毛泽东还在艰难行军时，先头部队已开始了一场勇夺泸定桥的动人心魄的战斗了。

1935 年，千里大渡河上只有一座铁索桥——泸定桥。泸定桥位于泸定县城的西边，由 13 根铁索联结着西岸和东岸。两岸是悬崖峭壁，桥下是翻滚着黑色漩涡、奔腾不驯、礁石林立的河水。这座桥是四川通向西康、西藏的交通要道。13 根铁索中，4 根用来作两边扶手，中间 9 根铺上木板作为桥面。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走在撤去木板的铁索上，稍不留神，就会葬身于湍急的河水。正是在这种险象丛生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上演了一幕千古壮歌。

5 月 29 日下午 4 时，经过长途急行军、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的红军战士从西岸开始进攻了。22 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泸定桥另一端冲去。后面的战士边冲锋边铺木板，后续部队踏着木板向敌人射击。在靠近东岸的地方，敌人把没有来得及撤去的木板用火点燃，顿时燃起熊熊大火。敌军企图用烈火阻止红军前进。突击队员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冲进烈火，与敌厮杀，终于夺取了东岸渡口。部队冲进城后又打了两个多小时激烈的巷战，将敌大部歼灭。

与西岸部队夹河并进的东岸部队，在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之后，在 29 日夜 11 时左右也赶到了泸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后半夜 2 时左右，冒雨来到桥边。夺取泸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提着马灯陪同他们察看这座著名的铁索桥。当他们从桥西再折回桥中央时，刘伯承停了下来，心中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在桥上连踩三脚，边踩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夺取泸定桥三天后，毛泽东来到了这座桥。红军主力大队川流不息地通过了这座摇晃的铁索桥。毛泽东在桥上停下来，向大家摆手、说话，有时立在铁索链旁，极目远望。大渡河的凶猛，泸定桥的奇险，勇士夺取泸定桥的

壮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身边的警卫员议论说：“这样的桥，有我们一个班守着，谁也甭想过来，可敌人……”毛泽东笑着接上去说：“敌人嘛，总是敌人！他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不能相比的。”后来，在他的著名的词作《七律·长征》中，他以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写出了泸定桥的险要气势，写出了红军勇夺泸定桥的英雄气概，也使勇夺泸定桥的故事随着这首诗词传入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夺取泸定桥的第四天，先头部队就向夹金山方向出发了。这是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行动方向。毛泽东一过大渡河，就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在泸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部队向雪山草地一线运动；同时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要部队向雪山草地方向运动，并不是盲目的。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是为了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曾有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以后中断了。双方通过一些传闻和国民党的报纸刊登的零星消息，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但十分有限。中央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大体上在川西北活动，但具体地点不清楚。实际上，到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相隔不过百余里，只是被雪山隔开了。这时张国焘已派李先念率部队迎接中央红军，但中央红军的具体地点、到达日期，均不知其详。李先念率部攻克了雪山北麓的懋功，在此寻找中央红军。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开始向这一带运动。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海拔4900多米，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以南，理县的西南。夹金山终年积雪，日落之后，月出之前，更是冰雪遍地。据说此山别说人过不去，就连鸟也不易飞过，只有神仙才能登越，“神仙山”由此得名。但中央红军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必须翻过夹金山。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各部队领导都给战士讲雪山的情况，鼓舞士气。毛泽东也对战士们说，“神仙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去。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开始爬雪山。这支突破乌江、勇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与风雪搏斗四五个小时，翻过山顶，到达山下，意外地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两支红军主力终于会师了！

同日，徐向前在理番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敌情和各部队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并代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中央红军。

两支先锋部队会师的消息，使长征以来备尝艰辛的中央红军极为兴奋。后续部队情绪高昂，以顽强的意志翻过雪山。毛泽东也于6月14日与中央直属纵队一起过夹金山，山上积雪难行，如果稍有不慎，掉到很深的雪窝里半天爬不出来；如果找雪浅的地方走，一是不容易找，二是即使找到了脚下也很滑，走两步要退三步。毛泽东和战士一起步行。那天他没有穿棉衣，走了一会儿，他的单薄的灰色夹裤就被深雪湿透了。他那双薄薄的黑色布鞋不仅湿透，而且被冻得发亮。身边警卫人员要扶他上山，他说：“不！你们和我一样嘛！”走到半山腰，刮起了暴风，风卷着积雪，伴随着鸡蛋大小的冰雹一齐朝大家扑来。战士们立即用手臂支撑起油布，让毛泽东在中间暂避风雪。这时，山顶上传来了呼喊：“同志们，坚持住！坚持住就是胜利！”“是宣传队的同志们！”毛泽东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他们这种精神。”他还鼓励周围的同志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啊！”警卫员戴天福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毛泽东关怀他说：“戴天福同

志，你坐在这里是十分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这时，警卫员吴吉清赶紧把小戴背了起来，毛泽东就用手扶着他俩向山顶走去。

到达山顶后，只见雪地上战士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地坐在一起，有的索性躺下了。毛泽东一见这种情况，立刻走到战士中间，和蔼他说：“同志们，不能在这里休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四方面军会师啦！”对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向往，战友之间的相互关怀帮助，激励着战士们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向自身的疲倦劳累挑战。红军大队人员终于战胜了雪山。

6月14日晚，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达维镇，受到了四方面军同志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到了一座喇嘛寺庙，没有休息，就详细地询问四方面军部队情况，从部队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战士的生活、训练、学习，一直到师团的历史，党组织建设，部队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问得十分仔细。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二师师长韩东山尽可能详细地作了汇报。最后他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顽强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命地往前冲。”毛泽东高兴地说：

“是啊！这就是红军的作风！我们从江西出发那天起，飞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地上追，我们还是闯过来了！”

当天晚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场设在一个晒谷场上，搭了一个简易的讲台。周恩来主持庆祝会，毛泽东、朱德以及四方面军的韩东山讲了话。毛泽东以其惯有的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说：这次会师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体现。他盛赞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还称赞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他指出，中央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撤下了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强调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说明他对一、四方面军的会师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当然，他也看到今后会有很多困难，他对韩东山说：“中国的革命才刚开始，道路还很遥远，斗争还很复杂，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奋斗到底！”尽管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着充分的估计，但是，他以及他的战友也都未必预料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会如此之快就产生重大的斗争。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在达维庆祝会师后的第二天清晨又继续前进了。临行前韩东山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们走后，后面的部队还得几天走完，你要把警卫工作布置好，掩护部队安全通过。现在确定将五军团三十六团交你指挥，待我们从懋功出发后，你们再行动，明白吗？”毛泽东说着，又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和朱德、周恩来等人一道挥动军帽，同四方面军的部队告别。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红军两大主力会师，表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深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



益严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发生分化，国内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动。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北上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主要行动方向，也是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退却转变为新的进攻的巧妙结合。

6月16日，毛泽东到达您功后，见到了在此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向他询问了部队情况，表达了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还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人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后，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6月16日，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向张国焘申明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任务。第二天，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主张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即西进或南下）。从此，在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北上南下之争。

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主要来源于他对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成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样严重，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由此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红军卷起苏维埃旗帜，向中国西北部边远地区退却，与敌休战。这种方针在战略上是不适当的。因为蒋介石正企图把红军压迫到黄河以西地区，阻止红军向北或向东发展，切断红军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置红军于困境，然后寻机消灭之。此外，这些地区多是穷乡僻壤，少数民族居多，存在着民族间的隔阂，红军若以此为根据地必然造成供给和兵源的困难。因此西进或南下是错误的方针。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北上川陕甘方针则是客观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后提出来的。北上川陕甘，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有较好的条件和深远的意义：一是此地地理环境接近华北抗日前沿，有利于红军开往抗日前线；二是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有利于支持红军作战；三是这一地区有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活动，与他们会师后可以在较短时间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方针。

但是，张国焘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张国焘同为党的“一大”代表，同是湖南人。毛泽东以最大的耐心期待着这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能够放弃原有主张，希望一、四方面军能够团结起来，与其他部队联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6月18日，党中央、毛泽东再电张国焘，申明北上方针。20日，又致电张国焘，请他赶来懋功，以便商议决定战略方针。

为了与张国焘面谈，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抵达两河口镇。

中央准备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为迎接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块大平地上，布置了欢迎会场。6月25日上午，天一直下着雨，毛泽东也一直耐心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终于，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卫下，赶到了两河口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冒着倾盆大雨，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欢迎他。张国焘态度傲慢，骑马飞驰而来，马过之处溅了毛泽东等一身泥水。

在欢迎会上，张国焘作了讲话，在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面前宣布了他的主张：“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四川）、康（西康）、新（新疆）大局面的更好条件。”尽管毛泽东不同意他的主张，但仍设晚宴招待他，请他喝了当地酿制的青稞酒。席间，毛泽东表示欢迎张国焘，并开玩笑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然而张国焘对这种交谈并不感兴趣。

张国焘到达两河口的第二天，中央正式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开了3天，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他还指出，以前红四方面军决定向西，这是与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他强调，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一必须是便于我们作战的，第二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主力。新根据地应是地域广大、回旋余地大、便于机动的地区；群众条件好、人口多、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因此中央决定去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也作了发言。他表示同意周恩来的上述发言，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他要求四方面军作出解释，因为他们是主张南下打成都的。他还说，我们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逃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他指出，我们要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南东，迅速向前，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他主张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破胡宗南部向前进军。他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日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张国焘不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认为北有草地，气候严寒，行军不利，胡宗南部有20余团兵力，即便到甘南也站不住脚，他提出先向西南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由于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朱德也主张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刘少奇也表示不能向成都发展，因此张国焘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会议在6月28日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对中央的决定最终投了赞成票，但其内心深处仍主张南下。这时他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损耗，人、枪比四方面军少，便野心勃发，提出要解决一、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央拒绝了。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指出，红军应由中央统一领导，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会议期间，张国焘对会下的活动更为关注，他曾表示要拨兵给彭德怀和

聂荣臻，还派秘书给彭德怀送了几斤牛肉干和几斤大米，以及二三百元钱。这种非正常的活动引起了彭德怀以及一方面军其他同志的注意。

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杂谷脑（今四川理县）后，在一个教堂里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为名，宣传他自己的主张。6月3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重新提出退却方针，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7月1日再电党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这是再次提出组织问题，即向中央摊牌要求给予更高职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此时毛泽东对张国焘仍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放弃最后的努力。毛泽东不仅对张国焘如此，对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都采取了团结、爱护、信任的态度。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曾大搞错误的“肃反”，1931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他还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伤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例如曾中生因与张国焘有不同意见而被长期关押，他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后，分别给党中央和张国焘写信，要求释放，面见党中央申诉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张国焘扣压了曾中生的信，禁止他同中央见面，后将他秘密杀害。廖承志1933年加入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他因对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不满被打成反革命，被开除党籍。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毛泽东曾给三军团去电，要他们派部队去寻找廖承志。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要萧劲光率领人马去寻找。萧劲光派出一个排去寻找了半天，但未找到，后来又经周恩来的努力廖承志才得以获救。三军团在长征途中收容了大约有一个排的四方面军掉队的士兵。当时彭德怀觉得，这些同志是掉队被我们收容的，可以带他们一起北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说，一个也不能带。搞得不和睦，将来不好见面。我们要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将来会跟我们一道来的。彭德怀听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亲自给这些同志讲了话，宣传了北上抗日的主张。随后就让他们回红四方面军去了。曾深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深知爱护干部、挽救干部的重要性，因此，他耐心地等待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一道回到中央方针上来。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率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从翻越夹金山后，红军一直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行动。这一带是连绵不断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荒原，没有青菜，没有粮食，只有少量的青稞。来自中国南部的战士，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跟着党中央，跟着毛泽东不停地向北走去，寻找新的落脚点。

在艰苦的环境中，党的领导人也和这支队伍中的所有成员一样，缺衣少食。毛泽东自从过了大渡河之后，就很少吃到蔬菜和有油性的东西，甚至连盐也好久没吃到了。一天，在卓克基，西斜的太阳映照着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这是毛泽东在卓克基居住的地方。塔楼前，战士们正围在一起收拾一块猪皮。毛泽东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来见几个战士围在一起忙碌，便问：“你们在搞些什么？”警卫员钟永和说：“主席，我们给您弄了点菜。”当毛泽东听说是猪肉时，便问大家：“哪里来的？群众不在家，你们犯纪律了吧？”原来，警卫战士在土司宫的一个小暗室里发现了一筐带毛的猪皮，他们将猪皮放到小铁桶里煮，然后刮去毛，做成菜。钟永和讲完事情经过后问道：“主席，您吃不吃？”毛泽东看了看大家，笑着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大家一听高兴极了，围坐在一起吃了起来。毛泽东一边吃一边开

玩笑说：“咱们这算是一次很成功的会餐！”这种官兵一致，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成为鼓舞大家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率部离开卓克基后，踏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栉风沐雨，又翻越了第三座大雪山，到达黑水县的芦花。在这里，党中央停留了十几天。这期间，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立足未稳，夺取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同日，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增加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7月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把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阻挠北上。7月9日，他鼓动其追随者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即改组总司令部，要求让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又致电朱德，要求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并要挟中央说，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这样，张国焘从最初的战略方针之争发展为赤裸裸地要权。党中央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要求。

毛泽东、党中央从大局出发，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同志，对张国焘仍是晓之以理，争取他转变态度。为了解决“组织问题”，统一认识，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会上，周恩来鉴于大敌当前，需团结一致，便主动表示愿将红军总政委一职让出。张闻天也表示可以把总书记的职位让出来。而毛泽东主张，总政委职位可以让给张国焘，但党中央的职位不能再让。当后来张国焘成立所谓“中央”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这一主张所包含的政治眼光和深远的韬略。后来彭德怀在他所写的自述中这样描述这件事：“当时张国焘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

这样，7月18日军委公布了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7月21日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并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这是中央在组织上作出的重大让步。

尽管中央作了让步，但张国焘并没有善罢甘休，斗争仍在继续。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即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后来，彭德怀曾提到此事，说三军团的密码本被收缴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毛泽东以及一军团隔绝了。此后，张国焘才率四方面军北上，但已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8月初，胡宗南部从东南方向推进到了平武。红军如按原定路线经松潘北上，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为了摆脱危局，中革军委于8月3日制定了《夏（河）跳（河）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在毛儿盖附近有一个群山环绕的藏族村庄——沙窝。在这里，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固执己见，吹嘘自己如何正确，同时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提出一方面军领导应检查缺点错误。在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同

志的批评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向西南退却的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红军提供作战的后方，而且可以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苏维埃国家领土，鼓舞工农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斗争。决议还针对张国焘破坏红军团结的行动，强调必须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要求再提拔四方面军干部 9 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的多数。同为中共资格最老的党员的毛泽东，与张国焘展开了严肃的面对面的交锋。毛泽东指责张国焘：“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还是作了让步。毛泽东指出，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当中央委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其他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这样，会议经讨论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力政治局委员，陈昌浩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增补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张国焘对毛泽东极为不满，即使在多年后重提这一会议时，仍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这足以说明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实现其野心难以逾越的障碍。

沙窝会议之后，为了执行《夏挑战役计划》，中央于 8 月 20 日把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毛泽东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回到毛儿盖，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偏僻地区西进的主张。这意味着张国焘与党中央、毛泽东的斗争远未结束。

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就战略方针和夏挑战役作战行动问题作了讲话。他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他主张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他提出，红军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原，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却，也是好的。参加会议的四方面军负责人徐向前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陈昌浩等人均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还为会议作了结论，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他强调，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这种精神与张国焘鼓吹的西进方针是完全不同的。

毛儿盖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会议改变了夏挑战

役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正确的。

由于张国焘坚持西进（或南下）的主张，迫使中央在七八月中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这些争论，统一党内的认识。而在这两个月中，蒋介石得知红军已到达毛儿盖并有北上的意图，便调动30万大军，布置了三道封锁线，堵截了毛儿盖西北方向几乎所有的要道。只是由于他判断红军不会从草地北上，所以未在草地一线部署重兵。而毛泽东提出的经过草地北上至陕甘的主张，再次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被他认为是不能通过的地方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毛泽东开完毛儿盖会议之后，于8月21日与右路军一起踏上了人迹罕至的川西北草原。

川西北大草原，实际上是一片大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草地气候极为恶劣，时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每年5月至9月，是这一地区的雨季。红军过草地时已是8月。8月的草地鲜花盛开，但鲜花下面的水草地却处处是危险，稍不留神陷入沼泽，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人吞噬。这种极其险恶的自然条件使人类的脚步很少光顾此间。因而敌人在预测红军的行动路线时，把草地排除在外。薛岳在《剿“匪”纪实》中就说，红军若想走此路，“势有不能”。但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战术的指挥者，他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走出草地。

在大部队向草地行军之前，8月17日清晨，一军团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突然接到通知，要该团担任进入草地的先遣团，要他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领受任务。从毛泽东那里当面接受任务，对杨成武来讲还是生平第一次。

在毛儿盖，毛泽东与周恩来来往在一起，住的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杨成武找到毛泽东后，毛泽东对他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毛泽东原想让六团担任过草地的先头部队，但试了一下，没有奏效。毛泽东分析了六团未能奏效的三个原因，这就是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加上国民党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的伏击。

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稍顿了一下，毛泽东又指着地图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托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他说到这里，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道：“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毛泽东又详细地告诉杨成武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他说，草地看不见人烟，连树林也没有，行人走过，有时水可浸到膝盖边，夜间寒冷多雨露，就是白天，也气候多变，忽而烈日，忽而阴天，有时飘来雨雪，必须作好最坏的打算……然后，他又具体指示解决困难的办法。说完这些，他又强调说：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

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毛泽东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资准备情况。当他听说部队找了一个 60 多岁的藏族通司当向导时，便着急地问：“路上走不动怎么办？”杨成武说已准备了 8 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毛泽东高兴他说：“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他还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由于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红四团，因此毛泽东又特别嘱咐杨成武必须搞好团结，指出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标志。

红四团不负重托，探寻出一条经草地北上的路线。随后，主力部队开始踏上了茫茫草地。

在处处隐藏着死亡危险的草地，红军战士不仅要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向人体的极限挑战。红军战士要以惊人的毅力，战胜饥饿、寒冷、疲劳等困难，萧劲光曾在回忆录中说，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毛泽东 1936 年时曾对斯诺说，那时红军中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意思是说为了弄到一点吃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准备过草地时，红军从藏民的地里收割了一些青稞和萝卜之类的蔬菜。毛泽东幽默地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战士们在过草地时只能吃点青稞粉、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以极端虚弱的身体去战胜极端险恶的自然条件，这在人类生存史上也是一幕少有的悲壮之歌！

毛泽东在草地行军中也和平时一样，白天到了宿营地从不休息，不是开会就是到部队中去。一天，战士们在草地露营点燃了篝火，许多人围在一起谈笑、歌唱，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和油布往地上一垫就坐下了。彭德怀请毛泽东为大家讲故事。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生动地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部队作战的经历，给战士们以精神上的鼓励。

在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和战士同甘共苦。晚上露天宿营，白天同样忍饥挨饿。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依然充满革命信心，官兵一致，团结互助。一次，一个战士临终前，请卫生员把部队发给重病号的二指宽的马肉转交给毛泽东，并请警卫班的其他同志照顾好毛泽东。毛泽东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无情的水草地吞噬了多少战士的生命。但红军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草地，战胜了自我，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

3 月 24 日，中央在过草地的途中致电张国焘，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力陈中央方针的正确性，令其率

部队向班佑一线运动，与右路军并肩东进。徐向前、陈昌浩也连电告知张国焘，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

8月26日，右路军到达巴西地区。从巴西到甘南，需经包座。中央，毛泽东决定攻打包座。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四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战斗于8月29日开始，30日结束。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创造了条件。

在攻打包座战斗进行中，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毛泽东提出抓住有利战机，北出甘南。中央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进去，可以有把握地战胜胡宗南部。

但是，这时仍不见张国焘的动静。毛泽东便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赶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然后，又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指出左路军如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再次要他带部队过草地北上。同时，还令一个团的部队筹集粮食，做好迎接左路军的准备。

这时，蒋介石突然接到薛岳、胡宗南的电报，得知红军已经草地到巴西，并已突破设在包座的防线，大为震惊。为阻止红军行动，他下令新编十四师扼守岷县及腊子口，又让胡宗南回甘肃；然后令王均所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做好堵截红军的准备。

大敌当前，如再迟疑，必将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不能不着急。然而，大敌当前，毛泽东又必须团结同志，集中兵力北上抗日。毛泽东不能不以最大的耐心等待张国焘的回音。

可是，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意外的消息。9月3日，张国焘终于有了回音。他致电中央，以葛曲河上涨给左路军带来种种不便为借口，不按中央的计划行进。他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又发出电报，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时，右路军先锋一军团于9月4日从巴西北上，5日到达俄界。这段时间中央几乎天天开会，希望能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前敌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军在巴西，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与前敌总指挥部住一处，周恩来、王稼祥同三军团驻扎在离前敌总指挥部约15里左右的牙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同陈昌浩、徐向前进行了多次商谈。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说“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下为下策。”但张国焘旋即来电命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回电后，拿电报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马上去找张闻天、博古。当晚，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随右路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非正式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北上。会后，即将此电发给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9月9日，



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陈昌浩接到电报后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同意南下，但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只好表示南下。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张国焘不仅不听从中央的耐心说服，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反而又在9日致电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在接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

当毛泽东翻过夹金山和张国焘会面时，也许没有料到他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以过人的机智与果断决定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为寻求脱身之计，他立即到涂向前、陈昌浩那里商谈行动方针。他来到涂向前的住处，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没再说别的，只是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了。

毛泽东又来到陈昌浩处，陈昌浩告诉毛泽东，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还须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商量。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养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同周、王开个会吧。这样，毛泽东从陈昌浩控制的前敌指挥部中抽身而出，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的于弄，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会议决定，为了贯彻中央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领一、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学校迅速转移，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为了给部队行动打掩护，毛泽东派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部队要南下过草地，需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部队在10日天一亮就去筹粮。10日凌晨2时，叶剑英率一方面军的同志悄悄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并带走了甘肃省地图。

毛泽东与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后尾前进。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一、三军团出发后，徐向前、陈昌浩大为吃惊。陈昌浩问徐向前，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进行“劝说”。李特骑马追来，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泽东劝阻他，他就大吵大闹。毛泽东邀他到旁边的一所教堂里坐下来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定的。但李特不听劝告，要强拉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毛泽东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

商。毛泽东最后还对李特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的。伍修权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说当时有些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泽东却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就这样，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回班佑去了。毛泽东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随部队通过一座木桥走过了巴西河，开始走上新的征程。

过巴西河的当天，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中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毛泽东对张国焘再次表现了高度的忍耐。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以避免红军的分裂，共同北上，9月11日，一、三军团在俄界会合后，中央再次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而张国焘在第二天复电仍反对北上，主张南下，首先赤化四川。9月12日，中央根据8月以来与张国焘的争论，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当时，许多同志对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十分愤慨，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难以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不管张国焘如何阻挠破坏，中央仍然要坚持两河口既定的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曾对毛泽东主张保留张国焘党籍一事予以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既坚持原则性，又恰当地保持了灵活性。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毛泽东所着眼的决不是张国焘一个人，而是整个四方面军。他对四方面军始终抱有信心，相信他们终究会北上的。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仅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会议还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的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

在此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再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南下命令，服从中央电令，转而北上。但张国焘却置之不理，并在左路军中大肆进行活动，在部队中攻击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他在阿坝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与俄界会议唱对台戏，并在会上组织人马围攻朱德。9月15日，他提出一个《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0月5日，他在卓木碉成立了所谓的“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

自封为主席。他以“中央”的名义，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12月5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宣称“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事已至此，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公布于众。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到1936年二三月间，四方面军已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约4万人。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失败了。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建立了根据地。现实的教育使广大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逐渐觉醒，认识到北上是正确的。在距两河口会议近一年的时间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了。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明确决定了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曾说过，他们会重新回来的。一年后，他们终于回来了。

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斗争艺术。首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长期的，反反复复的、不厌其烦的耐心说服和教育，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二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坚持北上的基本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对于一些具体的事情或人事安排则可以灵活掌握，适当让步。三是把坚持错误的个别人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区分开来。保障了红军的团结。四是重在分析错误，不急于做组织处理。这种斗争方式，一反遵义会议之前，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成为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典范。

南下北上之争告一段落，毛泽东率红军战士踏上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

### 三 奠基礼

俄界会议后，在萧瑟秋风中，毛泽东于9月13日率领陕甘支队离开俄界，又挥师北上了。

红军向甘南进军，必须经过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迭县东北，岷县以南，从北面的达拉梁到南面的白龙江，有一条30多公里长的峡谷，叫腊子沟。沟两边的山头，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刀劈开了似的，既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从下往上斜视山口只有30多米宽，又像是一道用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巍峨对峙，沟底一条终年流水的腊子河，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旋涡，无法徒涉。河上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山连在一起。要过腊子口，只有经此小桥。舍此无他路可以选择，敌人在桥东头顶端悬崖上筑有好几个碉堡，有一个机枪排把守。口子后面有一个三角形的谷地，也筑有不少工事。腊子口后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白雪，山脉纵演。敌3个团的兵力扼守着日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如此大险又配以重兵，构成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毛泽东决定攻打天险腊子口。

9月15日黄昏，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通知，要他们在二日之内夺取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的敌人。9月16日，彭德怀接到毛泽东。聂荣臻和林彪联名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消灭腊子口之守敌。随后，一军团的几个主要指挥员赶往二师，同师及四团领导研究攻打腊子口的部署。毛泽东在朵里寺等候消息。

四团在奔往腊子口的路上，以强行军速度赶路，还打了两次遭遇战。身经百战、屡战屡胜的红四团，以两面出击，即以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向敌发起进攻，鉴于战斗事关重大，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都在战斗打响前亲临前沿指挥所察看地形，作具体部署。战斗激烈进行中，毛泽东和军团首长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询问突击部队现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正面突击的战士以下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勇猛向敌进攻，掩护迂回部队攀登。迂回部队机智灵活，登上了常人认为无法登上的悬崖峭壁，然后自上而下向敌进攻。在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下，终于在9月17日凌晨将敌军击溃，占领了天险腊子口。残敌向岷州方向逃去。红军部队乘胜追击，在大草滩歼灭了敌人，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盐。这对于刚走出草地尚未休整好的红军部队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四团的侦察连在大草滩歼敌后，连夜插向岷州，占领了岷州城东关。甘肃之敌大为震动，以为红军一定会攻打岷州城。但毛泽东又一次出敌不意，要红军挥兵东去，奔向哈达铺。

毛泽东随着滚滚铁流般的红军队伍穿过了腊子口，来到了大刺山。这是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高山，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雪山。连日来，毛泽东的心情甚好。他吃着这一带回民烙的锅盔（烧饼）赞不绝口。现在，他又登上了山顶。他回首遥看千里岷山，只见白雪皑皑，重峦叠嶂；俯首前看，却见无边田野，黄绿相间，丰收在即，他想起近一年前，红军离开瑞金，跨过于都河时，也是秋收时节，心中颇多感慨。后来他曾描述那时的心情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的确，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指挥红军千里转战，战胜了来自敌人的、

大自然的、党内的无数艰难险阻，现在终于越过了岷山，把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困死于雪山草地的幻想彻底击碎了，长征胜利在即，真正是柳暗花明了，这种久已不见的喜悦、开朗的心情化作一股诗情，使他在越过岷山不久便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哈达铺。

在部队进击哈达铺之前，聂荣臻曾向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和指导员布置任务，要他们到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毛泽东这时也在场，他说：“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朗，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毛泽东一生酷爱看书报，但在雪山草地却无法搞到报纸。当走出草地之后，他想方设法要弄些书报来看，他的期望没有落空。战士们搞到了载有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的报纸。聂荣臻首后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毛泽东看了报纸后，满脸笑容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

一年来红军一直在为寻找新的落脚点而奔波。毛泽东提出到陕甘建立根据地，但具体在什么地方，他并不很清楚。而国民党的报纸使他找到了具体的地点——陕北。

随后，红军来到了哈达铺。毛泽东注在一家中药铺子里。部队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整，整编为3个纵队，共8000多人，9月22日，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当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进会场，顿时响起热烈掌声。

毛泽东挥挥手要大家坐下，然后，笑笑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的讲话，使会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稍稍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说，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估计形势，他介绍情况说，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还有30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他还说，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毛泽东在分析形势时还谈到四方面军和张国焘。他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毛泽东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诙谐他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在这种时刻，毛泽东怀念起多年共同奋战的战友。他说，我们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

毛泽东接着又说：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 8000 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 1929 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举起一个指头，笑着说：现在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松潘地区，我们是没收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和购买藏民的粮食，现在我们应该坚持以打土豪、筹粮款为主，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条重要纪律。

毛泽东号召大家：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

毛泽东挥舞着拳头结束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陕甘支队在听取了毛泽东极富鼓动性的讲演后的第二天，就离开了哈达铺，向黄土高原行进。部队渡过了渭河，又攻占了渭河之滨的陇西。一天，部队正在继续前进，忽听前方传来了机枪声。这时毛泽东和中央直属纵队的同志赶来了。毛泽东看看远方，又仔细听了听远处传来的枪声。不一会儿，在急骤的枪炮声中，可以听出哪是步枪、机枪声，哪是手榴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了。毛泽东十分镇静，仿佛登临一个风景点，正在欣赏周围的山山水水。一会儿，彭德怀走了过去，问道：“主席，你看怎么样？”毛泽东笑笑，说：“我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怎么样的。”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军的小部队才放几枪，敌人的枪炮声顿时停住了，两翼刚才僻僻啪啪打得正起劲的声音，几乎同时哑了。

“毛主席真是料敌如神啊！”战士们边走着，一边盛赞着。

摆脱敌人后，陕甘支队于 9 月 27 日占领榜罗镇。在这里，红军得到了许多报刊，进一步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北方侵略的罪行材料，进一步获悉了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接着，为使中央精神贯彻到全军，又召开了全支队连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厂报告。他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的严重性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阐明了北方可能成为抗日新阵地的政治、经济条件，认为要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迅速抵达陕北集中，提出要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红军干部们在露天风雨中聆听着毛泽东激动人心的号召：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达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在，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毛泽东的讲话中所蕴含的革命信心和力量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使大家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忘却了风雨带来的寒冷。

会后，各部队把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迅速传达到全体战士中。经过短暂的休整和动员，陕甘支队于9月29日离开榜罗镇，向陕北方向前进。10月初，部队穿过西兰公路，随后又通过了平（凉）、固（原）公路，来到六盘山脚下。

六盘山山脉地跨宁夏，陕西两省，南连秦岭，北濒大河，绵延200里，陡峭峥嵘，西兰公路沿六盘山盘旋而上。六盘山是六盘山山脉的主峰，是红军到陕北前攀登的最后一座高山险峰。进入六盘山地界，风土民情便不同，到处是连成片的黄土。这里的沟沟壑壑，山川河流，无一不是黄色的。惟有六盘山上长满了青草。此后，黄土高原便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的基地。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战士一起翻越六盘山。快到山顶时，警卫员陈昌奉昏倒了，毛泽东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毛泽东站在雨中，道劲的秋风吹动着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衣，山顶上红旗招展、宣传鼓动的呼声此起彼伏，山顶山下，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犹如铁流，工向陕北方向开去。毛泽东望着巍峨的六盘山，望着英勇顽强、久经考验的红军战士，心中吟诵着又一首长征的颂歌《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充满了革命豪情与乐观精神。而后来的历史进程也正如这首词所昭示的那样，只要掌握住“长缨”，必定能缚住“苍龙”，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北进途中，红军几次和敌骑兵遭遇。10月7日，部队过了六盘山后，在青石嘴又发现了敌人的两个骑兵连。毛泽东与一纵队的林彪、聂荣臻、左权，都在山头观察敌情。毛泽东决定要打一下敌兵。他把一大队的杨得志、萧华，四大队的王开湘、杨成武，五大队的张振山、赖传珠召集来，向他们部署战斗任务。毛泽东指着远方说：“都看到了吧，隘日下边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的情报，那里驻扎着敌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拦着我们的去路。”

这时毛泽东转过身来，从警卫员手中接过两块饼子，一边把它分成几块，一边问：都还没吃午饭吧？大家点点头，毛泽东爽朗地笑笑，说：“那好，

分而食之，打下了青石嘴，再吃好饭！”说完笑着将饼子分给了大家。

毛泽东一边嚼着饼一边说：“一定要消灭他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五大队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然后，他又转过脸来，看着杨成武与上开湘，说：“四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嘛，要发扬你们的特点，动作要快，要猛，要狠！”最后，毛泽东说，交代完毕，分头执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打！

战斗很快结束了。红军歼灭和俘虏了敌人两个骑兵连，缴获 100 多匹马和 10 多辆马车的子弹、军衣。红军用这些缴获的马匹建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连。

在向陕北进军的途中，不时可以看到陕北红军写在墙壁上的标语。这表明，离陕北根据地越来越近了。

一天，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在一座土山上休息，突然发现山下小路上几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原来他们是陕北红军派来给毛泽东送信的。毛泽东看完信，立刻向他们走来，并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这时，山上山下集中了不少的部队临时在这休息。毛泽东大步走到战士中间，举起手兴奋地大声说：“同志们！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派同志接我们来了！”霎那间，掌声、笑声、喊声震撼了山川。

10 月 17 日，毛泽东随同部队行进到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因为老爷山上的鸡鸣，陕甘宁三省都能听到，所以当地人又称之为“鸡鸣三省”的山。下山后，到达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岭上有一块高大的界碑，正面刻着“分水岭”三个大字，作为甘肃、陕西两省的分界线。毛泽东一面看碑后边的文字，一面兴奋地对身边的同志说：“从你们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啦！”

10 月 19 日中午，陕甘支队一纵队先期到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只见镇内墙壁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刘志丹”等标语。说明已到达陕北根据地了。但群众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了，纷纷上山逃避，只有几位老人在镇里。当他们看到红军战士放下背包打扫卫生，并且在墙壁上张贴各种标语，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时，这才确信是红军来了。于是那些老人找回了一些群众，很快当地的支部书记和乡政府主席也来了。红军与地方党组织按上了头。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终于跨进了家门，来到了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住进镇东北面半山坡上的新窑院里。

此时，国民党的马鸿逵、毛炳文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也尾追不舍，跟进了陕北，向吴起镇扑来。

毛泽东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要聂荣臻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再下决心。傍晚，聂荣臻回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聂荣臻说，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同意聂荣臻的意见。

当天晚上，在新窑院山坡下一座大窑洞里，召开了支队十部会议，由于部队长途跋涉，十分疲劳，毛泽东鼓励大家说：红军疲劳，敌军更疲劳，红军回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根据



这些条件，决定在这里打一仗。毛泽东还说，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他决定，10月21日早晨出击。

20日上午，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就如何打好这一仗进行了具体部署。随后，毛泽东为各纵队拟写了电报指示，彭德怀上山仔细察看了地形。

21日凌晨，晓月尚未褪去，星光还在闪烁，毛泽东就离开了居住的新窑院，跨过洛河，踏着黄土路登上了吴起镇相对的大峁梁。他的警卫员陈昌奉在一棵杜梨树下构筑了简单的工事，设下前沿指挥所。毛泽东在树下又召集一部分干部开会，反复说明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要求一定打好这一仗。会后，他对陈昌奉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

此时，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部队已在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做好伏击准备。待到敌军行至红军的伏击圈内时，遭到了红军的迎头痛击。两个多小时以后，敌三十五师骑兵团被歼灭，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被击溃。敌骑兵被挡在了家门外。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巡视了战场，兴奋他讲道，步兵打骑兵，这是个创举啊！他以充满喜悦的心情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

山高路远沟深，  
大军纵横驰骋，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看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将原诗还赠给毛泽东。

大峁梁“切尾巴”战斗再次体现了毛泽东敢于与强敌战斗的精神，为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合献上了一份礼品。

“切尾巴”战斗标志着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了。从此红军有了新的根据地，中国革命将展开新的一页。为了研究和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为了使中央确认和批准榜罗镇会议把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切尾巴”之战结束后，于10月22日召开了到达陕北后的首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对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意见。他说，自俄界出发已走了二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击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敌人的“围剿”正在准备，我们的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对陕甘支队的同志应提出保卫陕北根据地的口号，进行广大的解释，使他们了解根据地情形，与根据地亲密起来。对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的同志，应使之了解现在敌人的“围剿”与过去不同，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在这里，就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大家应努力打破敌人对我们新的“围剿”。对这里的群众，应进行深入的动员，避免像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反“围剿”那样因对群众动员不够而发生手忙脚乱的现象。

毛泽东在谈到粉碎“围剿”的有利形势时，分析了国际国内总的革命形势，指出现在正是革命和战争的转变时期。在世界上帝国主义到处冲突，阿比西尼亚闹得非常凶。苏联的强大，使以前的许多敌对国家倾向与苏联友好。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正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也急需革命。他认为，这些都是粉碎“围剿”的客观条件。接着，他又指出，

要粉碎“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没有好的领导，“围剿”是不能粉碎的。他认为，要做好领导工作，首先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其次是加强后方工作。他强调。财政经济问题关系战争前途，应当立即开始准备。以前党和苏维埃从事群众工作的人员应准备去作地方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目前作战方针，即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部队，扩大部队，做群众工作。发展方向，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以后，可向东。他指出，大的方向是陕甘，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央确立陕北根据地的过程。他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与苏联发生联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的观念是没有的。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消息，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根据地与红军，所以决定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现在我们应该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根据地来领导全国革命。

张闻天、博古、彭德怀、邓发、李富春、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等人纷纷发言，赞同毛泽东上述意见。毛泽东为会议作了结论。他宣布，完结一年的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他在分析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指出我们不但有陕北的红军与群众，而且还有全世界全中国的帮助。最后，他指出，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这三件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对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的加强，群众组织的加强，是非常重要的。粉碎“围剿”的工作，在动员群众方面主要是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正确的方针，需要我们一致努力去实现。

这样，毛泽东凭借他多年领导根据地工作、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之时就提出了下一步行动目标，为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确立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和目前的具体政策、任务，使全党全军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尔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在刚踏进陕北土地时提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的口号及各项政策是具有远见而又切实可行的。

此后，毛泽东及党中央为落实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的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的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陕北根据地正处于危机之中，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推行王明“左”倾错误，从1935年7月开始搞错误的“肃反”运动，把刘志丹等原陕甘边和陕北工农民主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逮捕，同时，在土地革命和军事策略等重大问题上也推行“左”的错误政策，给陕北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种错误如不制止，陕北根据地将会出现严重危机。而这种危机早在一年多以前在中央苏区就曾出现过，其结局便是使红军被迫进行长达一年之久的战略大转移。当这种大转移最终落脚于陕北时，却遇到了在中央苏区早已出现过的情况。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未曾预料到的。

毛泽东到吴起镇后，和张闻天、刘少奇、杨尚昆等听取了赤安县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陕甘边特委龚逢春的汇报，了解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的发展以及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也听取了关于“肃反”和逮捕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郭宝珊、高岗等人的情况汇报，毛泽东说，我们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们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

理，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战斗力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要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决定，派人先行到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驻地寺湾，进一步了解“肃反”情况，制止“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党中央、毛泽东派贾拓夫。李维汉作为先遣队去寻找刘志丹与陕北红军。他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西北代表团、陕甘晋省委从瓦窑堡派来迎接党中央的郭洪涛等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向郭洪涛等人详细询问了陕北“肃反”以及逮捕刘志丹等人的情况，证实了在吴起镇了解的情况，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毛泽东极为重视这一问题。10月24日，中央到达下寺湾后，立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撤销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周恩来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张云逸任参事长；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陕北省委、陕甘边省委，成立中央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承认陕甘边和陕北工农民主政府等等。同时，决定瓦窑堡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些措施为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中央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3人带1部电台和1个排的兵力，先期到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王首道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合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

后来，党中央、毛泽东又决定组成以董必武为首的解决“肃反”问题的五人小组。在经过全面调查研究之后，推倒了强加给刘志丹等人的莫须有的罪名，释放了被关押的干部。11月11日，为这些同志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经过大量的工作，根据地又出现了新的生机。

毛泽东、党中央在下寺湾作出一系列决策，纠正陕北根据地“左”倾错误的同时，决定党中央兵分两路，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率中央机关先行赴瓦窑堡，即刻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部队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协同作战，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进攻。在作出这一决定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就踏上了行军的路程。

11月初的陕北，已是雪花飘飘，寒气袭人。长征过来的战士，大多还衣衫单薄，草鞋覆足。但由于经过长途跋涉刚到新的根据地，大家依然斗志高昂，热切地期盼着能早日与陕北红军会合。

经连日行军，毛泽东等人来到了甘泉县道佐铺镇史家湾。随后他们前往红十五军团设在道佐铺的总部，会见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当时，红十五军团刚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胜利不久，正在攻打张村驿。军团长徐海东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忽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了7匹快马，送来了程子华给徐海东的信，告诉他毛泽东今天下午到司令部来，请他速回军团部驻地。

徐海东接到信后十分激动，立刻命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然后快马加鞭往回奔。从张村驿到军团部约135里，中间还要翻越两座山，但他心急如火，一路飞奔，只用3个小时就到了。待他赶到司令部时，身上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了。在司令部里，程子华向毛泽东介绍了徐海东，毛泽东向他伸出手来，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向徐海东、程子华询问了部队的情况，也问到同志们吃和穿的情况。他们回答之后，毛泽东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旧地图问道：“陕北的

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十五军团的同志把敌人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报告。毛泽东看着地图，又问：“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徐海东、程子华报告后，毛泽东折起地图，亲切他说：“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徐海东临动身去前线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由于几年来十五军团的交通联络都是原始工具，没用过电台，因而徐海东说：“我不会用它。”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不要你自己动手，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人员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徐海东回到了前线，立刻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到来的消息传达下去，转告了毛泽东对大家的问候。部队情绪沸腾起来。这个问：“毛主席什么时候来这里？”那个问：“哪天能看见毛主席？”徐海东说：“打下张村驿，大家一块去见毛主席！”

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向毛泽东发了电报，报告了胜利。这是他当指挥员以来发的第一封电报。当天，毛泽东回了电报，向参战的同志问候。

张村驿战斗之后，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了。11月3日，毛泽东、党中央根据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以后的新情况，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恢复为红一军团，实际上是原红一、三军团合并，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这为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基地进一步作了组织上的调整。

两支部队会合后，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加强部队的团结合作，11月6日，毛泽东在甘泉县南35华里的象鼻子湾村前的一片树林里，顶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对中央直属纵队作了重要讲话。他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悲观情绪都是要不得的。他还特别强调与陕北红军的团结，教育大家要自觉遵守纪律，爱护陕北人民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他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经过长期奔波尚未休整好的红军战士，使这些来自南方，在身体、生活习惯上尚未适应黄土高原生活的战士获得了新的力量。

11月9日，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人先后走进会场。毛泽东在会上全面阐述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首先说：“同志们，辛苦了！”引起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说：“从瑞金算起，12个月零2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会场上一片欢呼声、口号声。他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在12

个月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与奇迹，它说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的。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约2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从江西、福建出发，一路行军一路宣传，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求解放。我们在长征中还严格遵守纪律，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我们到了陕北根据地要自觉遵守纪律，爱护陕北人民的一草一木。长征是播种机，播撒了许多革命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毛泽东又打着手势说：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10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当万。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在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

毛泽东以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把长征的伟大意义和今后的任务摆在了全军面前，调动起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情绪，为全党、全军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作了思想上的动员、准备工作。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敌人以5个师组织新的进攻，东边1个师沿洛川、郾县大道北上；西边4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郾县方面前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以迎头痛击。

毛泽东召集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首长到象鼻子湾军委总部开会，研究制定直罗镇战役计划。确定的作战原则是：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后续部队；同时，以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继续围困甘泉，以另一个团在羊泉镇地区配合游击队积极活动，牵制郾县、中部之敌，阻敌西援，以保证直罗镇胜利歼敌。

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又召集了两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自动员，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会上详尽地分析了敌情，讲解了我军的打法。他援引《水浒》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王教头的故事，风趣他说：林冲打王教头，不是先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他反复强调，全体同志要互相团结，同心协力，共同打击敌人。周恩来要求参战部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去做，争取胜利。彭德怀提出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消灭敌人！

根据敌情，毛泽东决定首先歼灭由合水东进的敌先头部队——九师。红一军团隐蔽在直罗镇以北的石嘴、凤凰头地区，红十五军团隐蔽在直罗镇东南的张村驿地区，并以一个连诱敌进攻。

11月18日，毛泽东组织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团以上的干部在张村驿会合，前往直罗镇去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直罗镇是个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

镇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镇北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红军指挥员们把几十架望远镜举在眼上，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房屋，都是指挥员们观察研究的对象。大家认为，把敌人放进直罗镇打，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毛泽东说；直罗镇是个好地方，我们要的是歼灭战。

11月20日下午，敌一 九师推进到直罗镇附近，与红军担任诱敌任务的连队接触。该连且战且退，敌误以为红军败退，遂进入直罗镇，并占领了周围的山头。全师杀猪宰羊，庆贺“胜利”。

当晚，毛泽东下达了命令。按照事先确定的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吴家台北端高地几孔破窑洞附近。毛泽东就在这里直接观察战斗情况，指挥战斗。战斗打响前，毛泽东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打响后，一军团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毛泽东再次指示：这个仗一定要打好！你们二师突击到直罗镇时要很好协同十五军团作战，彭德怀跟十五军团行动，要特别注意同他联系，要加强团结和协作。毛泽东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战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南北两路红军犹如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来。敌一 九师大部被歼灭，该师师长牛元峰带1个多营逃到镇东头的小寨子里，负隅顽抗，后来在等待援军无望的情况下突围逃跑，被十五军团彻底消灭。

在解决了直罗镇之敌后，一军团回师北进，欲消灭黑水寺的敌一 六师。但一 六师得知一 九师被歼后，立即逃跑。毛泽东命聂荣臻率一军团追击，一军团不顾雪大路滑，跟踪追击，在大白镇附近消灭了该师1个团。毛泽东要聂荣臻在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并捎话，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我们俘虏的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后因该师师长沈克态度不明朗，毛泽东认为穹之谈判再谈无益，便让一军团从太白镇撤回了。

整个直罗镇战役取得了重大战果：敌一 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共俘虏敌人5300多名，打死打伤敌10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对于俘虏的敌人，在进行教育之后，将他们放回去了，这对于日后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作用。

直罗镇战役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作战意图。毛泽东一贯主张打歼灭战。他认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直罗镇战役也是如此。敌一 九师全师的覆灭和一 六师一个团的被歼，彻底打乱了敌军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敌一 八师、一一一师退回了甘肃，一一七师退出了郿县。敌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以失败而告终，陕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扩大。因此可以说，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善于指挥歼灭战的又一范例。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教堂里召开了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阐述了直罗镇战役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直罗镇的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他分析了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是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是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三是

战斗准备的充足；四是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是造成胜利的原因，今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他还说，中央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和“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已经完满地实现了。

毛泽东还分析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与下次胜利的关系，指出由于胜利，最后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他强调时间与地区对于红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来进行准备两次“围剿”之间的一切基本工作。

毛泽东以他善于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语言详尽地说明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次胜利使刚刚会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得到进一步加强，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巩固苏区，猛烈地扩大苏区。我们的胜利还告诉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我们不准许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与全国，不准许国民党卖国到底的。全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五省与海边各省的人民，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威胁之下，正在国民党用刺刀、用鞭子、用欺骗宣传强迫去当亡国奴而没有援助的时候，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同胞们不要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我们把捷报发出去，你道他们听了高兴不高兴？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还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并且有助于国际反帝国主义战争。

毛泽东生动的语言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精神振奋，热血沸腾。接着，他又分析了当前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指出世界时局与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和中国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有良好的阵地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向前发展着。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新任务就是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并粉碎之，开辟苏区到晋陕甘绥宁5个省内，到那时将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把抗日战争掀到最高的程度，这是总的任务。然后，他还就发展游击战争、一方面军的具体任务谈了一些计划。最后他强调，只要我们的同志拿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去进行自己的工作，伟大的胜利是我们的。

毛泽东的讲话对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了总结，表明通过直罗镇战役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上反对敌人“围剿”的问题，表明中央奠基陕北的任务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革命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毛泽东在东村教堂举行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天，电告张闻天：我或于数日后回后方一行。12月13日，毛泽东顺利抵达瓦窑堡，他于深夜电告彭德怀：我们已到瓦窑堡。此后，他在这里居住了6个多月，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导演了政治的、军事的一幕幕精彩活剧。

## 第二章 迎接抗日高潮

### 一 新策略

陕北瓦窑堡。

这是陕北少见的一座漂亮镇子。镇上，孔孔窑洞错落有致，有里外三道城墙，约 2000 户人家。1935 年 10 月，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先期到达瓦窑堡后，这里便成为红色政权的临时“首都”。

12 月 13 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胜利之后，来到瓦窑堡。他住在临中山街的一个后院里。这是陕北边区银行的院子，院内有四孔砖窑洞，本来安排毛泽东住在银行经理的房子里，但经理下乡未归，毛泽东就让警卫员打扫了一下西南角坐西朝东的两孔窑洞，一孔作办公室，一孔作宿舍。

毛泽东到达瓦窑堡以后，征尘未洗，就立即投入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工作中去。

其实，还在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已在考虑政治路线问题了。在 1935 年 6 月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听取了博古关于从无线电中得知的日军向北平开炮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同时加紧开展对东北军和其他白军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但当时因战事紧急，未能再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这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于七八月间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考虑到自 1934 年夏起就与中共中央失去通讯联系这一情况，为了尽快地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精神，会议还未结束，就派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详细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条件、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在 11 月 3 日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但因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二天就上前线去，中央机关也正向瓦窑堡转移，这次会议就延搁下来了。

11 月初，张浩化装成小商人，经蒙古秘密潜入陕甘边区，辗转来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张浩多次同，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交谈，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据此，中共中央于 11 月 13 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 月 28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11 月 29 日和 12 月 6 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讨论了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形势下的统一战线问题和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

直罗镇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已被粉碎，边



区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但这时红军的主要对手仍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这支军队内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如何对待他们的这种要求，建立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并扩大陕甘苏区所必须认真考虑和正确解决的十分现实的问题。因此，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就成为十分紧迫和必要的了。

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后，中共中央立刻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进一步听取了张浩的汇报，并对中央作出的各项决定表示赞同。12月17日，会议开始举行。

此时的陕北，已是隆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着黄土，格外给人以寒冷的感觉。然而，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各抒己见，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毛泽东也异常激动，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的1935年以来的国内形势的情况，一幕幕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张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强化对东北侵略的同时，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下变华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然而，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却采取步步退让的政策，华北主权在沦丧！华北大地在呻吟！华北人民在哭泣！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莘莘学子首先觉醒。他们感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于是，北平大中小学的学生冲破了重重阻拦，12月9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际，走出了校门，走上了街头。他们从心底里发出愤怒的呐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华北人民在反抗！全国人民在支持！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在发生变化！

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会上作了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说，战略方针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对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而博古却不同意，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并引经据典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对博古进行了反驳，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并说，你们老是从马克思那里找根据，难道我对老祖宗就不忠、不孝么。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

11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从国内看，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二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的阵线是扩大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27日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这天，坐落在瓦窑堡龙虎山下的基督教堂内座无虚席，中央机关干部、

省委市委各部部长、党校学员、各县县委书记共 400 余人聚集在这里，聆听毛泽东的报告。

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作了精辟的分析，并以此论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一变化犹如巨石入水，引起串串涟漪，即引起中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不定。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中国面临着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或即将发生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必须花大力气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底下。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认为，他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地主买办阶级也分成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的利益集团。当日本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时候，帝国主义之间及它们各自支持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明争暗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毛泽东非常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认为这是党内最主要的倾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一时泛滥。他们相信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从所谓的阶级路线出发，顽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全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是最危险的敌人，农村的富农亦然，对他们一步也退让不得。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并提出同红军联合。教条主义者尽管也同他们进行了谈判，但他们还是认为这是一种阴谋，在同蔡廷锴握手的瞬间还要骂他一句反革命。毛泽东以诙谐的语言，刻画出来的教条主义形象，让人望而生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深刻地批判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泽东还论述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标志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突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樊篱，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毛泽东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运筹帷幄。他单独或与别人联合给国民党元老、地方实力派首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写信，阐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6 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十六路军上，力争以“西北大联合”促进全国大联合。瓦窑堡会议后，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还成立了以张浩为书记的白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做苏区周围地区的统战工作。1 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 20 余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张学良、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万福麟并

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具体办法。这就打开了同东北军谈判的大门，也迈出了同东北军联合的第一步。

为了加快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的步伐，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亲自选派一些原来就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有一定关系的人到西安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10月22日，红军在榆林桥战役中生俘了东北军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原是张学良的前卫队营营长，是张的亲信之一。他被俘后，准备一死了之。红军对他进行反复的思想工作，使其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一天，他主动要求回西安去宣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和红军联合抗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将这个情况迅速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同意了高福源的请求。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秘密返回西安，不久便见到张学良。张学良为试探高的底细，导演了一场挥泪斩爱将的活剧。高福源慷慨陈词，把在红军中所见所闻告诉了张学良，使其深受感动。张学良当即表示要同中共高级领导人直接接触。1月16日，高福源返回陕北，把在西安的情况和张学良的要求，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表扬高福源干得不错。经过研究，毛泽东决定派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会见张学良。2月25日，李克农到洛川，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等五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在同李克农会谈中，张学良坦率他说：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最后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面谈。会谈结束后，李克农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行动。当天得到中央复电，同意谈判结果，并要他到山西石楼前线当面报告。

这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都随军东征在山西前线。李克农在3月16日赶到石楼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同张学良谈判。

恰好在这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王世英在西安同杨虎城密谈后，也经瓦窑堡来到石楼，向中央报告。杨虎城是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共产党员有着友好关系。共产党员南汉宸在1931年曾担任过他的秘书长。1935年11月，正在天津的南汉宸委托申伯纯去见杨虎城，告诉他《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双方合作。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当他了解到汪锋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中共地下组织工作，对十七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后，便点名要汪锋去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汪锋与刘志丹等被释放后，毛泽东多次召见汪锋，同他一起分析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历史与现状。毛泽东在同汪锋谈话中说，十七路军是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击，有可能把杨虎城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接着，毛泽东又诙谐他说，我们要像姜子牙钓鱼一样，愿上钩者上钩，不愿上钩者就让它逍遥地去游，耐心等待。毛泽东说，杨虎城将军虽然好，但他周围有坏人，有国民党特务。

成功时凯旋而归，失败了成仁而回。毛泽东还具体嘱咐汪锋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应注意的问题，一是不要决裂，要谈和；二是对杨虎城部队要作分析，多鼓励其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毛泽东还写了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等人的亲笔信，让汪锋带交杨虎城等。12月5日，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同杨虎城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同月下旬，王世英又经南汉宸介绍，从天津到西安会见杨虎城，并同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的四项协定。

这样，中共中央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联络渠道都正式打通了。

正当中共中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的时候，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于1936年3月到达山西前线。周恩来、博古也从瓦窑堡来到山西前线。中共中央随即于3月20日至27日在山西孝义，石楼一带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二、目前战略方针；三、同张杨的谈判问题。

在3月27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作了分析，他将国民党分为民族改良派和民族革命派，认为民族改良派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这些人，坚持反革命立场，但这些人也想同傅仪、殷汝耕等汉奸划清界线。他们内部是不统一的。民族革命派又分为左右两派，右派是由于日本的压迫与民众的压迫从民族反革命中分裂出来的，右派中的右翼如孙科、于右任等等。右派中的左翼如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等与蒋介石有较大的区别，主张抗日，但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不同意联俄联共。民族革命的左派是以宋庆龄为代表，包括军人的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左派坚决主张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之勇气。因而我们的方针不仅要把民族革命派和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也要把民族改良派的左右两派区别开来。毛泽东还指出，2月份中央军委关于李克农同张学良谈判的训令仍然适用，这就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针对国民党“取消苏维埃”、“取消暴动”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对此要以“取消国民政府”、“取消国民党的压迫”对抗之。他还强调，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与之谈判，而且谈判不能破裂。最后，毛泽东提出，有关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军委，有关政党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中央常委。统战工作的全部工作均由中央常委指挥。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由中央常委和李克农、王世英以及上海特科派来汇报国共两党恢复联系情况的张子华单独谈话，交待有关谈判事宜。

会后，按照会议的方针和部署，毛泽东继续留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博古回瓦窑堡，继续与东北军的谈判工作。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向延安进发。4月9日晚至10日凌晨，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中举行会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坦率地提出：根据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听完他的意见后，马上表示：毛主席也有这个想法，我可以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毛主席。

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留在瓦窑堡的中央负责人立即召开会议，

听取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同意谈判结果，并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4月14日，毛泽东、彭德怀从山西前线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从此，就由周恩来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经过延安谈判，中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河西后，因东北军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将瓦窑堡让给了东北军。毛泽东移住保安后，一面部署红军西征，一面继续开展统战工作。

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党争取东北军抗日，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

7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对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它“可为很好的模范”。毛泽东指出，由于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工作次序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建立游击区，第三建立联合战线；现在应改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

为了推进西北联合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写信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阐述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8月，毛泽东在给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写道，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重大之裨益。并告诉王以哲，近日外间谣传蒋介石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学良。毛泽东表示，只要蒋介石敢于倒行逆施，红军将全力以赴支持东北军，并唤起全国民众的支持。希望东北军内部加强团结，防止敌人的分化。毛泽东的信情真意切，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将士的心，促进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初步联合。

8月13日，毛泽东写信给著名爱国人士、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利用自己在西北的影响力，加速推动西北各部实力派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工作，努力共同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杜斌丞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积极活动，促进杨虎城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首领同中共合作。在给杜斌丞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还给杨虎城写信，阐述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的道理。希望杨虎城将军同意联合战线的“冷静态度”，转为积极行动，并表示愿意帮助杨部处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派张文彬到杨部商谈融洽双方关系的具体办法。张文彬到达西安后，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红军与十七路军的联系得到加强。

大约在1936年夏秋之间，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合初步实现。尽管有时枪声不断，但实际上出现了“西线无战事”的奇特景观，特别是夜晚，三方士兵常在一起联欢，共度美好时光。

毛泽东身处西北，首先考虑的是红军及陕甘根据地的安全，因而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陕甘根据地四周，争取尽快实现西北大联合，以免红军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全国的大联合，西北大联合必然是暂时的和不牢固的，而且更重要是没有全国的大联合，就没有实现抗战并争取抗战的胜利的基本条件，对此，毛泽东头脑异常清醒。所以毛泽东没有囿于西北，而是把统一战线的视野扩大到全国，扩大到国民党。

还在红军东征山西时，毛泽东除指挥红军作战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

的机会与形式开展争取阎锡山和晋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4月中旬，红十五军团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晋军第三九二团团团长郭登瀛。后来，毛泽东决定让他回太原去做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郭登瀛回山西前，毛泽东设宴为他送行。席间，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阎锡山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在绥远让出十几个县作为红军抗日的根据地；二、如果第一条办不到，可在雁北让出一条路，允许红军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侵略者；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还修书一封信让他带交阎锡山，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郭登瀛回到太原后，向阎锡山递交了毛泽东的信，陈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这些在山西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迫使阎锡山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派驻红军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向国民党军政要员写信致电，阐明“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的道理，主张国共两党摒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同时，他写信给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陈述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吁请他们敦促国民党放弃错误政策，共救中国于危亡之时。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邵力子，批评他“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希望他能接受中共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9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请她为“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作具体活动。宋在国民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毛泽东在信中提出请她把中国共产党派到南京、上海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潘汉年介绍给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等国民党元老或知名人士，以有利于潘开展工作。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上海一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发起组织救国会，发表抗战言论。毛泽东知道后特别感到欣慰，他委托在上海的潘汉年转达他对救国会的朋友的无限敬意。9月22日，毛泽东又亲笔致信蔡元培，赞誉他们的爱国言行，请他于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谋，起而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国防政府和真正民主共和国。在这前后，毛泽东还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写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请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出力。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写给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对于促成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为毛泽东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因此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之中。

在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中共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渠道也逐渐打通。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总体上还是继续坚持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既定政策。因此，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虽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还是将“抗日”与“反蒋”并提的。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上升，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态度，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

同盟，陈立夫偕张冲于 1936 年春到达德国，准备由此进入苏联。但这时蒋介石顾虑重重，认为直接去苏联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又令陈立夫、张冲回国，改由孔祥熙在南京问苏联大使谈判。3 月初，从苏联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密令回到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王明表示，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潘汉年于 5 月初回国作为联系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国内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1 月 22 日，蒋介石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交谈，表示他在下列条件下可同中共谈判：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陈立夫受命寻找同中共的关系后，将这个任务交给交通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经湛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上海特科系统的张子华。但这两人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最早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传递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1936 年 1 月，宋庆龄在上海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行动方便，宋庆龄通过孔祥熙委任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以此作掩护。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介绍张子华与董同行。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西安后，张学良从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2 月 19 日，张学良同陕北中共中央通过电台联系后，派飞机将董、张送到延安，再由骑兵护送到瓦窑堡。2 月 27 日，董、张二人到达瓦窑堡。这时，毛泽东、张闻天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并立即将他们带来的信息电告了毛泽东、彭德怀等。3 月 4 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并周恩来，提出“向彼方提出如下三个条件，作谈判联合抗日具体步骤的先决条件：（一）停止进攻红军，并容许主力红军向河北集中，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二）政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同一天，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报还提出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五项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 月 5 日，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经西安回宋庆龄处复命，从此，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和安排下接通了。

董健吾南返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

根据所掌握的各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3 月召开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会议研究了蒋介石的政治态度，认为他有抗日要求。毛泽东在报告中将他划人民族改良派之列。会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步骤，促进与国民党当局的接触和谈判。

4 月 9 日，毛泽东、彭德怀在给张闻天的电报中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

民阵线宣言》。宣言中所说的各党各派已经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了。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途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这时，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也日趋激烈。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为了全力对付两广事变，蒋介石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因此，由陈立夫主持，通过曾养甫、湛小岑等人经由张子华等人，就国共两党谈判的条件等同中共进行接触。

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13日的讲话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他走向抗日的态度更明确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种变化，在1936年8月间正式放弃了“抗日反蒋”的口号，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8月8日，潘汉年经香港。南京辗转到达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会谈的情况，并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带回一个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去见陈果夫。这就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就此问题作出决策。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形势发生的变化后指出：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在作结论时，他同意周恩来在发言中所说的现在提“抗日必须反蒋”不合适的观点，并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周恩来也分别写信给曾养甫和陈立夫、陈果夫，希望尽快实现直接谈判。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正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从“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指出这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他还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17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潘汉年于9月24日带着周恩来22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和《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保安赴上海，继续商谈国共两党谈判事宜。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可以赴广州谈判，以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先



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但在这时，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企图以武力解决西北问题。在西北上空战云密布的情况下，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直到西安事变前，由于蒋介石坚持收编红军的政策，谈判未取得成果。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表现出娴熟的斗争艺术。一方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另一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又充分表现出灵活性，即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可以作出重大让步，可以变斗争的对象为可以争取的同盟者。然而，蒋介石却把中国共产党要求建立统一战线以及为此而作出的让步看作是软弱可欺，趁机调集30个师的兵力“围剿”陕甘根据地，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策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于11月21日进行山城堡战斗，歼敌1个旅又两个团，达到教训蒋介石的目的。

打是为了逼。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逼蒋抗日的方针，而是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10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张学良，宣布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阻拦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请张学良转告蒋介石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26日，毛泽东等46名红军将领又直接致信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话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张学良向蒋说了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亦讲了，都碰了钉子。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怎样处理红军的问题，焦点是在这里。最近他要我们照广西的样，要服从中央，改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表面上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12月1日，毛泽东等再次写信给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告诫蒋介石“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但是，蒋介石还是执迷不悟，并于12月4日再度飞抵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终于诱发了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正在西安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高级将领，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的发动，包括捉蒋的一切部署，中共丝毫未曾参与。12日2时30分，中共中央从中共在西安的代表刘鼎发来的电报中得到了事变发生的消息。与此同时，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既感到突然，又对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事变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他指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虽然事变是

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其事，但是，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毛泽东分析了事变的三种前途，（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以威逼蒋系直接统治的东南七省就范；（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之下，这是中心的一环。毛泽东还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些方面，都有好处”。但毛泽东同时也认为蒋最近的立场是“中间的立场”，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毛泽东主张对事变的公开反映应谨慎，指出：我们暂不发表宣言，但实际行动上，应是积极的。在毛泽东发言之后，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了“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的主张。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最后，毛泽东总结说：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他再次强调：为了争取群众，我们不轻易地发宣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明确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在西安建立不要政府的名义但实际上是政府性质的机构。他同意朱德。张闻天的意见：在军事上采取防御。

毛泽东在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对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和如何处置蒋介石，还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但他对蒋介石是“中间立场”的估计和“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的意见，反映出他仍未改变在事变前对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到抗日方面来的估计，包含了争取蒋介石转到抗日立场的可能性。

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在周恩来出发前，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等联名于14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并建议立即由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应急变。15日，毛泽东等15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实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

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并呼吁“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同时，中共中央电令潘汉年，要他在南京、上海“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也是在同一天，周恩来身负重任，启程赴西安。

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举行会谈，并了解国内外对事变的反映。当晚，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他所了解的情况，提出要“保蒋安全”。这个处置办法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国民

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形势的两个方面，即当前严重的内战危机（黑暗的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光明的方面）。他说：“现在是黑暗与光明的两个方面都在发展的，不过光明的被黑暗的所掩盖着。”“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他又说：“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西安事变后，对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他强调：“西安事变的前途，有胜利的前途，有失败的前途。如果在这次战争中，抗日军方面打了几个胜仗，将使光明势力更要起来。”在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之后，毛泽东在结论中突出地谈了战和这个中心问题。他说：“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六是国际。”“我们应把这六种力量团结，使内战结束。”又说：“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在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通电》，将召开抗日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并倡议将会议由西安改在南京举行，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13日政治局会议“以西安为中心”的设想，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方针。至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正式确定下来。

21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批准了周恩来拟的同国民党南京谈判的方案，并对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局势、我党的策略、谈判条件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等作了进一步详细的指示。经过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政府代表三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开西安经洛阳回南京。在飞机上，蒋介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颠倒黑白，歪曲事变真相。27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发表声明，意欲对口头诺言予以否认。28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驳斥了蒋介石的种种谬论，敦促他实行已经允诺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希望蒋“言必信，行必果”。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毛泽东在1937年3月6日给任弼时的电报中，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毛泽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毛泽东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和回答有关疑问。

毛泽东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

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息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

一个学员含着眼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

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他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心是纯洁的。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帜，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进逼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那就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有学员问，不杀蒋介石，也不要这样快就把他放掉？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明白，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把他放回去，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他的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更好么！

当时还有人担心，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可言，放了他，他会抗日吗？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分析。他说，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接着，毛泽东打了个生动的比喻。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的种种疑虑，从而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步骤推动国共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成为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从1937年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往返于延安、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达7个月之久的谈判，商讨建立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毛泽东虽未直接参加谈判，但他密切注意谈判的发展变化，通过电报通信等形式指挥着谈判桌上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既坚持正确立场，又作出一些重大让步，迫使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

1937年5月29日，“红都”延安张灯结彩，墙上贴着“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

“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权利，促进对日抗战”等标语。毛泽东亲自布置延安军民迎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的到来。下午5时，“中央考察团”一行21人，在红军代表叶剑英、陈赓陪同下到达延安。晚宴后，中共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在欢迎词中说：这次欢迎大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与那时不同，民族危机比那时严重，因此，今天国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大的。过去十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民族危机严重，如果国共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考察团此来，使国共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重大的。毛泽东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一种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只是临时的策略。指出：考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欢迎会。就是国共合作的表现。毛泽东还对共产党过去执行革命三民主义的情形，以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还形象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的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然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章怎样写，共产党的笔已经在乎里了。”第二天，毛泽东又在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部队在城南门外大操场上召开的纪念五卅运动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上作了报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毛泽东富有感染力的讲话和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考察团了解了中共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诚意，表示回南京后要将边区各界的愿望和表现，转达给国民党政府，以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势日益明朗化，为使全党明确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政策、策略，作好迎接大转变的准备，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在延安举行了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5月的延安，正是大好时光，红艳艳的太阳，照在宝塔山上，光彩熠熠。来自全国的代表们相聚在这里。5月3日，毛泽东穿着一套普通的布衣军装，裤腿上还补了一个大补丁。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开始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他说，蒋介石他想当中华民族的官。日本人一来，想完全征服中国，采取了“过硬政策”，要打他，他就当不成官了，就要反抗，逼上了梁山嘛，这就和我们主张抗日一致了，我们要推动他抗日呀。接着毛泽东又说，为了巩固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任务就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呢，毛泽东提出，一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各个阶段的具体目标；二是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三是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联盟；四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报告后，与会代表进行三天的讨论。毛泽东在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的基础上，5月7日又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报告，对大家讨论中提出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现在日本后退了，这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着他改变了侵略方式，但后退是假象，想用这种表面后退假象，迷惑我们，

来破坏我们刚实现的统一战线。针对有人对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想不通，毛泽东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日本想霸占中国这块土地，我们要保卫这块土地，这是主要矛盾，是这块土地到底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的大问题，其它的问题都是次要的。当说到目前出现的蒋介石镇压革命的事件和破坏活动时，毛泽东承认这是事实，但又指出，这是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他说，我们共产党又不是神仙，有这么大的本领，一个早晨就把坏事统统去掉？本领是有的。毛泽东要大家看到，蒋介石对人民，已从硬的政策，改成软的政策。为什么能变呢？因为日本要打他，他想反抗，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我们要抗日，也在找同盟军，人越多越好嘛。毛泽东号召全党花大力气去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统一战线。

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 二 打通国际路线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运筹帷幄的同时，也在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根据地，实现军事战略计划而日夜操劳着。而这时的军事战略，是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治战略相辅相成的。

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他又指出：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毛泽东在阐述这一主张时，明确指出：目前形势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力争在1936年2月以前巩固陕北现有根据地；在7月以前扩展苏区到山西；之后由山西转进绥远，设法通过外蒙“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尤其是得到苏联在装备和物资上的援助。

从这个决议的内容来看，这时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二是“打通国际路线”。而这两个任务又是统一的。

其实，早在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从战略上考虑过“打通国际路线”的问题。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就曾指出：西北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很有意义。在毛泽东和张国焘发生分裂之后，毛泽东在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修养兵力，扩大队伍”的任务，长征到达陕北后，因为找到了陕北这块新的落脚点，中共中央曾在1935年10月一度改变靠近苏联的设想。11月张浩来到陕北后，带来了斯大林关于红军主力可向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发展，靠近苏联的指示。据此，中共中央又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11月30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去，完成与苏联及外蒙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12月瓦窑堡会议作出红军东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决定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着手东征的准备工作。

12月24日，中央军委下达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拟订的《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月26日，毛泽东等离开瓦窑堡东进，28日到达延长县城。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城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部署了兵力，调整了干部，正式组成“中囚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2月5日，刚刚过完春节，毛泽东带领东征军总部机关从延

长县城出发，向清涧方向前进，当行至一条小山沟休息时，毛泽东对随行的总部工作人员说：今天我向你们讲两件事，第一是要注意保密；第二要搞好群众关系，严格遵守纪律，多向群众了解情况，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2月6日，毛泽东等到达清涧县袁家沟，当晚下了一场大雪，红军渡河时间不得不推迟。

2月7日，大雪初霁，寒风凛冽，毛泽东来到黄河岸边，他身披布大衣，脚穿一双旧棉鞋，气宇轩昂，步履稳健，踏着积雪，伫立河岸，触景生情。

奔泻在崇山峻岭的九曲黄河，作为一道界河，把秦晋二省分开。土皇帝阎锡山依托黄河天险，负隅顽抗。沿河各县的树木全被他们砍光，河岸被削成陡壁，所有的船只都被勒令停在东岸。沿河渡口，明碉暗堡，交通要道部设置了障碍。阎锡山还加强了特务统治，制造白色恐怖，企图拒红军于河西。

毛泽东心里想，渡过黄河必然是一场恶仗。这对毛泽东来说算不了什么！面对莽莽雪原，毛泽东感慨万千，也引起诗兴大发，他以英雄主义的气概写下了《沁园春·雪》这首不朽之作：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馀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毛泽东在词中，大笔挥洒，描写北方雪景，又纵横议论，评古今人物，表现出非凡的精神世界。黄土高原，地形地貌，颇具特色，有大片的丘陵，山原上，小山包一个接一个，既不大，也不高，登高远望，四面无数山包绵延起伏，与天相接。因此，毛泽东在大雪纷飞覆盖原野之日，感到山像银蛇飞舞，原似大象奔驰，欲与天公比高低。这既是自然风光的生动再现，又是



毛泽东热爱祖国的心境的形象表露。毛泽东由雪景而想象到雪后天晴的壮丽景观。江山如此可爱，岂容日本侵略者和封建余孽横行霸道。在美丽的山河上，曾经培育出无数英雄人物，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或是成吉思汗，他们竞相向祖国壮丽河山“折腰”，但未能使美丽的祖国河山完全称意。毛泽东相信在今天，一代风流的出现，会使多娇河山更加风光。这一代风流人物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英雄的红军将士，就是广大人民群众。

2月18日，东征军总部在延川县清水关附近的古峪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东征有三个任务：一是从外线分散敌人兵力，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全国的反内战反饥饿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还指出：当前，我军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渡过黄河。阎锡山吹嘘的钢铁山西，我们一定要打破它。同一天，彭德怀、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19日，毛泽东致电各部队：“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

2月20日20时，渡河战斗开始。毛泽东、彭德怀等亲临岸边指挥。各军团突击队和先头团在预定的渡河点迅速突破敌军黄河防线，控制了河岸滩头阵地。随后积极扩大渡河场点，掩护主力部队渡河。22日，毛泽东率总部工作人员由清涧县河口西辛关渡过黄河，第二天到达义碛镇。到23日，红军全部控制了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各渡口，占领了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随即继续扩大战果。3月初，毛泽东率总部随红十五军团到达孝义以西的兑九峪、阳泉曲一带，红一军团也向总部靠拢。

这时，阎锡山急令晋军3个师10多个团向这一带集结，企图阻止红军东进。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兑九峪给敌人以打击。3月10日，毛泽东等从郭家掌出发，登上金斗山，指挥兑九峪战斗。战斗进行了一天，后因发现敌人不是原来的4个团，而是3个师，于我不利，毛泽东当机立断，令红军撤出了战斗。同一天，彭德怀、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

撤出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于3月12日在郭家掌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说：国民党反动派不许我们东进抗日，要阻止我们在黄河以西，这个企图破产了。阎锡山吹嘘的铜墙铁壁山西，我们打进来了。在讲到今后任务时，他说。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调动敌人，同时要迅速地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确定了新的军事部署，将东征军分为左、中、右路，开始新的作战行动。

毛泽东率东征军总部机关，只带特务团、少数参谋、警卫人员约500人，带一部电台向晋西转移。3月20日到达康城村。毛泽东在干部会上说：左右两路军已经胜利地打出去了，我们是中路军。中路军部队虽少，但是要做大事情。我们要在晋西一带和敌人兜圈子，要准备多走些路，投入新的作战行列。

当红军继续东进时，蒋介石派来的7个师的兵力已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拦阻红军。同时，驻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也沿河北上袭扰陕北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逐步收拢兵力，准备集中歼敌。到4月17日，集中完毕。但在这时，敌人也跟踪围攻过来，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而消灭之。在这种形势下，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分析了山西和陕

西、甘肃的敌情之后，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首长，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了渡河命令，规定利用夜晚，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当晚红军开始西渡，到5月5日全部渡完，进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毛泽东也于5月2日西渡黄河，4日率总部到达延川县杨家屹台村。5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10日，毛泽东率总部移驻延川县大相寺村。

在大相寺期间，毛泽东于14日至15日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的经验。会议在一座寺庙里举行，庙内的立柱上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提高觉悟，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首先肯定红军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同时，他又对一些同志在东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本位主义、自由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号召大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做好革命工作。会议最后由毛泽东作了总结报告，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本位主义。本位主义是害人的东西，打倒了它，我们就有了更加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这次会议还决定红军进行西征。会后，毛泽东离开大相寺于21日返回瓦窑堡，受到热烈欢迎。

在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中，共消灭敌人约7个团，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大炮20余门，扩大红军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这次战役不仅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而且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但是，东征只完成了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三个步骤中的前两个步骤，第三步战略目标即从山西经绥远、外蒙打通苏联的目标并未实现。实际上，红军东征的总的战略目的，正如毛泽东、彭德怀于1936年4月2日致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是通过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的办法，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中心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所以在红军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和中央立即部署西征，以图实现“打通国际路线”。

红军东征回师时，虽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无视中共的这一倡议，调集16个师另3个旅，并着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任总指挥，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种形势，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对日抗战。据此，赋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任务是：向西面进攻，以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并向北打通与苏联、外蒙古的联系，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东面坚持游击战争；南面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执行这三项任务的目的是争取时间、空间和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准备条件。

西征是1936年5月14日至15日的大相寺会议决定的。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西征的出发点是把包围陕甘的国民党军队，从内线引到外线，打击马鸿逵、马鸿宾封建势力，扩大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一切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北上；开展宁夏局面，打通国际路线，接受援助，以实现抗日作战。

据此，会议部署了红军西征甘肃、宁夏的行动方案。

5月18日，在大相寺召开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

从5月19日开始，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川、延长地区西进。左路军红一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经永坪、幡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和直属队随右路军跟进。

这时，敌人发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遂调兵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遗防由东北军派队接替。毛泽东一面致电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一面于5月26日致电彭德怀，要红一军团立即由吴起镇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并指出：在执行此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6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横山、定边之间的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在7月半以前完成初步赤化。

此后，西方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彭德怀等指挥下，向西发动进攻，到6月中旬，已占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征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

接着，西方野战军始攻宁夏。彭德怀于6月12日在给一军团首长的指示中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坚决消灭马鸿宾部，“以便开展宁夏局面，打通苏联”，接受援助，实现对日作战。到7月底，西征部队沿陕甘宁边界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苏区，扩大了红军，征集了大量资财，为随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西征过程中，西方野战军一面坚决打击马鸿逵、马鸿宾军，一面对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尽量避免同东北军作战。6月中旬至7月初，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7个师企图向西征军进攻。毛泽东得知后，于7月14日电示彭德怀。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拟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7月17日，当何柱国以骑六师向红军作试探性进攻时，西方野战军一部一举将其击溃。此后，何柱国鉴于红军已有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遂暂停进攻。在西方野战军官兵的努力下，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进展。

7月2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西方野战军，明确其在8月份的任务是巩固西线，努力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以迎接新局面的到来。根据这一指示，西方野战军从8月开始转入以休整为主，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这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北上途中。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后，屡遭失败，内外交困，被迫放弃川康计划。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复北上，抵达甘孜、炉霍、道孚一带休整。中共中央为实现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于5月下旬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外蒙与苏联已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共产国际期盼中国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一方面

军自东征回师后正猛力发展陕甘苏区，以渐次接近外蒙；四方面军宜趁此有利时机，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以便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行策应。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同意这一方针，准备与上年11月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同时，关于张国焘取消所谓“中央”以成立西南局，暂与陕北中共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同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的问题，各方也取得了一致意见。6月上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中央”，成立西南局。同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红二、六军团改称红二方面军。7月下旬，经中央批准，由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随后，根据中共中央7月20日的电令，红二、四方面军于8月中旬出甘南，形成了与红一方面军逐渐靠拢的有利局面。

这时，中共中央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进展。8月上旬，潘汉年来到陕北后，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希望中共中央尽快打通苏联，取得接济的意见。据此，中共中央确定九、十月间为造成抗日局面，实现西北大联合的最后时机，并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8月10日，潘汉年到西安与张学良磋商。张学良对苏联准备接济红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部署颇感兴趣，并对中共中央的计划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决心以东北军配合红军行动，占领宁夏，打通国际路线。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一、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日战争之实现。二、在9月底以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其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分别攻击陇西和河州，相机消灭毛炳文部和调动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领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凉州、甘州、肃州三州。三、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四、12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对付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过黄河，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五、宁夏占领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以此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红军三个方面军分别出动，攻占了大片地区。至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地区和静宁地区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陕甘苏区粮食、经费困难，难以支撑和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组织“通渭会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河东的西（安）兰（州）通道地区的严峻形势，决定提前执行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集中3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同时，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6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

《十月份作战纲领》给红四方面军规定的任务非常明确。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渡河攻宁。随着战局的发展，红军渡河已刻不容缓。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彭德怀：“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河西岸。”此时，红四方面军已造船16只。朱德、张国焘遂令三十军当晚渡河，未获成功。10

月 25 日，三十军渡河成功。至 28 日拂晓，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和九军渡河完毕。29 日，因南线敌人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已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至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这样，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

河东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逐次东移，诱敌深入，于 11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山城堡战役中，歼灭敌胡宗南部 1 个多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随后，河东红军按照军委的指示，在环县、定边、盐池之间地区休整，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作准备。

为了从组织上保障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主席团于 12 月 7 日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决定以毛泽东等 23 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 7 人组成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

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下，不顾疲劳，英勇进击，迅速击破敌骑五师两个旅的阻击，占领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打拉池一线，歼敌一部。从此，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征程。

10 月 30 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九军、三十军暂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但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实施，使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深为焦虑。11 月 1 日、2 日，徐、陈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过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2 日，毛、周致电徐、陈：“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3 日，毛、周又致电朱、张、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5 日，朱、张电示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必要时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但在这时，马步青、马步芳部已向河西部队发起了疯狂反扑；根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6 日，徐、陈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准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集中 3 个军向平番、大靖、古浪、凉州一带前进，并准备于 12 日、13 日出动。张国焘当日即批准了这一计划。

11 月 8 日，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点是红军主力离开陕甘苏区，分南、北两路军东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10 日，中革军委电令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批准成立以陈昌浩、徐向前为正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中央这个计划是一个带根本性变动的战略计划，它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方针和部署。从此，西路军开始独立地肩负“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

11 月 9 日，西路军（包括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及骑兵团、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共 2.18 万人，由镇虏堡、打拉池、锁罕堡一带分两路

向西出动。而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有马家军阀部队 3 万人和地方保安民团约 9 万人。11 日、12 日，毛泽东、周恩来先后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询问西路军“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能否解决衣服问题？”12 日，西路军领导人复电：“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毛泽东、周恩来于 15 日复电西路军：“同意你们向凉州进”。

根据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西路军于平、大、古、凉战役后，11 月中旬进入“河西走廊”，占领了凉州、永昌、山丹一线。徐、陈计划待部队稍加休整后便继续西进，第一步占领甘州，第二步移肃州，12 月上旬以一部抵安西，力争年底以前接通新疆，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后，再回师策应河东。

11 月 21 日至 24 日，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致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反映现全军人数共 1.8 万余人，部队疲劳，弹药、冬衣缺乏，但士气甚旺；马敌伤亡虽已 5000 以上，但能迅速补充，继续与我作战；当地地形不便打运动战，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红筹资较难；我军战线甚长，人员、弹药有减无增等情况。同时建议西路军如在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至甘州、肃州问再战。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如取到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之敌，配合红军主力行动。11 月 23 日，中央领导人电告西路军：“‘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并告毛炳文部有东撤消息，指示他们应力避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敌人一部的歼灭战，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25 日和 28 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要他们在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并指出：“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在作战方面，应当集中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他还指出，我的意见把全部 1.8 万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

这样，西路军便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永凉地区一线摆开，终日与优势敌人搏斗，从 11 月 22 日至 12 月上旬，连续进行了四十里铺、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等战斗，毙伤敌 6000 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西路军虽英勇杀敌，视死如归，但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人员减少至 1.5 万人，战斗力大大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于 12 月 6 日连续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河东红军主力乘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进；如红军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当天 24 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此后，西路军主力即在八坝、永昌一带相机歼敌，争取休整扩红，并以五军固守山丹，准备进占东乐、甘州。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同时，放弃了陕甘红军东移的战略计划，改为南下关中地区，以援助东北军和

十七路军抵抗亲日派军队的军事进攻。

对于西路军，中革军委主席团于12月14日电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一面准备接通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18日，军委主席团又电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这样，原拟策应河东的西路军又改为准备西进。

随着国民党来日派何应钦指挥“讨伐军”向潼关集结，直逼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集中主力以兰州为战略后方进行西安会战。张学良考虑到东北军向西安集中后的后方安全问题，向中共提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望西路军派一部力量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进行策应。于是，中共中央改变了西路军西进的决定，拟令西路军东返。并于12月22日致电西路军征询意见。23日，西路军领导人复电，陈述了东返的困难，“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24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再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5日，西路军领导人电复军委主席团，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

但在这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12月底，西路军根据中革军委的电令，再次西进。西路军指战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饥寒交迫，长夜行军，艰苦至极。马家军尾追不舍，不时突袭。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准备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

可是，就在此时，河东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并调兵进逼西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一面与东北军、十六路军联合部署兵力，保卫西安，准备打破蒋介石的进攻。与此同时，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认为这“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并要求西路军“现勿分兵去安西。西路军领导人考虑到留在现地，四面受敌，处境艰险，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1月9日，军委主席团复电指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力战，坚决歼敌。此后，西路军作战更加艰苦，损失重大。

1月16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中央再次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局势有关。一方面，蒋介石兵临城下，如内战再起，西路军东进占领永昌、凉州一带，可策应河、东部队战略退却。另一方面，这时中共与国民党的谈判正在加紧进行之中。西路军问题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共中央一再指示中共谈判

人员，要蒋介石勒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让出凉州至肃州一线，作为西路军的驻地。此时，如西路军主力能消灭马敌一部，东进凉州，乃是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

从1月中旬起，西路军即遭马家军的不断包围和袭击，损失重大，最后全部集结于倪家营子地区的43个屯庄，共1万余人，准备稍加休整即东返。23日，徐、陈致电中央和军委：因敌正防我东进，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加休整，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25日，军委电示西路军：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进避战达到东进目的，危险较大，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任务。与此同时，中央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以西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停止东进。

马步青、马步芳发现西路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后，从1月23日起，先后投入步骑兵及民团共7万余人，向西路军进攻。西路军英勇抵抗，在倪家营子地区展开了一场20多天的血战。

2月中旬，中共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并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的建议提出批评，在2月17日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2月21日，西路军为自救计，突围成功。遂进至西洞堡、龙首堡一线。但是，东进并无中央的命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有顾虑，遂决定重返倪家营子。26日返回倪家营子后，重新陷入敌人的重兵围攻之中。

为了支援、解救危急中的西路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致电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要他们申明中共的正当要求，要蒋介石履行诺言，立即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同时，中共中央和军委于2月27日决定以第四、第三十一、第二十八、第三十二军和骑兵第一团组成西援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领下，准备西进增援。然而，这些努力均未奏效。

3月上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激战之后，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敌人包围，激战5昼夜，于11日突围后又在梨园口遭敌重创，兵力已不满3000人。1月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14日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石窝会议，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余部分3个支队就地游击。至此，艰苦转战4个多月的西路军，终于兵败祁连山。后来，西路军余部七八百人在李先念率领下，沿祁连山西进，经40余天的转战，剩下400余人，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的迎接。

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西路军，于3月16日启程东返。途中历尽艰险，到达延安时只剩徐向前一人。一到延安，毛泽东就接见了。毛泽东简单问过西路军的情况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徐向前向毛泽东建议，再派人找一找陈昌浩，毛泽东表示同意，但一直没找到。原来他在途中留住一位老乡家，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转战4个多月，先后共歼敌2.5万余人，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从开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试图打通外蒙古和苏联，到后来放弃北进计划，执行西进任务，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都是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初派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是从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目的来考虑的。但当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时，西安方面的问题也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的历史宣告结束。到这时，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为不必要的了。此后，毛泽东在为同国民党谈判操劳的同时，领导红军从教育训练、培养干部、加强团结、清剿土匪、巩固后方等方面，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进行对日作战作了大量的准备。

### 三 敞开红色国门

陕北的7月，黄色的沟壑之间点缀着点点绿色的禾苗。远远望去，沟壑中或隐或现地有一行人走动。这是一个向导牵着一头骡子，骡背上驮着简单的行装，后面跟着一个外国人——埃德加·斯诺。他们行进在山谷中，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村落，间或见到一些在田野里操作的农民。黄土高原显得十分宁静。

1936年的下半年，中国的局势正处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全国民众的觉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人民的共同心愿。红军在陕北打退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几次进攻之后，与张杨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前后，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了“两广事变”，蒋介石急于平息内江，无暇顾及西北。他对张杨与中共接触有所耳闻，但在“两广事变”未解决之前不便采取大的措施。因而，在中国的西北一隅暂时无大的战事，出现了局部相对稳定的态势。

斯诺在这种形势下，踏进了中国红色区域的大门。他在苏区徒步行走了一天半，终于到达了安塞县的百家坪。当他正与安塞赤卫队队长交谈时，突然走来了一位军官，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他打招呼，而且用的是英语！斯诺马上就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第二天，他来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表示，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还帮他制订了一份需费时92天的采访计划。

红色区域的大门竟然如此便利地向一个外国记者打开了，斯诺甚至感到有一点惊奇和怀疑。但事实很快就使他相信了中共给他这样的自由活动的诚意。

离开百家坪后，斯诺时而骑马，时而步行，与一小队红军官兵同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当他们看到苍翠的山谷中的一片古老城墙时，便到达了目的地——保安。

斯诺到达保安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虽然苏区曾有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斯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宾”，外交部是第一次从事接待外国人的具体活动。

斯诺到保安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斯诺到苏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会见毛泽东，他跨进红色区域的第一个村庄时，就向当地的贫协主席提出要找毛泽东，但他没有想到，同毛泽东的会面却是这样平静自然。毛泽东同斯诺寒暄了几句之后，告诉斯诺，可以熟悉一下环境，同别人谈谈话，待认清方位后，再去见他。说完便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他和毛泽东初次会面后所留下的印象，“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

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7月16日，毛泽东请斯诺前往他的窑洞里谈话。在斯诺访问期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并且通常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他们的谈话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这一次谈话主要集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上。

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他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当斯诺问及从政治上、军事上看，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如何时，毛泽东作了科学的预测和分析，他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退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差得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斯诺问道：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毛泽东就此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然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

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须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 24 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在满洲和日本内地。

毛泽东接着说，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在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这样，毛泽东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就科学地预见了一般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规律，预见了在战争前期、中期、后期不同的战略战术以及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和最后结局。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把这三个时期更为精确地概括为三个战略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敌之战略防御我之战略进攻阶段。而贯穿于上述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动员全民族抗战，即全面抗战的思想。抗口战争的进程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的准确性，后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更为充分地阐述了上述观点，并说：“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 1936 年 7 月 16 日，即在西安事变前 5 个月，卢沟桥事变前 12 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随后他在文中大段引用了斯诺在《西北印象记》中所记述的他的谈话的原文。毛泽东这些预见的准确性与深刻性，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深为折服，命其部队将领研究这一战略思想，并允许在一向禁止出版共产党人著作的国统区出版阐述这些思想的《论持久战》。这也是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发表后何以能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斯诺本人也说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对于局势具有特殊的意义。

当毛泽东就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谈了上述观点后，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斯诺已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而有点发黄的脸上，斯诺却看不出一点疲倦的表示。他们坐在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旁边，桌上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他们就在烛光下交谈。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香烟。当吴亮平翻译、斯诺记录时，毛泽东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贺子珍也还没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地叫起来。这是

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以至于斯诺产生了疑问：这样的人会是真的认真地考虑战争吗？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的预测是极为准确的。

谈话在一夜又一夜的继续。有一次，斯诺请毛泽东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转变。毛泽东阐述了促成这种转变的三个主要因素。他指出，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第二，从去年（1935年）8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毛泽东认为，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特点，由于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团结的基本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接着，他阐述了这个政府的任务，在这样一个政府之下苏区将要采取的政策等重大问题。他还就抗日战争与阶级革命的关系作了说明，指出，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他还说，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当斯诺问他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时，毛泽东解释说，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所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政策，通过毛泽东之口，详尽地向一个外国记者作了阐述，并通过外国记者之笔，向全中国、全世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

在类似这样的交谈中，斯诺发现毛泽东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间斯诺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斯诺答不上来了。他对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看法使斯诺很感兴趣。毛泽东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斯诺认为，他提的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

策的目标有很明白的了解。正是在这种涉及面甚广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对面向一个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

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回答说，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他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就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毛泽东强调说，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他表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他简要地概括道：“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斯诺进一步问道：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仔细分析了各种类型的国家，指出列强中有一些国家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毛泽东确信，上述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凡是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国家，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统一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作出多大贡献。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华苏维埃对待旧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的态度，指出日本人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各国已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他预测战后的外交政策，将会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他强调指出，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

毛泽东还主张，中国同友好国家应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合作。他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中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

毛泽东还谈到了外国在中国投资的问题。他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

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他在谈话中提到了是否承认中国的外债问题，说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毛泽东解释了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对待外国投资、借款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强调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毛泽东应斯诺的要求，对如何对待外国传教士问题和中美、中英关系问题都作了阐述。

在这种谈话中，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历来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敏感问题。共产国际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推动大革命的胜利进军以及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在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中也出现过严重失误，甚至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正常领导。大革命后期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以及抗战初期出现的右倾错误，均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一贯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教条化的毛{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70\_0142\_1.bmp}泽东，曾几次在所谓执行“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受到打击和排斥，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所制订的土地革命政策被攻击为“富农路线”，他所倡导的并在实践中被证实有效的军事战略战术，也被斥之为退却逃跑主义，因此，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在回答斯诺关于外界说“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这一问题时，详细阐述了他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他指出，第三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卫的集体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一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外，它并无任何政治力量。虽然它的本质和第二国际大不相同，组织上却没有多大的分别，正如没有人会说因为某国的内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因此第二国际就是独裁者，这是极端可笑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或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了。他说，当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然后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才会产生。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提供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不能提前解决的问题。他最后特别强调，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

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毛泽东表达了他一贯提倡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政策，既驳斥了国内外敌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又阐述了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也是若干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开始，未谈正文前，毛泽东常谈一两个短故事。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通过这种交往，斯诺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加深，他看到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生活的各个侧面。他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仍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带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带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中间，玩得很高兴。”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他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代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通过这种深入的往来，斯诺感到，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就连许多日本人也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

斯诺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他请毛泽东谈谈个人生平。但毛泽东通常很少提到他自己或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他像斯诺所遇到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役、战术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一天晚上，当斯诺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斯诺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但是毛泽东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斯诺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他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



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在斯诺的再三争取下，毛泽东终于同意把自己的生平梗概告诉他。

在9月底至10月初连续几天的晚上，还是在毛泽东的简陋的窑洞里，还是围坐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旁，毛泽东娓娓道来，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谈到了他如何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没有任何矫饰，而是辩证地唯物主义地阐述了自己如何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斗争过来，成长起来的经历。当毛泽东叙述到红军的成长过程时，他开始超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这种叙述使斯诺深深感到，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斯诺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斯诺把他的这种感受同毛泽东的生平一起对外发表了，使全中国、全世界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很重视同斯诺的谈话。因为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进步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著述不可能公开发表。而斯诺是一个外国记者，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在国外发表出来，然后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切造谣诬蔑现出原形，使党的事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在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的4个月中，除了7月下旬和9月中旬去前线采访外，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和斯诺会面。毛泽东在地理偏僻、贫穷且又被包围封锁的一小块根据地里，笑谈天下大事，展望未来的国际事务，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语言，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从千里之外，冲破重重阻碍来到苏区的斯诺，对此深为惊叹、折服。他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记述，不仅有益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也使他本人成为世界上能够留下历史性文献资料的杰出的记者之一。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总结或提出了许多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比如他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概况；全面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对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第一次公开他个人的生平历史；第一次公开中国共产党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的预见等等。诸如此类的“第一次”在他的谈话中还可以找到许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内容是对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政策的集中阐述。也正因为这些谈话所包含的这种价值，才使斯诺写的以毛泽东谈话为主干的《西行漫记》成为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广、最多的著述之一。毛泽东曾经看过当时上海出版的中文译本，并曾在延安的

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而斯诺本人说，这本书能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是由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口述的。斯诺认为，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而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斯诺的话是真实的、恰如其分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一直是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禁区”，自斯诺访问陕北，把根据地的新鲜气息传播出去后，外国友人纷纷前往根据地参观访问，红色中国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继与斯诺以及同斯诺一起来到陕北的马海德谈话之后，毛泽东又先后接见了来陕北的史沫待莱、尼姆·威尔斯、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预见抗日战争的规律。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接见的来宾超出了新闻界，扩大到政界、军界要员和来根据地帮助工作的友人。通过这些交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 四 总结历史经验

延安，古称肤施，是一座历史名城。它，坐落在两河的交汇处，依偎在黄土高原的怀抱中，宝塔山亭亭玉立在城南，清凉山似一道屏风隔在北面，延河蜿蜒在宝塔山和清凉山之间。延安周围，无尽的黄土岗，被风雨侵蚀了的波浪地形装饰着贫瘠的田野。

很久以前，这里便是一个繁华的边塞小城。只是连年的战乱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这里逐渐萧条下来。相传某年久旱不雨，饥民在死亡边缘挣扎，是一位老和尚舍弃自己的生命，救活了残存的人们。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舍己救人的恩人，将这个地方称为肤施。这个传说的真伪无须考证。但反映了人们期望救世主的出现，将他们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延安在西安事变前是东北军的防区。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兵临潼关，东线告急，张学良急调在西线的东北军增援东线，所以将延安交给了红军。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保安迁驻延安。从此时起到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

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延安，这一天，心情格外愉快。他风趣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要进陕北的大城市了。”毛泽东一住进延安，很快就对延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像一位学识渊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以深沉的眼光抚摸和审视着延安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审视着延安的人和物。工作之余，他漫步延河边。或登上宝塔山、清凉山，那完成于北宋年间的万佛洞，那范仲淹的题词，那明代的弥勒佛，那清澈的定疾泉水，特别是立于山巅的宝塔，使毛泽东流连忘返。

毛泽东初到延安时住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窑洞，这是黄土高原人民的传统住所，冬暖夏凉是它的最大优点。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办公室兼卧室，陈设非常简单，除了一张三屉桌，还有两个白铁皮的箱子，它是毛泽东的文件柜，有时还兼做办公桌。在那间当作卧室的窑洞里，唯一不同的是一张南方式样的床，四根柱子，挂着蚊帐，行李极为简单，床上一床军用被子，甚至连枕头也没有。每天入睡时，不是把棉衣卷起来当枕头用，就是拿几本书垫在包袱下将就一下，至于吃，毛泽东只能以小米当作主食。连年的征战、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毛泽东染上了严重的肠胃病。毛泽东一天比一天消瘦。这一下可急坏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改善毛泽东的生活。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次，警卫员跑到离延安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向老百姓买了一只鸡。吃饭时，毛泽东见了奇怪地问：“哪里来的鸡？”警卫员把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说，大家的生活都很苦嘛，我应该和大家一样，不应该特殊，下次再不许这样做。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并没影响毛泽东运筹帷幄。还在红军刚刚到达陕北时，全国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深感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党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落实到每个干部的行动中，重新训练干部成为最关键的一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心把原在江西根据地的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把一些久经考验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但又缺乏文化的干部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和深造，以满足形势发展对干部的需求。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大学，他自己兼任红军大学的政委。每当红大开展重大活动时，毛泽东亲自去参加指导，并给学员作报告或讲课。

1936年12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红军大学。这次，毛泽东讲课的题目

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实践。1927年以来又领导土地革命战争长达10年之久。而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的军事斗争还可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使毛泽东有可能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有必要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1936年下半年的陕北基本平静下来，毛泽东在保安红石窑洞里，不知花了多少不眠之夜来思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奋笔疾书。12月的一天，红军大学的学员已经集合好，等待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骑着马来了。要不是他身穿一套红军军装，人们会以为是哪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在给学生们上课。只见他把讲义打开放在台子上开始讲课。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他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精辟分析把学员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理论天地，课堂里，除了毛泽东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其余的人都在静心听着，生怕丢掉一个字。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则拼命记笔记。

接着，毛泽东开始转入正题。他指出，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结果，它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考察了战争发生、发展的规律。他指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下去的，总的趋势是沿着自我消亡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提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著名论断，并明确阐述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共产党人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战争，并通过正义战争来消灭非正义战争。毛泽东花了很大篇幅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着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强我弱，同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作战原则是：积极防御的原则；诱敌深入的原则；集中兵力的原则；运动战的原则；速决战的原则；歼灭战的原则。毛泽东总结说：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战争规律，不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把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毛泽东分三次讲完了这一课题。学员们为毛泽东的渊博的学识和透彻的说理所折服。下课后，学员们还是不肯离去，围在毛泽东周围，提出许多问题，毛泽东耐心给大家讲解，直到深夜毛泽东才摸黑走山路回去。

毛泽东到红军大学讲课是经常的事。为了讲好课，毛泽东作了广泛的调查。晚上，他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邀集来自不同部队的干部学员聊天，了解情况。讲课时，他利用大量的事实 and 材料说明问题，分析得有条有理。大家越听越爱听，甚至还把毛泽东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当作镜子来对照自

己。一次讲课时，毛泽东讲到对问题要加以分析和研究时，他说，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就缺乏研究，别人一鼓励就来劲了，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成勇敢而明智的军事家。有的学员越听越感到毛泽东所讲的东西就是自己来学习之前的事情，听课后，表示要坚决克服自己过去鲁莽的毛病。

1937年初，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基本上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基本形成。形势的发展对干部的要求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有新的变化。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封锁也稍有松动，国内外一些爱国青年开始投奔延安，要求进抗大学习。因此，抗大不仅要继续培训红军干部，还要承担培训知识青年，为革命培养抗日军政干部。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在抗大第二期开学的那一天，毛泽东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欢迎大家到抗大学习。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刀，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还抓住时机，开展了对张国焘右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和清算。

1936年11月山城堡战斗胜利后，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来到陕北保安，同党中央会合。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的一些同志也一起来到保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对他们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今后中央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同志去工作，和你们团结一起，共同进步。

为了逐步肃清张国焘错误的影响，毛泽东作了大量思想工作。

11月，何长工到保安后不久，找毛泽东谈了两个下午。当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十二军的情况，并对随张国焘南下作自我批评时，毛泽东说：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哪个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了解。有关南下的问题不怪你，也不怪罗炳辉同志，你们算老几？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嘛！不要背包袱。

有一天，四方面军的王维舟向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反党，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歧视从川东游击军改编而来的红三十军等问题，毛泽东说，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在甘北尚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你准备。并要求暂时要切守秘密。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进入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学习。毛泽东、朱德等经常到红大看望他们，并给他们讲课，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对张国焘错误的认识。

从1937年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批判张国焘的错误。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首先在会上报告了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泽东等30多人发言，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的错误。张国焘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保证“以后

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会上，许多人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30日，张闻天代表中央提议，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因为在估计到其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也还应考虑到他在党内的历史，是个老同志，曾参加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已开始承认错误，为了挽救他，还应给他时间，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在党内的反映，他的错误已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危害。4月6日，张国焘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书。

会议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党和红军内广泛地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为此，毛泽东作了大量的工作。

4月间，毛泽东在由中央团以上干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上，语重心长他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毛泽东还经常找四方面军的干部个别交谈，进行思想教育。一天，毛泽东来到许世友的住处，微笑着拉着他的手说：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泽东的话解开了许世友的思想疙瘩。

毛泽东还及时发现并纠正清算张国焘错误斗争中一度出现的过火行为。有一次，毛泽东听抗大的同志汇报工作，他们谈到：原四方面军的一个连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战士回答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下这几个战士。毛泽东说：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毛泽东从几个战士的不满言论中，发现并纠正了扩大化的问题，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

经过1937年4月至6月的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总结了经验，明辨了是非，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团结。对于张国焘，中央也于8月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给他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

后来，张国焘于1938年4月借去祭黄帝陵之机，只身逃往西安，后转武汉。林伯渠、周恩来等先后对其进行劝阻无效，他终于走上了叛党的道路。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这是后话。

为了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希望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在1937年5月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向全党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为此，他自己作出了表率。毛泽东10多岁才出山求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几年资产阶级的书，到1920年才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和红军将士又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大多。无怪乎遵义会议前后，当时一位忠实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指责毛泽东：你懂得什么

是马列主义？山沟里还能出马克思主义？这种争论中的激愤之言，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发奋多读些马列的书。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实现西北大联合以后，局势相对平静。毛泽东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阅读了可以收集到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哲学著作。

关于毛泽东在陕北、在延安发愤读书的情况，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刘、彭，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为了更好地组织大家，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哲学，毛泽东还发起成立新哲学会。在新哲学会成立的那天，他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酒席请客，以示庆贺。

毛泽东批阅了大量的哲学著作，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的著作。其中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得最细。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先后在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上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3万字的批注。书中还分别画了许多圈、线。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也作了许多批注。

李达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了，他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结下很深的情谊。后来因种种原因，李达离开了党的队伍，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毛泽东与他也暂时中断了联系。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给易礼容的一封信中询问：“李鹤鸣（即李达——引者注）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1937年5月，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此时，毛泽东与李达已恢复了联系。李达把自己的著作寄了一本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2月1日，毛泽东写的《读书日记》，开头这样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进度。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述很多，其中《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著作，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批读过。他在读完《哲学与生活》后，摘录了三四千字，并写信给艾思奇称赞：“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些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充分利用比较好的客观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他能得到的理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研究理论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据抗战初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回忆：“有一次我去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天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的这些眉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毛泽东发奋读书，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头脑，这就使得对中国革命进行哲学思考的主观条件已经成熟。革命需要理论，更需要哲学思考。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如果能从哲学高度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和全党认识水平所限，没有也不可能在思想上理论上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然而，如果不从理论高度认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及其危害，中国共产党就很难达到团结一致，就很难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对此，毛泽东异常清醒。正如他后来所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思考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的美国朋友斯诺对他写作“两论”的情况有过报道。斯诺写道：“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1937年4月至抗战爆发的3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花了100多个小时给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中的部分）。在授课过程中，他运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等方法，来讲授深奥的哲学理论，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哲学问题。旧中国社会矛盾深重，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其复杂性、尖锐性、曲折性为世界罕见。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在认识矛盾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换言之，社会实践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理论要求，毛泽东正是适应这个要求而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如果说，《实践论》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来阐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解决认识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那么，《矛盾论》则是当时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理论形态，它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有层次地



展开论述。这两篇著作所阐述的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运动在认识论上的升华。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篇伟大的哲学著作，但它不是纯粹的思辨哲学。毛泽东在两篇著作中以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历史经验为分析对象，从中分析哲学问题。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各个阶段的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为例证，来研究事物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强调不仅从其联结上，而且从其总体上分析各个阶段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强调必须对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反对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毛泽东概括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思想。他在《实践论》中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提出真理性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包含了对中国革命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而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的哲学概括；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的思想，既是对在此之前的有关哲学思想表述的进一步的逻辑发展，更重要的，可以说是对中国革命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的比较，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哲学抽象。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提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概念，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运动的最普遍法则的通俗化，也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异常复杂的矛盾运动，并使之成为东方世界的各种矛盾的焦点这一现实土壤的科学结论；对矛盾特殊性的五个层次的精辟分析，既是对有关哲学论述的系统化，但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矛盾运动的种种特殊表现的哲学概括；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的思想，不仅是使矛盾的互相转化的思想在逻辑上贯彻到底，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地位的转化在哲学上的反映。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哲学思考，重要的目的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清除“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左”右倾机会主义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揭示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原阶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至于历史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这两种错误倾向都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左”倾教条主义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割裂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在统

一战线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只要联合不要斗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要斗争不要联合。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不是导致投降主义，就是实行关门主义。毛泽东正确地阐明了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并通过论述这些哲学范畴达到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提供了哲学依据。

“左”右倾机会主义割裂部分与全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他们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部，只看事物的现象，而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这两者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毛泽东批评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毛泽东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他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正是由于毛泽东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又作了精细的理论研究，所以他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概括才富有创见，才具有特殊的魅力，才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思考及其成果培育了党的干部，使他们从哲学高度认清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这为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最重要的准备。

## 第三章 唤起全民抗战

### 一 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7月7日，北平附近的卢沟桥。

夜幕已经降临，天空上挂着稀疏的星星。在恐惧中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或坐在自己的炕头上休息，或同家人闲聊。只有国民党第二十九路军的哨兵们正警惕地注视着城外的动静。

突然，一阵喧哗声由远而近。一队日本兵称参加白天演习的一个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内进行搜查。日本侵略者在制造事端。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卢沟桥是北平的南大门，占领卢沟桥，切断京汉铁路，就意味着实现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中国驻军指挥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正当双方在交涉时，日军首先向宛平县城开枪，随后炮轰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一场全国性的抗战从此打响了。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延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立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诚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接着，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紧急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和全体红军将士，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全国抗战的爆发，促进国共合作步伐的加快，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战爆发前和统一战线建立前，国共两党斗争焦点是要不要抗战和要不要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抗战爆发后和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已转变为如何抗战和如何巩固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尽管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时曾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从一开始，国民党就推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即认为抗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情。

与国民党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把发动人民群众作为抗战的最首要最基本的条件。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针，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八项办法：（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实行国防教育；（七）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的坚固的长城。

正式制定全面抗战路线是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8月下旬的延安，正值雨季，连日大雨，山水卷着流失的黄土，似条条黄龙注入延河，河水暴涨。大雨中，毛泽东把萧劲光找来，委托他去洛川附近确定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地址。不久，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分别从延安、西安陆续到达洛川。毛泽东到达后，被安排住在洛川附近冯家村村中的一处寺庙里。萧劲光为毛泽东借了一张门板搭起床，还借来了一张破旧的桌子。这就是毛泽东的临时办公处和住所。

8月22日，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毛泽东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此，毛泽东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作战原则应该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毛泽东关于军事方针的论述，为抗日战争向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的问题。他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他提醒全党，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党注意。在讨论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政治的总口号是：动员一切力量的十大纲领。目前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同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区别。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也就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表明毛泽东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他想到了常人能想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还想到了别人尚未想到的问题，从而使党的方针政策具有科学的预见性，洛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争取抗战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根据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5日，毛泽东签署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开赴抗日前线。在改编八路军的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曾想派人到八路军担任有关职务，都被毛泽东顶回去。毛泽东始终坚持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八路军，绝对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武装的领导权。毛泽东还抽调一批干部和抗大学员充实到各部队，以加强领导和指挥力量。他认真研究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区域，并致函电或派人同有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协商，以征得他们的配合。他还派郑位三、方方等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等地，向坚持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指导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

新四军的工作。

在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呢？这在当时是 171 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但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为实现全面抗战创造条件：一方面，精心部署八路军进行统一战略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工作中都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

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毛泽东当即向全党提出如何巩固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在 7 月 29 日发表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为了总结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特点，防止在国共合作成立后可能出现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右倾投降情绪，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需要统一战线，历史的车轮将经过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促进了国内各党各派各军各界进入空前未有的团结，促进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强调，国共合作的成立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国共合作成立后有更紧迫的任务。这些任务就是：把国共合作发展成更加广泛范围的合作，制定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为此，就必须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实行改革，对国民党军队的制度实行改革。总之，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是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由于蒋介石的阻挠，第二次国共合作始终没有确立统一的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但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以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1938 年 3 月，毛泽东为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 13 周年大会写了一副挽联：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中山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这副挽联明白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崇敬和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同盟关系，也表明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寄予的厚望。这与蒋介石形成鲜明的对比。

蒋介石将国共合作看成是对共产党的“溶化”。1938 年 6 月，在丰同中共中央商量的情况下，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的恢复毛泽东等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重大问题，坚决不能接受。当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重庆代表团与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个决定。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承认错误和宣布决定无效。

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很快溃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半壁江山沦入敌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日军。这样，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成为抗战胜利的希望。延安也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

这时，延安城破旧不堪，不但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而且连一栋整洁的好房子也难得找到，日军的飞机还飞临延安上空进行骚扰。然而，这一切都没

能阻止人们从全国四面八方不远千里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的名流学者也络绎不绝。毛泽东利用这些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动员各界人士为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凡是来延安访问的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毛泽东总是设法挤时间同来访者见见面，或叙旧，或交换观点，有时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客人还舍不得告辞，毛泽东也畅谈不倦。毛泽东在细微之处体现真诚。一次，一位著名教授来访，毛泽东拿烟待客，恰恰烟盒里只有一支烟。把这支烟给客人，自己不吸不好，自己吸不给客人也不好。毛泽东把烟折成两半，一半给教授，一半留给自己。那位教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毛泽东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而激动不已，心悦诚服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

1938年1月，乡村建设派的首倡者和主要领导人梁漱溟到延安访问。五四时期梁漱溟是北京大学教师，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同事，关系甚好。毛泽东在杨怀中的引荐下认识了梁漱溟。这次梁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也算是老朋友再次见面。毛泽东对这位老友也另眼相看。在梁访问延安期间，他八次同梁交换意见，有时通宵达旦。毛泽东在同梁谈话时显得特别随和、自然，时而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谈；时而斜倚床边；时而低声细语；时而高谈阔论。梁漱溟到延安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就同他进行长谈，中心话题是抗日前途问题。梁根据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见所闻，表示出失望和悲观的情绪。毛泽东表示不能苟同梁的观点。他广征博引，十分肯定他说，对中国抗战前途大可不必悲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而不是其它结局。第二天，他们谈论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两人分歧很大。毛泽东对梁送的《乡村建设理论》作了许多批语。《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的主要著作，集中反映了梁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观点。毛泽东读后，感到书中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因此在谈话过程中，他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认为，总的主张是改良主义的路线，不是革命的路线。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革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两个人的分歧更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坚持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是如此，毛泽东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中国社会同样有着西方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他说，梁看重了特殊性一面而忽视了共同性的一面。最后彼此互不相让，以坚持自己的见解而结束。尽管如此，毛泽东给梁留下的印象是好的。后来，梁漱溟回忆起这段与毛泽东的交往，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3月间，文学青年萧军到达延安。他曾在鲁迅身边工作过，是著名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毛泽东早有所闻。萧到延安后，毛泽东就派秘书到他的住所问候。当时萧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又年轻孤傲，不想惊动领袖人物。毛泽东还是主动看望了他。一天，身材魁梧的毛泽东，穿着半旧整洁的军装，面带微笑，亲自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看望文艺界人士。他同萧军亲切握手，热情地问长问短。接着又非常随和地同大家一起用便餐，边吃边聊。这次会见，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改变了他只在延安住一、二个星期的初衷，继续留在延安用笔战斗。

4月17日，卫立煌率第二战区前方总部人员来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交谈。毛泽东夸奖卫立煌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他的谈锋极

健，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毛泽东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说，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卫立煌等人听了极其钦佩，接着，毛泽东谈到，八路军深入敌后，存在许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立煌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卫立煌到西安后，即下令：“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25万枚”，还发给了180箱牛肉罐头。

毛泽东会见的人之多不胜枚举，但毛泽东最关注的是广大青年。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投奔到延安来。青年们的到来，为延安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对此，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抱有很高的期望。为了把学员培养成具有良好军政素质的干部，使之成为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英勇抗击日军的骨干，毛泽东对抗大的学员要求特别严。

1937年10月10日凌晨。延安城在沉睡之中。毛泽东窑洞里的灯光从前一天晚上到现在还一直亮着。他还在处理各种公文，起草各类指示。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封信。一封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来信，另一封是黄克功的来信。两封信都是关系到黄克功的。黄克功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他是井冈山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快就被提升为旅长，他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练。到达陕北后，他参加抗大学习和工作，不久便同来延安的女青年刘茜建立恋爱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刘茜觉得黄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丈夫，提出中断关系。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力争挽救关系，遭到刘的拒绝。一气之下，黄开枪打死了刘茜。这就是震惊边区的“黄克功案件”。对于如何处置黄克功，党内外都有不同看法和主张。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怎么办。黄克功也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以戴罪立功的机会。

毛泽东把两封信反复看了几遍。当看完黄克功的信时，一位年轻的红军干部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似乎看到黄带着战士向敌人猛扑过去，似乎看到黄紧锁眉头，正在思考问题。似乎看到抗日前线正在向他招手，告诉他，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指挥员，抗日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毛泽东想到这里又觉得处以极刑太可惜。当他再看雷经天的信时，又似乎认为，如果赦免了黄克功，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我们的敌人会利用这件事攻击我们，要求来延安的知识青年的抗日积极性会受到挫伤，党和群众的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想到这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在一张白纸上写了起来：“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毛泽东主张以罪定刑，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在信中，毛泽东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

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要处死黄克功的原因以及严格按法律办事的意义。最后，毛泽东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10月11日，黄克功经法院判决，当即执行枪决。

黄克功事件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抗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每当从西安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够上一二百人时，毛泽东就要去亲自接见，给大家讲抗大的历史和未来。他讲话时习惯于这样开场：延安的抗大和北平的大学不一样，那里有礼堂，有教室、试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北平的大学有教授、讲师，我们没有。

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这对来自大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于太艰苦，难免有人说些怪话，如有人把抗大的爬山训练说成是“爬山主义”，把抗大参加劳动称为“劳动大学”。这些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的高度来说明训练爬山的必要性。他说，我军在华 179 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他对学员说，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动作慢了就要吃亏。练习爬山，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爬山行军作战也是红军的拿手好戏，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挥动一下右手，继续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军，胜利到达陕北。可不要把老传统丢了。至于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地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

对于劳动大学，毛泽东从一般的道理讲起，讲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的物质和精神。当然，毛泽东更主要的是着眼于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的现实情况。他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做“艰苦奋斗”。不得已而为之呀！他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了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了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办？

情况摆出来了，毛泽东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思想上的疙瘩很快解开了。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又亲笔题词，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还题写了8个字，作为抗大的校风，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陕北公学是继抗大之后，在延安建立的又一所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毛泽东对陕北公学也非常关心，每逢陕北公学有重大活动，毛泽东总是亲自出席指导。陕北公学成立后不久，即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演，号召青年学习“鲁迅精神”，也就是学习鲁迅先生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毛泽东在讲演中指出，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



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学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勉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毛泽东号召祖国的优秀儿女，把这种精神力量，带到全国各地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陕北公学不断得到毛泽东的关怀，仅举 1938 年 3 月至 6 月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倾注的满腔热情：3 月 3 日，毛泽东参加陕北公学六到十队的毕业典礼，会上作了“临别赠言”，称赞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的缩影，有了陕北公学，中国就不会亡。3 月 29 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4 月 1 日，他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的开学典礼，首次提出“三八作风”问题。4 月 4 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国共合作问题。4 月 7 日，他在陕北公学讲张国焘叛逃的问题，勉励学员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6 月 27 日，他又向学员讲授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党的基本战略问题，将《论持久战》中的基本观点向大家作了介绍。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经常给陕北公学的师生讲哲学课，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关心培育了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又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使之成为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投身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据陕北公学第二期学员季诚龙回忆：

那是 1938 年 4 月 1 日，陕北公学第二期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1600 多名师生集合在清凉山下的山谷里。毛泽东在陈云、李富春及陕北公学的领导陪同下来到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风趣而幽默的讲演。

他说，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原因在于有人所不及的地方。具体讲，一是有一个政治的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在现在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人“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讲到这里时，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深情他说，我们爬过了最难爬的山，过河，过草地，而且不怕杀头，几十万党员牺牲了，却依然前进。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使全国人民喜欢的地方。第二就是艰苦奋斗的习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不怕困难，向一切不好的倾向，向民族的敌人作斗争。

最后。毛泽东说，今天陕北公学举行典礼，我没有多少东西送给你们，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同学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礼物。

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毛泽东更加重视做青年的工作。1939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为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了《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随后即 5 月 4 日，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 20 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肯定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赞扬青年在革命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指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即团结的、统一的、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

向。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发动人民群众的程度。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正是毛泽东在抗战前后致力于发动民众的工作，才造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特别是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形成人民战争形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火阵之中。

毛泽东在唤起全民抗战的过程中，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只要是愿意抗日的，不管过去是否同共产党人打过仗，是否欠下人民的血债，都愿同他们联合，共同抗击民族敌人；同时，毛泽东的娴熟的斗争艺术得到完美的体现，善于把涓涓细流汇集成波澜壮阔的大海，把一盘散沙拧成一股强有力的绳索。毛泽东矢志不移地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并使之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政党各团体的抗日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抗战胜利的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富有吸引力的地方！

## 二 游击战略

抗日战争怎么打？这是军事统帅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早有考虑。还在1936年7月16日，他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了精彩的论述。当然，由于当时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过程中，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所以，这种战略构想还暂时是纸上谈兵。但这个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抗日战争初期制定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举国上下的全面抗战局面初步形成。这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成为最紧迫的任务。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致电叶剑英设法转告蒋介石，表示愿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红军的特长和不足，提出适应我军的军事战略原则。他指出，“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为了发挥红军的优势，红军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此时，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速度明显加快。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往返延安、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具体商定红军改编事宜。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正在红军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云阳的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红军抗战的作战原则，指出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4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电告他们就红军参战185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要求：（1）整个抗战是正寇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应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2）“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平绥路西进及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4）“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这四条补充了8月1日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其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自卫战”的思想对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形成后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

8月4日，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林伯渠等人两次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红军应当既打运动战，又打游击战，应“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根据这一意见和当时的形势，张闻天、毛泽东于5日复电朱德、周恩来等，同意红军应结合以运动战，宜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且“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

8月6日，朱德、周恩来等依据上述方针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这时，由于战事紧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国防师及特区警卫部队，并颁布了3个师的番号，命令红军至迟于8月20日出发，25日到大同集中。8月7日，毛泽东命令红军各部准备开动。至此，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初步形成。

8月22日，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在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时，毛泽东首先说明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

敌人，配合友军战略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争取对敌战争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也有同志提出，在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机会虽然比国内战争时期减少了，但是游击战应与运动战紧密配合，在胜利把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因此不能忽视运动战的作用，主张提“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这种分歧是正常的，反映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在思考我军的战略方针。

由于洛川会议时间较短，红军将领要统率改编后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对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实施战略展开。但抗战形势向中共中央，向毛泽东提出了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怎样具体开展活动，是以分散游击、发动群众为主，还是在发动群众的同时，适当集中兵力进行一些正规战等问题。就毛泽东而言，在洛川会议后，他从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长远利益和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更多地强调八路军应分兵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9月12日，他致电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作了进一步解释，指出：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集中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方面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9月17日，针对前方将领对日军迅速攻取太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主张支持阎锡山保持太原等情况，毛泽东致电给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他提出，为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力扩大本身起见，建议一一五师“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当时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3个师分散配置，一二师出晋西北，一一五师出晋东北。

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正在酝酿进行一次战役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详述了对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看法。他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负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泽东批评党内有人对形势估计错误，坚持八路军卷入决战，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

戏，在这种拿手戏，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对于如何贯彻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在电文中，毛泽东表示，八路军相机集中给敌人以打击，当然可以，但不能因此而耽误时间，必须尽快转向山区，“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毛泽东对阎锡山战略意图的分析和对华北地区战局的展望都是正确的，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异常敏锐的战略眼光，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9月25日，平型关战斗已经打响。毛泽东接连数电，继续阐述他的意见。在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的电文中，提出了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意见。他说：“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在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布置华北党的工作时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把我军与游击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到特别重要的位置。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现在就要“设想在敌整个地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平型关战斗之前，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游击战。平型关大捷后，全国对八路军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反响强烈。毛泽东也为之振奋，使他对作战方针的认识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后，他的电文在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对于集中兵力作战这个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注意。9月27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提出：“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0月份，忻口战役正在紧张进行，八路军主力配合友军给敌人以重创。八路军的英勇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誉，甚至蒋介石也来电表示嘉慰。八路军的军事实践促使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方针给以更深的思考，并表现出对集中兵力在必要时打大仗的决心，他在与抗日将士的往返电报中逐渐孕育出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之意。10月5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除一部做地方工作外，迅速集中相机歼敌。10月6日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山西现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的攻击计划”。因此，他指示一一五师、一二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一一五师不仅要适时出击大营、沙河、繁峙线，还要准备北越长城至浑源、应县，袭击雁门、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并提醒一一五师准备付出相当代价。这些都表现出毛泽东前所未有的在必要时打大仗的决心。10月23日、25日在给前线的电报中表现出同样的思想。

毛泽东同意必要的运动战，并不意味着他对整个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当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重提“运动游击战”时，张闻天、毛泽东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认为“有原则错误”，应“停止传达”。毛泽东考虑得更远些。他注重的是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以准备在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不能支撑时，八路军能够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

但是，随着八路军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明显，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高级将领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给毛泽东的电报

中积极反映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经过思考后，也逐渐修正自己的看法。他在10月25日同英国记者贝特朗谈话时，修改了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提法。他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以后在给前线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战略方针。到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很多同志不同意“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主张提“运动游击战”的方针。毛泽东坚持认为，在全国抗战中固应以运动战为主，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当然应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1938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说：“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问题是除运动战外，还应组成若干游击兵团打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才能遏制敌人的进攻和最终打败敌人。在2月至4月间，毛泽东根据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践，多次致电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提出：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仅山地可以创造抗日根据地，平原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从此以后，毛泽东在表述战略方针时，不再提“山地”二字，表明他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又有了修正。

这个战略方针的确立来之不易，它是八路军将士用热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军事统帅，既表现出高人一筹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但他又没有固步自封，当实践证明抗日前线八路军将士提出的某些观点也客观地反映抗日战争的规律时，他又勇敢地修正自己的观点，集中全党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我军的战略方针。然而在提出这个方针后，毛泽东并没有止步。他还需要从理论上论证，以求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这一方针，并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为此，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初，毛泽东开始研究军事理论问题。1月12日，他写信告诉艾思奇：“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为了研究军事理论，毛泽东广泛收集有关军事方面的理论著作。然而，延安这类书极少。当时，萧劲光有《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萧把它当作“宝贝疙瘩”。一天贺子珍到萧劲光家里串门偶尔发现了，回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就来到萧劲光家，向他借这两本书。萧劲光多少有些舍不得，而且知道毛泽东借这两本书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又知道，毛泽东是轻易不开口的，还知道，毛泽东借书将会派上更重要的用场，只好借给了毛泽东。事情让萧劲光猜中了，毛泽东借这书的确是派上了大用场，他正在为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作准备。而毛泽东借书也的确没有再还给萧劲光。萧劲光在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说毛泽东只借不还。

为了集思广益，1938年初春，毛泽东邀集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到自己的窑洞里座谈。被邀请的人落座后，毛泽东就笑容可掬地给大家出了座谈的主题。他说，今天，请大家来谈谈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且对萧劲光等说，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愿意听听大家的高见。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说，不过，今天一反常理，学生给先生出题目。被邀请的人既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又是老熟人，谈起来既非常热烈，又很有深度，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当大

家说到精彩的地方，他禁不住点点头，表示赞同。有时他也插上一两句话或者提问，把谈话引向深入。毛泽东特地要萧劲光谈谈游击战争的指导要领问题。萧劲光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表示赞同，并画龙点睛似地把萧劲光的谈话意见归纳为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些观点后来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得到充分发挥。谈话还在继续进行。毛泽东不断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新问题，大家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天黑了，还是谈意未尽。毛泽东嘱咐大家将自己思考的问题写成一篇文章交给他。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从理论上阐述战略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到1938年5月，全国性的抗战已经持续了10个月，日本帝国主义气势汹汹，幻想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采取“闪电式”的进攻方式，从华北、华南、华东全面进攻。日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这个阶段，国民党军队抗战也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国内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即“速胜论”；另一种是亡国的悲观论调，即“亡国论”。这两种倾向存在，危害抗战的进行，前者使人们产生轻敌思想，后者使人们产生妥协情绪。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抗日战争究竟如何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具不具备战略地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轻视游击战争，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特别是王明回国后，在军事战略上竭力反对游击战争，否认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而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应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大仗，打正规战。

上述问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面前。如果说1937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给抗日前线八路军将领的电报中，在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从实践的角度解决了军事战略转变的问题，那么，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则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并不是从抗日战争中才有的，也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在古代，在外国，都发生过游击战争。但一般意义的游击战争只是一个战术问题，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来加以考察，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提出的，这“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毛泽东从时间、空间、条件等方面来考察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从空间上讲，毛泽东比较了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他指出，中日双方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由此决定抗日游击战争具备独立作战、大规模开展和担负着许多战略任务的特点，这使游击战争远远超出一般的狭小的天地，从通常的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范围敲门。

从时间上讲，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生，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存在是分不开的。这乃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焦点所在。

从条件上讲，毛泽东分析了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军游击战降到次要的作战形式，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击战争又重新上升到战略地位，成为主要作战形式的过程，认为这是因为敌、我、友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全国人民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遇到的一个新的凶恶的敌人；我们的朋友是过去与红军作战

的国民党及其军队，我们自己的队伍则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30 万人下降到三四万人，作战的地方由南方的山区转到地域广阔的华北。这些不能不使抗日游击战争上升为战略问题。

毛泽东充分肯定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后，又进一步回答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换言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必须遵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进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原则，充分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兵力不足、异国作战及指挥笨拙等弱点发挥游击战争的巨大作用，不仅在战役上，战斗中配合作战，而且在战略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在敌人的后方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给予全国正规军及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在兵力的运用上，要像渔夫打鱼一样，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中日双方的特点决定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此，必须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汉等建立多种形式的根据地，随着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扩大，将敌人陷于我包围之中。毛泽东还提出，游击战争必须正确解决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关系，当敌人进攻时，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采取积极防御；当敌人处于防御时，我军要主动出击，扰乱敌人，发展自己，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主张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实行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毛泽东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战略原则的论述，是对全党领导游击战，特别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解决了如何评价抗日游击战争和怎样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不仅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甚至国民党军队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也非常感兴趣。

抗日战争的实践活动的深入，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抗日战争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延安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毛泽东等经常到研究会发表讲演。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讲演，这就是《论持久战》。为了准备这个讲演，毛泽东花了大量的心血。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坐在窑洞的书桌前，微弱的灯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只吃了很少的饭，一条湿毛巾放在桌子旁边，疲倦时用它擦擦。桌上还放着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花了好几天时间，终于写成了《论持久战》这篇著作。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抗日战争的进程究竟怎么样？能不能胜利？是速胜还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最后胜利？怎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等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毛泽东首先明确地回答了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可能速胜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持这两种观点的人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其认识根源是战争问题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 10 个多月，各种矛盾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暴露，中日双方的特点更加明显地暴露在人们眼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毛泽东不仅深谙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因此他对中日双方的特点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比较。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个特点决定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可避免性，也是决定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退步



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这就决定日本侵略战争必然要失败，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日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这就意味着日本经不住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中国则能够进行持久抗战；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必然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通过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得出结论：中国既不能灭亡，也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毛泽东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大举进攻，占领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军则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许多根据地。在相持阶段，日本因战线拉得太长而停止新的进攻。我军游击战将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成长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经过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所描画的整个战争的轮廓，是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的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的预测是科学的。

怎样进行持久战？这是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就考虑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党内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领导同志对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够，偏重于打大仗。毛泽东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对以前八路军战略方针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论持久战》中，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的概括获得了全党的普遍拥护。

与怎样抗战问题密切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待人民的问题。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欺负我们，就是看准了过去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只要我们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结论，号召到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全民全军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

毛泽东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在短时间内，能够在敌后迅速地打开这样的局面，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则对此感到特别欣慰。

### 三 与王明的争论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分裂时容易产生“左”倾关门主义；合作时容易出现右倾投降主义。

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但也必须警惕出现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5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条件。”他进一步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这些富有预见的认识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非常清醒地密切注意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就表现出来。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认识，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毛泽东将这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请全党特别注意。

在党内和军队内，个别人在改编后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不久，八路军某高级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的字样。毛泽东见后心里很不高兴，就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毛泽东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毛泽东有着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大革命后期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给毛泽东留下难忘的印象。因此，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就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他提醒全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这些活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讲的。此

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右倾投降主义还没有成为现时的危险。

到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攻陷上海、太原，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战出现了许多困难。这时国内的民族投降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应邀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讲。会议非常庄严。因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大片领土，使与会者的心情格外沉重，而党内和社会上的右倾倾向又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站在台前，两眼扫视着参加会议的党的活动分子，心情沉重地分析太原上海失陷后的严峻形势，提出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鉴于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

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把反对投降主义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指出这是关系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毛泽东的一系列的讲话，犹如一副清醒剂，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有所认识。然而，11月7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使问题变得戏剧化和复杂化。

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就离开国内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在王明头上增加一些神秘的光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领袖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对王明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王明知道这种变化后，一方面他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提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从内心中王明是不服输的，而在暗中散布毛泽东只知道孔孟儒家学说，只能以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安邦，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应该承认，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在1935年8月1日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过程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八一宣言”是我们党搞统一战线的一个“源”，没有这个源，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长流”。但从这个时候起，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就开始流露出来。

1937年11月7日，王明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带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这倒不是毛泽东对王明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毛泽东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直接受害者，但却无缘相见。延安机场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王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伸出手，说道，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句多么意味深长的欢迎词。王明听后，心中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显然，在毛泽东与王明握手的瞬间，他们之间的新一轮斗争已经开始。

如果说，王明回国之前，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现象，一种情绪的话，那么，王明回国后，就将这种倾向、现象、情绪发展成新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此次回国，是负有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使命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共的任务。王明在会上作了带鼓动性的乐观的报告。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的统一的国家军队。他指出，只要蒋介石进一步转变政策，中共就准备承认国民政府为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甚至同意完全保有现在领导成分。季米特洛夫认可了王明的报告。季米特洛夫认为：这时的关键，还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问题，由于中共的财力、物力和人员百分之凡十五以上都集中在苏区，干部也是在同南京政府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工人成分在党和红军中比例很小。他担心，要靠这支队伍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正地同自己过去的敌人携起手来，是否可能。因此，

他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

王明回国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重点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该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毛泽东在8月27日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批评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和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他引经据典，讲得很有煽动性和鼓动性。因此，与会者中多数同志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还根据王明所提出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毛泽东对王明的讲话以及产生的影响感到震惊，甚至感到出乎意料。他明白，王明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按照王明所提出的主张去指导抗日战争，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无疑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重演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悲剧，同这种观点斗争那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被王明的讲话所迷惑，尽管这些人同王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只是认识上的问题，但提高全党的认识需要时间，需要做大量工作。如果现在贸然同王明斗争，后果还很难预料。毛泽东经过冷静思考后决定采取暂时不正面交锋，但必须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的策略。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辩白和进一步的解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左中右的问题是存在的，而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也是有的，不是说要使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抗战胜利。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这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还指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说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说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说是给下级以机动。

毛泽东虽然强调了自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看法，但他这时对从政治上组织上改造国民党，进而建立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可能性也抱有期望。因此，毛泽东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意见，并表示赞同王明关于在现有基础上帮助和改造国民党政府的看法。于是，政治局通

过了王明的报告，并在基本方面肯定了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和主张。

但是，会议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并没有形成决议。理由既简单又充分，既然全党对问题的认识还未统一，就不要急于作出决议。如果草率地作出决议，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等全党认识提高和统一后，作出决议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中央人事安排，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张闻天仍主持党务等日常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正是由于这些措施，抑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的发展。

会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 12 月 24 日的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中明确表示：为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发展的口号下，共产党应注意与国民党磋商工作，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

王明到达武汉后，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与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见，并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王明在长江局的独断专行、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退让的言论，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但是鉴于全党的认识水平和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毛泽东没有公开批评王明，甚至让王明的言论公开刊登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

193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王明继续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观点，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这些主张，这些口号是束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绳索，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

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还是没有给予正面的批判。但又非常有针对性地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多的援助等情况。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毛泽东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建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以分散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建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建大兵团，聂荣臻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

毛泽东虽然同王明并未发生正面冲突，但激烈的斗争已经开始。当然此时的毛泽东更注意在实践中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他在会议上所提到的聂荣臻军区一例，就是毛泽东反对王明错误的杰作。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冀东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农业很发达，矿藏十分丰富，是一相当富足的地方。正因为冀东处在一个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冀东。对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冀东，我军当然势在必夺。然而在 1937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反对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怎么

办呢？他没有力王明的主张所束缚，于1938年2月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去电报，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聂荣臻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派邓华带领邓华支队到冀东开辟根据地。邓华支队到冀东后，不仅在那里站住了脚根，而且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此，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把聂荣臻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经验介绍给全党。

毛泽东是在部分保留意见的前提下，去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指示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对王明也采取不去正面冲突的态度。但是，王明对国民党的种种让步，却让到了毛泽东所能许可的限度。于是在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积极发挥中央的领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限制和纠正王明的错误主张。

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就战略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207针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主张指出，要坚决反对“不顾蒋令，不顾友军”的行为，应事先力求取得蒋之同意，并与友军协同。但是，“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因此，具体处置应依当时情况而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也指出，应当警惕国民党“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3月25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还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不顾王明的反对，再次提出了民主、民生的要求。这引起了王明的不满，他扣压了中央书记处的电文。在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王明又擅自删去了毛泽东致大会贺电中“开宪政之先河，启民意于初步”等用语，生怕刺激国民党。5月，毛泽东再度公开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强调全民族抗战的主张，并发表《论持久战》，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这又引起了王明的担心与不满。当毛泽东将《论持久战》一文送交《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竟不同意在《新华日报》刊登，只同意印成小册子。不仅如此，他还秘密托在武汉的苏联人员将对毛泽东此文的意见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企图破坏毛泽东在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求得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的干预。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王明回国以来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目无中央的态度日益不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和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3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又作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从任弼时的汇报中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趋势和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情况，国共新合作的特点、困难与阻碍共产党的方针和任务，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任务，群众运动的发展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共产国际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肯定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久，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准备回国。

王稼祥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季米特洛

夫很关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请王稼祥转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而且还请王稼祥转告王明，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王稼祥回国后，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如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他说：“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使他失去了依托，相反，共产国际对抗战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路线的肯定和对毛泽东的支持，又有利于巩固毛泽东在中国党内的领袖地位，特别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只能帮别人的忙，而束缚自己的手脚。这些认识来之不易，其中浸透着毛泽东的心血。

在清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不服从中共中央决定，心怀鬼胎地要求中央把六中全会的会址移到武汉。毛泽东和中央坚决拒绝了王明的要求。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会议地点设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旧教堂，这里曾经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第一次会谈的地方，因此而引人注目。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47人云集这里，王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回到了延安。教堂外平静无异，然而会场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会议开始后，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这对全会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总结报告。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神圣职责。他指出，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悲观论者是毫无根据的。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巨大胜利。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使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时期统一战线的统一性与独立性、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正确关系。他说，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为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批判“一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时，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下奏”、“不斩不奏”等对策。

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作了阐明。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人城市的怀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情况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又有了今天这样的新的政党、军队和人民，完全可以在乡村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之以世界的变动，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为此，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战略方针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是，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际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针对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告诫全党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还针对王明下车伊始，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划脚，目无中央的做法，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据此，全会也通过了有关党规党法。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调王明回延安工作。

会上，有40多人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各项主张。会议后期，很多人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的种种错误。王明因离会较早，没有听到这些批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公开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的作用”，表示要“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这说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军事主张，已经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没有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发动对王明的公开批评，而是以表明他同王明形成分歧的观点的方式赢得了与会同志的认同。这就在实际上基本解决了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争论和矛盾。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举行了会餐。会餐后，天空已升起一轮皓月。毛泽东神情兴奋，像是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他不断同大家谈笑风生。他有所指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又风趣他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停了一下，他又说，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



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一边哈哈大笑，引得其他领导同志也笑得合不拢嘴。毛泽东讲的所谓牛皮公司实际上是指王明。

取得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是值得高兴的事情。高兴之余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是关门主义者，他们反对同一切中间势力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到抗日战争时期，却又从“左”跳到右，其中原由在哪里呢？对此，毛泽东作了精彩的评论。他说，王明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就是听别人的话，按别人的意志办事，为别人的利益效劳。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而替别人想得太多了。

与王明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既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作为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把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为了民族利益，他摒弃前嫌，同与自己作战多年的蒋介石合作；作为国际主义者，他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善于把中国革命放到国际这个广阔背景中去思考。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对此，许多人，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都觉得不能理解斯大林。9月1日，毛泽东就条约问题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他指出，苏德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和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毛泽东的讲话稿被周恩来带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传开后，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无不称赞毛泽东非凡的观察力。罗马尼亚驻共产国际代表。安东尼斯库赞誉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这样透彻。

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是无可怀疑的。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非常尊重的。1939年12月20日，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毛泽东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中国人民正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没有他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12月21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称赞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应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尊重不等于盲从。毛泽东在肯定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功劳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的事情，应该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自己解决。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心里明白，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根源是来自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当时在外交上只同

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而且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这些对王明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1956年毛泽东在写作《论十大关系》时，明确地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这种认识不是后来才有，而是在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过程中就已经具有，毛泽东意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懂得要取得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任弼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申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他们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就有利于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正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敢于斗争，敢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在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党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39年3月，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曼努伊斯基作《国际形势和反法西斯运动》的报告时，代表苏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袖和天才将领品质俱优的人物。

## 第四章 走向自由王国

### 一 又联合又斗争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由于特殊的原因和条件，国民党成为抗日阵营的组成部分，并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对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以及与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曾经作过精辟的评价。他说：“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几次大的战役，给日本侵略者以打击。在处理同共产党的关系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给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数量不多但又重要的军饷或弹药。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利用抗日的机会削弱共产党的企图。他们把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看成是眼中钉，经常派人到陕甘宁进行破坏活动，扰乱陕甘宁边区的秩序。为了制止敌人的破坏，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了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揭露他们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毛泽东号召，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破坏，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予以打击。

219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迫下，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制造事端。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1939年年初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接二连三挑起磨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国民党的绥德专员何绍南，充当了急先锋。年初，他因事路经延安，毛泽东获悉后，把他找来。等何绍甫到达毛泽东住的窑洞时，毛泽东铁青着脸，往日的笑容被怒气冲冲所替代。他开门见山地对何说：何绍南，今天我请你来，可没有什么好话说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的专家！何绍南还想狡辩，毛泽东声色俱厉地一一历数了何绍南的罪状，驳得他哑口无言。何绍南的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低着头，嘴里含糊不清地分辩着什么，却不敢抬头看毛泽东一眼。毛泽东也不容他狡辩，一声“送客”，把何打发走了。

何绍南回去后，仍然不思改悔。几天后，他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八路军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他的运输队，冒充八路军私贩大烟土，破坏八路军的声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接到有关方面的报告后，愤怒至极，迅速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闻知后，拍案而起，决心用硬的东西来敲开这个顽固派的花岗岩脑壳。他请萧劲光坐下，自己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萧劲光知道，毛泽东正在筹划如何打击何绍南及其他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一阵思考后，毛泽东果断地对萧劲光说，要抓住有利时机把何绍南这个顽固派赶走。他指示萧劲光，立即跟前线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商量一下，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回防绥德，以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防止何绍南狗急跳墙。同时要萧劲光与林伯渠联名致电蒋介石等，通过合法渠道，惩办何绍南，并要求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萧劲光起草好电文后再请毛泽东过目。毛

泽东看了看电文，觉得措辞不硬，味道不足。于是，他从笔筒里抽出毛笔，想了一想后，挥笔写下“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以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经这一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跃然纸上。毛泽东嘱萧劲光在适当时候把电报发出去。王震旅接到调令后，星夜回师陕甘宁边区。何绍南已陷入我包围之中。正在这时，蒋介石接到萧劲光的电报，他也反复掂量着电报的份量，此时，他还不想同共产党公开分裂，只好采取舍卒保车的策略，把何绍南调走了。这样，恶贯满盈的何绍南终于被挤走，陕甘宁边区少了一个大隐患。

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的同时，还在其他地方挑起事端。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平江惨案，枪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名官兵。惨案发生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士无比义愤。8月1日，延安军民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演。他愤怒谴责了平江惨案的指使者蒋介石及其党徒残杀抗日分子，压迫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的倒行逆施和反动罪行。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把“统一”这个口号从国民党顽固派手里夺过来，变为革命的日号，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族的分裂行动。他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因此，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毛泽东抨击了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的行为。并指出，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正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的时刻，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到延安采访。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通过他们宣传出去，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三位记者在延安访问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们。9月1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招待处再次接见他们，并接受他们的采访。窑洞里面，一张长桌，十几个凳子，桌子上摆着几杯清茶，还放着一点南瓜子。等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以诙谐的口吻对三位记者说，国民党封锁我们边区，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招待你们，我们延安不像你们重庆。毛泽东接着说，延安人还是非常好客的，延安的瓜子也蛮不错，我们就一面吃瓜子，一面座谈，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尽管提吧。三位记者同毛泽东已经接触过几次，算得上是熟人了，因此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座谈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诙谐幽默的回答不时引起在坐的人发出阵阵笑声，三位记者也为毛泽东敏捷的思维和妙语连珠所折服。但是，当谈到国民党制造磨擦，闹分裂，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时，毛泽东一下子就变得严肃起来。他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声音也提高了许多。他说，国民党搞的那个所谓“限制异党活动”，是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的根源。他指出，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共同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

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不仅要限制，而且

要打倒。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分清敌我，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事后，延安的《新中华报》和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先后刊登了毛泽东同三位记者的谈话纪录，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进步人士为毛泽东的严正立场拍手称好。

尽管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忍让态度，力图通过各种渠道避免更大规模的磨擦的发生。然而，国民党把共产党的忍让看成是软弱可欺，1939年底至1940年初，他们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敌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令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埔等部，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总部。

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先礼后兵”的对策。所谓礼，就是毛泽东与八路军将领联合致电蒋介石或国民党高级将领，呼吁他们不要执迷不悟，或者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讨汪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他指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方针，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他深刻地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的实质，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

在劝阻和警告不能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办法，集中部队狠狠地教训敢于来犯的敌人。山西决死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进行了反击。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组织力量打击了来犯的朱怀冰部，最后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组织自卫和反击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各部队适可而止。在太行山，八路军狠狠教训了敢于来犯之敌后，1940年3月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提出，我们觉得此时应对卫立煌有所让步。认为在此反磨擦斗争中，我们能够巩固山西临汾、屯留、平顺及漳河、河北大名之线已算很大胜利，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朱德和彭德怀接电后，即令该线以南部队北撤。

在山西，同样贯彻了适可而止的自卫原则。山西决死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打退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磨擦。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陕西宜川秋林镇，向阎锡山说明中共关于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的主张。萧劲光和王若飞出发前，毛泽东召见了他们，面授机宜。当时王若飞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党内公认的谈判专家。萧劲光是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蒋介石委任的“朝廷命官”。毛泽东很注意合法斗争的形式，认为由萧劲光出面同阎锡山斗争，更符合有理有利的原则，没有超越国民党规定的范围，不会给顽固派留下一点把柄。毛泽东笑着对萧劲光说，你是“朝廷命官”，你就当首席代表吧，若飞就当你的助手。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请萧劲光带交给阎锡山，并要萧劲光转告阎锡山，我们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与国民党合作的，你们为什么要制造磨擦，同室操戈。抗战初期，阎锡山和我们合作得不错嘛，为什么现在又变了

呢？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对萧劲光说，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弱可欺。我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我们的原则，请他三思而后行。

萧劲光、王若飞奉命持毛泽东的信到达秋林镇后，同阎锡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曾在 1936 年上半年直接同红军打过交道，深知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厉害，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他接到毛泽东的信后，还想顽抗。他提出，毛泽东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太刺眼，希望毛泽东改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毛泽东接到萧劲光的电报后，当即回电说，一个字都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此，阎锡山没有一点办法。4 月初，阎锡山在反共失败，自身削弱和蒋介石要乘隙而入的情况下，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又一次在山西取得胜利。

取得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胜利的前后，从总体上来讲，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的，但也有一些误解，认为是共产党忍让不够，希望共产党多忍辱负重。著名的华侨代表陈嘉庚在未到延安之前也有类似想法。1940 年 5 月下旬，陈嘉庚访问延安，在同毛泽东交谈中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耐心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讲述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他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转达蒋介石。毛泽东还表示将不员海外侨众的愿望，希望陈嘉庚回南洋后，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陈设的俭朴，同座谈话的平等融洽关系，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嘉庚离开延安去重庆后，兴奋地对他身边人员说，我来到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内因激愤于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而滋生了“左”的情绪。有些同志认为，既然国民党顽固派进犯我们，我们就跟他拼到底，一直斗到统一战线破裂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及时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保证当前斗争的健康进行，将会产生严重后果。1940 年 3 月 11 日，延安举行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 12 月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制定和论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毛泽东作为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提醒全党不要忘记过去的血的教训。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主张只联合不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主张只斗争不联合。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认为，正确的策略是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在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必须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别人，也决不可在被人攻击时不予还击，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利，即胜利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胜利把握的斗争。有节，即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

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斗争应该适可而止。在双方休战时，我们应主动地同国民党讲团结，决不可无休止地每时每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毛泽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充分发展民众运动，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国民党要利用抗日的机会消灭或削弱共产党，这是他们的既定政策。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要努力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成抗日的主力，把中国共产党发展成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有全国影响的大党。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共拥有近1亿人口。这些都是全党认真贯彻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指示的结果。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为了争取他们，毛泽东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取得胜利。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工作。1940年5月4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工作时，应该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10月4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叶剑英等发出指示，指出苏北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毛泽东请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同志加强对黄炎培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联络，争取他们在苏北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便经过他们争取更多的民族资本家，并帮助中国共产党巩固苏北根据地。周恩来等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国统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自己也亲自做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对到延安的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方代表，毛泽东总是从百忙中抽时间去会见他们，跟他们交朋友。这些工作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一部分人是国民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在抗日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里面，又要反对他们的反动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毛泽东不仅为全党制订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而且他本人又是运用这一策略原则的典范。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卫立煌和庞炳勋分别率领两部人马进攻八路军。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经到过延安，毛泽东还出面接见过他。卫立煌也曾给八路军以物质上支持。对于这两个人，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政策。对卫立煌，作出较大的让步。1940年4月，卫立煌派出其高级参议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要求河北的武安县、涉县由卫立煌任命县长，庞炳勋军进武、涉两县。朱德、彭德怀于4月10日致电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置。12日，毛泽东复电，

同意武、涉两县由卫立煌派县长，向卫再让一步，但对庞军进驻坚决拒绝。并说，目前力争八路军、中央军两军团结，希望朱德能够与卫立煌当面会谈一次。朱德接到毛泽东的回电后，于4月中旬在晋城与卫立煌会面，商定重新划定驻军防区。

毛泽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的各项政策，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顺利发展，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

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他并没有改变要消灭共产党的初衷，而把反共重心由华北移向江南，并紧锣密鼓地策划反共新高潮。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变化，在1940年5月4日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提醒东南局的领导人要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是毛泽东对东南局提出的最早警告。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反共事件，毛泽东对其目的有科学的分析，同时又表现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下准备应付任何黑暗局面问题给周恩来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目的，一方面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另一方面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以求换取日本对他的让步。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要准备对付黑暗的局面，而任何黑暗的局面我们是不怕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又一次给周恩来发去类似指示，并通报了中央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和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冷静分析，都觉得蒋介石在近期所制造的反共事件与第一次反共高潮不同，必须慎重处理，认为如果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毛泽东主张争取缓和，准备抵抗。这个时候，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充满信心。他在指示中分析，这一次如果蒋介石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50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是能打开局面的。

信心来自于正确的分析，来自于过硬的措施，当然还要有强有力的后盾。怎样才能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新的反共高潮呢？毛泽东在思考，在筹划。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给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皓电”，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将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形式通知共产党，要求大江南北坚持的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表明了国民党的反共决心和咄咄逼人之势。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明断，制定正确的对策，任何优柔寡断，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告以中央决定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并指示，对国民党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皖南方面决定让步北移。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李克农、项英，指出反对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迅速动员起各方面舆论，制止投降与内战；加紧统战工作，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告诉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速告各方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全党应该完全地有秩序地退却下来。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将士虽奋



力拼杀，终因寡不敌众，除部分部队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军队扣留，项英也不幸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它的发生，标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最高峰。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既为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愤怒，又为新四军将士身陷重围而担忧。在新四军突围的几天里，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前方的事态发展，命令有关方面加强同皖南方面联系，一有新情况就立即报告，他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会议，研究事态的发展变化，制定出相应的对策。1月15日，毛泽东又一次致电周恩来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的决定。在皖南事变发生前，毛泽东还主张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作出比较大的退让。15日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提出了只有猛烈的坚决的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

皖南事变在全国引起强烈的震动。毛泽东觉得必须利用这次机会把国民党顽固派，把蒋介石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反共投降活动的全部阴谋，并提出了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要求国民党：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及12条要求，针锋相对，刚柔并举，使蒋介石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进，则遭到人民的更强烈的反对；退，则自己承认错误，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失面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蒋介石的困境，使中国共产党处在有理有利的地位。同时，毛泽东表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不借与国民党的合作破裂。1月20日，他致电周恩来等，指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1月25日，他又在给周恩来的指示中指出：“人家已经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1月27日，他指示周恩来，要抓住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命令不放，除非蒋介石取消1月17日命令，并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否则，就同蒋介石谈判。

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中国共产党的强硬态度，不能不使蒋介石主思。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讲话，极力缩小皖南事变的范围，宣称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的性质夹在其中。”蒋介石的这次讲话，表明国民党已转入辩护（防御）

态度。毛泽东及时觉察到这个变化，也及时调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认为，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以民族利益为重，当然不能促使这种全面分裂的到来。因此，毛泽东提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但必须坚持“十二条”，不再谈其他问题。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趋势，估计蒋介石会调整政策，谋求与共产党妥协。所以，他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问题，统筹安排全国的反对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2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刘伯承、刘少奇等，提出了在蒋介石的态度发生某种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方针。他指出：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十二条”，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借全力；统战方面，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注意山西中条山国民党各军，彭雪枫注意河南各军，李先念注意湖北、河南各军，大大发展交朋友，以德报怨，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

在处理皖南事变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国统区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收集有关方面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作为决策的依据。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多次同周恩来通信，共商大计。2月，周恩来多次报告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可能发生某种变化作了科学估计。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肯定周恩来的估计与他的估计是一致的。毛泽东分析，事情到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关系是僵局，于蒋不利，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之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介石的攻势。我们在军事上守势，政治上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不会破裂国共关系，只会拉拢国共合作，不会妨蒋抗日，只会逼蒋抗日。我们提出“十二条”的目的，不在于蒋承认“十二条”或其中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此攻势打退他的攻势，用我们的政治进攻之手来缝好由于蒋介石进攻撕破的裂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因此他急于退却。这时正值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即将召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国民参政员不出席会议，以此压迫蒋介石承认发动皖南事变的错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在重庆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过程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十二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的被捕人员以及其他政治犯。这12条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情况下对国民党的反击。正如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的：“我们攻势（即两个12条和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笔者注）结果迫得蒋介石做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中共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3月6日，蒋介石在没有中共参政员出席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一方面再次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又不得不在会上保证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并约周恩来谈话，表示皖南事变的许多具体问题可以提前解决。参政会仍选董必武为该会常驻参政员。蒋介石的这些举措用意十分明显。毛泽东在12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认为蒋介石在3月6日的表演是“一种阿Q主义，

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事情也确实如此，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再次退却。14日，他约周恩来谈话，表示现在情形缓和了，可以谈谈，而且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二条中的一些条款作了某些许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毛泽东表现出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对党在斗争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作了科学总结。他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的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次斗争中采用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毛泽东提醒全党，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对我党和进步势力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绝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他提出要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认为国共合作尺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5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而他们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但是，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毛泽东的这一总结，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化了党对统一战线中阶级关系的认识，丰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 二 三个法宝

抗日战争跨进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半壁江山。日本的飞机也不时地“光临”延安上空，丢下几颗炸弹。就是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住处也不能幸免。为了安全，他搬到了杨家岭。延安的条件变得更加艰难，环境更加恶化。这一切没有影响毛泽东，他照样思考问题，照样以步代车，出现在人民群众中间。毛泽东喜欢在延河边散步，一则可以放松自己，二则可以领略延河沿岸的风光，三则增加同群众接触的机会，散步时，遇上八路军战士或老百姓，毛泽东总是要停下来主动打个招呼，或者聊上几句。有时他还要主动拉上遇到的人到延河边坐一坐，问这问那，这是他的特殊的调查研究方式。有时坐得太久，跟随在后边的警卫员可急坏了，这里毕竟是汉奸、特务能够出没的地方，万一出了差错，警卫员怎么担当得起。但警卫员又不好硬把毛泽东拉走，或把谈话对象赶走，只好打手势或者扮鬼脸给毛泽东看，但毛泽东似乎没有觉察，一直到把话说完才离开，事后还要批评警卫员。当然，他也知道警卫员是好意。

延安的交通工具很落后，大多数时间只能是骑马或走路。国统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集资送了两辆汽车给延安。毛泽东亲自分配，把一辆分给朱德总司令，认为朱德在抗日前线，更需要有一辆车，另一辆车分给在延安的“五老”，他自己还是走路或骑马。“五老”心里过不去，硬要把车让给毛泽东，毛泽东对“五老”说，你们年岁大了，骑马不方便，我还年轻，身体又好，骑马走路都行，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硬是把车让给了“五老”。与此同时，他号召在延安的共产党员、干部和八路军战士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做表率。1939年初秋，马列学院请毛泽东作报告，院领导觉得毛泽东的住地杨家岭离学院有10来里路，毛泽东又没有车，于是就派了4个干部去接到毛泽东。4个干部走到半路，就碰上了匆匆而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抢先问他们来干什么？4人一齐回答是来接毛主席的。毛泽东就开始批评这样做要不得，而且风趣他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是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毛泽东接着说，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来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他说，今天的共产党和过去的皇帝有着本质不同，共产党人要革命，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算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泽东就是这种延安作风的楷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当局加紧对国民党实施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战略，国民党内出现了“降将如潮，降官如毛”的局面。1938年12月12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河内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这说明全国抗战的政治形势在继续恶化。这种形势变化，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39年6月1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投降提纲》的报告，提醒全党，由于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的压力，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性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因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卫，准备群众，随时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要求全党要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亲密联合，并和他们一道

去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投降的斗争。不论出现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国际国内形势的恶化，使毛泽东更多地思考靠什么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去克服一切困难。正在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三大法宝”。1939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7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师生们赠给毛泽东一面锦旗，并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他谈笑风生，一边讲，一边走动，一边做手势。他用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毛泽东首先讲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要去总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全走，有的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对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毛泽东拿起桌子上的茶壶说，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国民党拿棍子打我们，我们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壶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圣人之言，那有不听之理，这也是使同盟者进步的好方法。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指出，这是孙中山革命40年在临终时悟出的道理，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把日寇赶出中国。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游击战争问题。他指出，游击战也是共产党18年来学得的法宝，为了得到这个法宝，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你们有两件武器，一件是口，一件是手。没有武装的话，一切事都搞不好。你们出去；什么工作都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装联系起来，才有出路。我们应该紧紧握住，决不放松。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认为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妖魔鬼怪都能镇压下去，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可以出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问题。他指出，革命的团结是非常要紧的，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好，游击战争就不能打。要告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告诉老百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18年来很好的经验。毛泽东说，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但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指出，我们的革命队伍里，要有这个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对于任何困难都不怕。

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是毛泽东对三大法宝的最初表述，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成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

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在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其他革命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规定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而在各个时期能否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是判断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后退一步。

毛泽东是统一战线法宝的长期运用者。他回头审视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时，深有体会地指出，18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他说，在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阶段中，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携手北伐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由于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不能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结果使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所独得。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又实行了错误的“关门主义”政策，他们总是要求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同盟者赶到敌人那边去，导致了同右倾投降主义相同的恶果。到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有了前两个阶段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能够比较科学地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历史中，深刻地认识了运用统一战线法宝时应该遵循的规律。

首先，毛泽东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重性特点要有正确的认识，明确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但是，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变得动摇变节。对此，无产阶级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其次，毛泽东提醒全党必须认清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无产阶级有必要和可能同其中某些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最后，毛泽东提出，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就必须联合其革命性的一面，反对其妥协性的一面。过去，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要反对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同党的政治路线关系密切。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锻炼出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什么是“左”倾关门主义。他指出，所谓关门主义，就是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从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合。

毛泽东也分析了什么是右倾投降主义。也许正处在与资产阶级，甚至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某些集团联合时，或许是党内刚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其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毛泽东花了较多的笔墨来描绘右倾投降主义。他指出，右倾投降主义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

无论是“左”倾关门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都可能断送统一战线，都可能断送革命，必须正确开展反倾向的斗争。

武装斗争是另一个法宝。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基本地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他非常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的论断，认为这个论断是非常之对的。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他把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当时，中国共产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以致在北伐过程中，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力量，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

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有了前两个阶段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武装斗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认识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长期的武装斗争。这种武装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没有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从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其次，进一步认识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回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程度，这条革命道路的理论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又重新思考这个问题。1938年11月6日，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这一原则时，要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资本主义各国，其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在时机成熟时进入起义和战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就使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更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

党的建设是又一个主要法宝。毛泽东指出，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巩固、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正确处理与否密切地联系着的。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就必须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统一的理解，就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处理好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初步胜利。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各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也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在革命的最紧急关头，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结果使革命遭受失败。

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毛泽东认为，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有了对中国基本情况（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的认识，由于有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的认识，由于有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并能较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



合，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胜利地进行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紧紧依靠农民，不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而且还独立自主地领导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革命实践中还学会了战争的艺术和治国安民的艺术。然而在这个阶段，由于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的事业遭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巨大危害。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彻底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第三阶段，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凭借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刻和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扩大了。毛泽东在看到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客观地分析了在这方面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任务。首先，毛泽东针对许多党员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巩固党的组织。其次，针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的特点，提出中国共产党应随时作好两手准备，即一方面要克服统一战线内部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从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另一方面，又要随时作好准备去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中国党和中国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遭受意外的损失。最后，还针对大资产阶级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阴谋，指出应特别注意巩固党的武装力量。

三个法宝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在洪荒的远古时代，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的三件法宝，是虚幻中的神话，反映着人民希冀借助神的力量来战胜人间的邪恶妖魔。三件法宝的真伪和法力无从考证。毛泽东送给共产党人的三件法宝，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威力是元始天尊的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所无法比拟的，正是依靠这三大法宝，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提出三大法宝后，在实践中不断地运用它。在统一战线内部，开展反两种倾向的斗争，在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以后，又针对党内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左”的倾向，及时提反对“左”倾错误的任务。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上就明确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批评了认为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需要，不在乎统一战线破裂的观点。

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毛泽东以其炉火纯青的战争艺术指挥着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的抗日战争。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根据斗争的需要组织了有105个团参加的大规模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战役打响前，八路军总部致电延安，请示有关事宜，毛泽东迅速批准。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

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前线嘉奖参战将士，指出“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当然，后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过早地暴露我军的力量将会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又多次强调，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

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根据不同形势，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策略口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时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据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协同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写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对中国革命规律进行总结，同时，他号召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学习，重视各门科学。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提出要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他特别强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肯定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涌向延安，对此，毛泽东感到格外的欣慰。为了保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在根据地各组织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了各部门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学会和中握三大法宝非一日之功，运用三大法宝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毛泽东以顽强的毅力实践着，又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介绍和传授给全党。随着三大法宝的广泛运用，中国革命便不断深入，不断发展。

### 三 中国的大思路

毛泽东是革命家、战略家。他要了解中国的过去，把握中国的现在，开创中国的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像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环套，在毛泽东的心中旋转。毛泽东是思想家、理论家。他思考问题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犹如电火行空，他有一股献身的精神，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看他似乎是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像上了发条一样，有条有理地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有力的节奏。

1939年下半年，毛泽东正在构筑未来中国的大思路。他没日没夜地思考、写作。困了就狠狠地吸上几口烟。实在太累了，就在布躺椅上靠一会，或在窑洞里走几步，或者要警卫员打一盆冷水，用湿毛巾擦擦脸，使头脑清醒，接着又坐到办公桌前。他专心致志地写作，有时连天亮了都没察觉，早饭也忘记吃。这可急坏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强行把油灯端走，硬逼着他上床睡觉。可是，等警卫员一转身，毛泽东又爬起来，重新开始他的工作。警卫员无可奈何地承认，拿毛泽东没有办法。

毛泽东拼命地思考，拼命地写作，不是没有原因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制造军事摩擦的同时，又在思想战线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卵翼下的文人政客发表文章，攻击共产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高唱“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滥调，企图从根本上取消共产主义，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显然，这是企图把中国引向符合国民党一群一党私利的方向。这种反动宣传一时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引起一定的反响，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混乱，全国人民都在为抗战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担忧。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面对这样紧迫的问题，毛泽东心里能不着急吗？

此时，毛泽东又感到欣慰的是，构筑中国大思路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就挑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毛泽东构筑中国大思路的必要条件，都是中国革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基石，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深情地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他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这些著作的写作是水到渠成，他说：“那些论文和文件，只能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也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是不容易的，而实现了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当然是值得高兴的。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思考，一幅美好的蓝图呈现在面前。毛泽东审视着这幅蓝图会心地笑了。然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声：“走，跳舞去！”这样，“红都”延安周末的舞会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他那士兵操练式的舞步给大家带来欢乐，也给自己带来了难得的轻松。

毛泽东把中国的大思路放到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历史是现实的

渊源，现实是历史的继续，未来又是历史与现实的归宿。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有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统治地位，封建地主统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广大农民用自己的汗水不仅养活地主，而且养活一大群国家官吏和军队。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历代的农民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由此，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发动无数次起义或暴动。毛泽东认为，这些农民战争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但是无不失败。1840年以后，中国又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引起中国的变化。毛泽东具体分析说：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sup>253</sup>和可能，由此导致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出现。

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下列特点：（1）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封建剥削的根基还依然存在；（2）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3）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仅被推翻了，但军阀统治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依然存在；（4）帝国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太上皇”；（5）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6）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其受苦程度是世界上罕见的。

毛泽东考察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过程及其历史特点，对中国国情有了科学认识。这不仅使其中国大思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中找到了适当的位置，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它为中国共产党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历史依据。

毛泽东在构筑中国大思路时，还把中国革命放到世界革命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世界革命有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之分，两种世界革命的分界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它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支持，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具有深刻的国际意义。

毛泽东从世界革命的广阔背景中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使其中国大思路在国际格局的横向坐标找到自己的原点。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那末，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既要考虑中国革命内在规律的作用，又要注意国际环境对中国革命的制约以及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包括革命性质、对象、动力、道路、前途的思考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大思路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似乎十分简单，然而为了探索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还在大革命时

期，毛泽东和党内其他同志就开始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本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同教条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等重要思想。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使这些问题更加系统化而最后形成完整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由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他进一步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在 1937 年 5 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一篇文章的上下篇，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1939 年 9 月，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再次指出，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这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做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联结上论述两者的关系，指出，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毛泽东还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二次革命论”者和“一次革命论”者，前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后者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还批驳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民主义革命包含共产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论”，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革命论”的实质，就是不要人民革命。

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及其相关的问题，这是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

对于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毛泽东早在 1925 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就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抗日战争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和发生的新变化，对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问题作了更精彩的分析。他指出，就一般意义上讲，既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末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由此而引起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因此，此时此刻，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的汉奸卖国贼。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象的分析没有停留在回答是谁这个水平上，而是继续深化。他指出，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阶级结成反动同盟，中国革命的敌人就异常强大，这就决定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任何急躁情绪，任何把中国革命看成是“笔直”而“平坦”的大道的观点都是有害的。

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上作了精辟分析。时间推移到 1939 年，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变化更加明显，各阶级的政治代表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舞台上的表演更加充分。这为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阶级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据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作了深刻的分析，最后他得出的

结论是：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农民、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但又是必要的同盟军；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

革命前途问题，是关于中国社会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其封建法西斯专政；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希望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革命前途究竟是什么？要求毛泽东作出科学回答。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回答施方白提问时说，中国目前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要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的前途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容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及至帝国主义被推倒了，那时世界都是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中国单独向资本帝国主义发展。所以中国的前途也一定是社会主义。1938年7月，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要使我们国家有独立的政府，有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经济向前发展，农工商业由国家与人民合作经营，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有土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科学与文化都能提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更不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他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存在，而且不断壮大，最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

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都因不能科学回答和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而栽跟头，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毛泽东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找答案。他指出，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都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如果仅仅说到这一层次，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毛泽东指出，尽管历史已经选择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革命的领导者，但并不等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会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共产党，恰恰相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一再顽强地表现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争夺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领导权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实现了领导权。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就必须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纲领和策略；在组织上必须形成一个有全国影响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有一大批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有一大批积极肯干、勇于负责的干部，有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胜利完成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革命胜利后不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了科学回答。那么，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这是毛泽东在构建中国大思路时必须回答的问题。1938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世界学联代表时所作的分析，实际上已勾勒出未来社会的基本蓝图。他再三强调，在未来的国家，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政府，“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具体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征，进一步构思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基本框架。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同时，允许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采取某些必要的办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换言之，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既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它是以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为基本前提和基本出发点的。后来的社会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设想是科学的，是有益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毛泽东为中国社会构筑的大思路，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的贡献。中国大思路从酝酿到形成，中间经历了无数坎坷，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它的形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总体设计，规定了正确的道路。

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实践来证明。中国大思路是否科学同样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并没有满足，而是要把他的未来中国大思路首先放在抗日根据地里去验证。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总后方。毛泽东下决心把这块根据地办成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办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示范。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辞，希望边区党组织和边区人民为加强边区的民主建设而努力。不久，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这就是著名的“三三制”。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共中央提名，经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民主选举，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他们在边区的民主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还为边区政权规定了施政方针，即“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边区政府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特殊政权，它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政权具有质的区别。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形，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试验地。毛泽东作为中国大思路的总体设计师，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以及经济建设倾注了满腔热情。

在战争年代，军事斗争是第一位的工作，但还有其他工作，其中经济工作在整个根据地建设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毛泽东心目中，边区有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相持阶段到来后，在不发生大的突变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自然，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不研究经济财政问题。因此，1941年

8月6日，毛泽东在写给谢觉哉的信中告诉谢觉哉，近日他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毛泽东认真研究边区财政工作的规律，提出了边区财政工作的政策和方针。

要搞边区的建设，没有全党的努力是不行的。而不发挥边区人民的作用，不动边区的民主人士的积极性也是不行的。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应邀发表演说时，就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开动脑筋，争献抗日大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当时陕北米脂县参议会会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李鼎铭，为毛泽东的讲演深深打动。他根据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重的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质胜量，提高办事效率。此案提出来后，在会议内外引起议论，有的人认为好，有的人认为是李鼎铭别有用心。

这个提案送到了毛泽东手里。延安冬天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在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反复翻看着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第二天，“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又非常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又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这是不对的。“精兵简政”议案终于在参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此后，不仅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而且中共中央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这次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大会上，再次提出“精兵简政”的问题，他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中国的大思路，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谁也不会怀疑，毛泽东作为大思路的总体设计师，其贡献是最突出的。而中国大思路的实施，特别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有待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才能实现。然而，毛泽东的大思路在各根据地这个局部试验的结果就已经证明：毛泽东关于未来中国的大思路充满了活力，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 四 独立自主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共产国际密不可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避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错误，是不能不认真对待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延安时期，通常把共产国际称为“远方”。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远方”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一度中断了同“远方”的联系。正是在这种偶然又包含必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和中国革命问题。遵义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内部问题的尝试。

但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同“远方”的联系，希望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与帮助。中共中央刚在陕北站住脚根，毛泽东就指示有关方面，设法尽快恢复同“远方”的联系。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调试成功，开始根据张浩由莫斯科带回的电报密码给共产国际发电。7月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回电，自此，双方恢复了直接的电讯联系。

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走向成熟，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毛泽东既不像陈独秀那样独断，又不像王明那样盲从。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要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自己来解决。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领导全党根据既定的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迅速打开抗战的局面。这些令共产国际领导刮目相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1937年11月派王明回国，带有双重使命，一是贯彻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种种意图，二是作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然而王明回国后的所作所为令共产国际失望。而王稼祥和任弼时使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和遵义会议后一直在中共中央起着实际领导核心的作用，因而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看法。1938年7月6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发出了同意肯定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信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六届六中全会以后，1939年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4期上刊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一文，在第6期上专文介绍毛泽东，称他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以及“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等等。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是尊重的。自从同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特别是1940年通讯联系完全正常后，他便开始同“远方”保持经常的通讯联系。毛泽东使用最多的联络系统代号是“农村工作部”或“农委”。农村工作部设在延安的小砭沟，靠近中央警卫团的驻地。除此之外，还有苏方情报组的联络系统。毛泽东使用“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多半发出的是情报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联络；而使用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是发出重大的、涉及战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的电报，直接报斯大林。

往来的电报，不但都由毛泽东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一般情况下的电报是不传达的，只有涉及到重大问题时，由毛泽东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一下。毛泽东发的电报百分之八九十是关于中国党、军队和解放区的发展情况，以及工农青妇等各方面的工作及统战工作；有时介绍国内各民主党派及其活动、政治倾向与表现；国民党内部情况、政治动态，主要是蒋介石及其政治倾向，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的派别斗争与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同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国民党同日寇暗中勾结的情况。毛泽东在电报中先讲情况然后分析，最后提出对策和措施。关于国际情报则由苏联情报组往苏联报告。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力图通过国共合作而减轻苏联的后顾之忧。为此，他们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忍无可忍，决定立即结束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而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然而，对于这一严重的反共事变，联共和共产国际却积极主张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尤其反对中共中央采取同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政策。1月20日，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国党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2月5日，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国党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态度，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感到失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还不能完全无视他们的意见。1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之后，即致电周恩来等，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们甚为有利”，“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目前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后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皖南事变解决后，毛泽东给“远方”发出了一份长电，分析因果、教训，指出：一、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地镇压人民，口蜜腹剑，使新四军上了圈套；二、项英刚愎自用，轻信敌人，一意孤行，自身不保；三、皖南事变对党、对抗战和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困难；四、我党为挽救危局，弥补损失所采取的方针，新四军余部的转移和重新部署，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前前后后等。电报强调，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重的，经验是有益的，这件事教育了全党，今后就更会眼明心亮，提高警惕。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双关的，对“远方”那些总是轻信蒋介石，对蒋抱有幻想的人来说，是希望他们从中吸取教训。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派来军事情报组驻延安。情报组设在延安枣园，有一个功率大、效率高的电台。毛泽东也经常使用这个电台给斯大林发电报。在1942年以前，苏方人员不多，常以军事记者的身分出现。他们到前方搜集情报。一个叫伊万诺夫的团级干部深入到华北太岳、晋绥各解放区了解敌情，但他常以军事专家的姿态指手划脚，责怪中共没有利用一切条件、机会与可能性去打击敌人，指责八路军的作战方法过于原始、落后等等。他回国前，毛泽东接见了，毛泽东对他说：我们还是小米加步枪，我们还是持久战，反正八路军是土八路。我们不行，我们一切都落后。对我们的一切你们都看不惯。但我们却胜利地抗击数十万敌军，而且能使自己的军力成倍地增长和加强。伊万诺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弦外之音，感到莫名其妙，没趣地离开了。

1940年冬天，苏方为了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到延安来。毛泽东在杨家岭为他们设宴洗尘。基斯林科一一向毛泽东介绍了每个人的姓名、专职、军衔等，然后向毛泽东介绍他们的打算：在华北、东北活动，特别是在解放区边沿地带及各大城市建立情报网。

毛泽东说，要搞好这项工作，最好是我们两家合作，分享成果。合作的具体办法是：你们出钱，拿出技术来；我们出人出力。相互合作，工作既能较顺利地展开，也能做出较好的成绩来。得到情报，我们两家分享，双方共同使用，岂不很好吗！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方案，基斯林科等毫无思想准备，不敢继续坚持下去，后来，他们表示不同意这样做。由于苏方人员固执己见，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背信弃义地发动了侵苏战争。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作战十分艰苦，节节后退。为了寻求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配合，斯大林曾三次致电毛泽东，在第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

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以及其他方面的领导商量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达到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二次来电说，可否分批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边界地区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毛泽东等经过研究又否定了第二个方案。

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来电建议中共中央考虑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1942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已大致明白了斯大林的想法：苏方正正在部署斯大林格勒战役，准备与敌决战，但又有后顾之忧，深恐在西线与敌决战的时候，日本乘机出兵苏联远东，配合德军的进攻。毛泽东分析透了斯大林的意图后，就开始把罗瑞卿、杨成武和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形势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很有远见。它既未暴露自己的目标，没有打草惊蛇，又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进可以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以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它还还为抗战胜利后迅速进入东北，收复失地作好了准备。

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后，毛泽东定期给“远方”去电，作了许多介绍和解释，诸如，什么叫整风？毛泽东解释，整风就是党内的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端正思想认识；整什么？他解释了“三风”；怎么整？主要是和风细雨，方式方法是学习文件，集中讨论各抒己见，澄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然而，无论怎样解释，“远方”都不能理解。而当时具有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双重身份的弗拉季米洛夫（中文名字孙平）多次向莫斯科反映，认为中共中央、毛泽东排斥莫斯科派，即在苏联学习后回国的人。季米特洛夫来电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搞派系斗争。毛泽东又继续向“远方”解释，并多次同苏联驻延安情报组

的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和解释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情况。

1943年9月，毛泽东同弗拉基米洛夫谈话，劝他对整风和陕甘宁边区其他方面发生的事作出正确的估价。但是他听不进去，并把他的看法电告季米特洛夫。11月下旬，季米特洛夫回电，表示莫斯科倾向同意他的意见。

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该信根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多次主观臆测的“情报”，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要“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出在党之外”。

毛泽东收到季米特洛夫的信后，感到问题重大，需要慎重处理。1944年1月2日，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的电台，向原共产国际领导人表示真挚敬意，告之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来信，说明了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任务、政策和为之奋斗的基本原则。1月4日晚，毛泽东邀请弗拉基米洛夫一起看平剧。看完戏后，毛泽东告诉他，季米特洛夫的信已经收到，提议另约时间同他谈谈信中所提出的问题。1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邀见弗拉基米洛夫等人，向他们说明了几个问题：中共整风的目的和情况；中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根据地里，反共产国际的宣传是不存在的；延安的工作一切正常。1月7日，毛泽东亲自来到弗拉基米洛夫的住处，向他解释中共中央在处理党内问题中坚持的原则。随后，毛泽东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稿，要求弗拉基米洛夫立即发往莫斯科。电报再次说明了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中遵循的原则，并对季米特洛夫的心情表示感动，请他不要担心，要冷静下来，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党内政策。电报告知季米特洛夫：中共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照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来对待的。这样，毛泽东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继续维护友谊与团结的对策和措施，正确处理了这封来信。

在整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电“远方”，介绍中共争取早日召开七大，现在正考虑七大代表和推荐七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有两个同志，即王明和李立三，虽然都是犯了错误的人，中央还是准备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至于李立三，他在苏联犯了什么错误？错误的性质如何？是否影响他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望详告，以便参照考虑。不久，莫斯科回电说，李立三在苏联这段时间作了些具体工作，但在工作中有些不检点的地方等。收到回电后，中央很快决定李立三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1943年5月初，共产国际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这对于正在大规模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赞成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通过塔斯社驻渝代表全文拍发莫斯科。同一天，延安举行干部大会，毛泽东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在高度评价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取消“国际的领导中心”的重大意义和极端必要性。他指出：“因为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了，其变化亦更为迅速”，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显然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不能及时地和仔细地研究各国党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实行正确领导，因此，各国的革命“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他认为，各国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熟起来，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地领导本国的革命斗争

了。而经过远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的三次革命运动千锤百炼的中国党，更是很久以来就已经“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毛泽东特别提出了“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的问题，认为：“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各国革命党必须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特点和具体条件的革命道路。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将有利于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中国党近年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系仍继续着，苏方驻延安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因此有所变化。在1944年至1945年间，毛泽东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找孙平长谈，每次谈话都花三四个小时。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个革命时期的形势变化，各个革命阶段党内的意见分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党的路线正确与错误，而且重点阐述了宗派斗争——总的意思是：小派别活动发生过影响，但未起决定作用。毛泽东同他长谈，目的在于帮助孙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延安采访，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普罗岑柯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帮助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普罗岑柯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情况、党的发展与干部培养等方面的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培养干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他有头脑，有见地，继续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的方针政策、战略意图与政治路线，以及中国革命和党的发展与前途等问题，向他说明即使抗战胜利结束也并非是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

1944年十月革命节前夜，苏德战局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红军步步紧逼，使敌人不断后退，喘不过气来。毛泽东为苏联红军的胜利而高兴。十月革命节，弗拉基米洛夫等在枣园举行庆祝十月革命27周年的宴会。毛泽东等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委员应邀出席。宴会上的酒菜很丰富，宴会的气氛更为热烈，宾主不断致词祝贺，弗拉基米洛夫讲话后，毛泽东致答词，他为苏联人民的胜利而庆贺。大家频频劝饮，为粉碎人类公敌——法西斯，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解放而畅饮。毛泽东也为这种气氛所感染而多喝了几杯。他勉强回到家，几乎卧床一昼夜。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很少有直接的电报往来。1945年5月，苏联红军解放柏林。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的胜利。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继续找弗拉基米洛夫谈话，向他讲些情况，提些问题，通过他反映给斯大林，然后苏方又通过他把斯大林的意图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看法与估计暗示给毛泽东。

七大前夕，毛泽东把七大的准备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内容都给弗拉基米洛夫讲了，同时告诉他，让他作为客人列席七大，并指定由师哲担任翻译，会后，毛泽东还一再问师哲，各次会议弗拉基米洛夫是否参加了。七大结束后，毛泽东不满足于弗拉基米洛夫参加听会，还专门把他找去，向他介绍了大会的情况。主要内容是，（1）大会是团结的，全党达到了空前的一致；（2）七大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全党的拥护；（3）大会一致拥护新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强调，大会最后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领导核心（中央书记处，即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有威信、最团结、最有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这是我们将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弗拉基米洛夫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和理解，并以自己的方式向苏共转达了消息。

自 1945 年 5 月 9 日欧洲战场战争结束至 8 月 9 日苏联出兵东北，整整 3 个月的时间内，苏方没有向中共透露过任何消息，外界也未曾看出苏联军事行动的任何迹象。中共中央只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同日军打响以后才知道苏联向日本宣战了。尽管这样，8 月 9 日，毛泽东、朱德致电斯大林，对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中国一万万解放区人民和军队，将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是走向成熟的党。毛泽东在同“远方”的交往过程中，既坚持了国际主义，又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正是毛泽东英明而又伟大的地方。

## 第五章 把握未来

### 一 两个环子

1941年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困难。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一次次反共高潮，包围和封锁各根据地的同时，日军也加紧了对各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大为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由50万减少到30万。再加上连年的天灾，使根据地军民缺吃少穿，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毛泽东把这一困难时期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号召根据地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阵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各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并在实践中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全面贯彻落实这十大政策中，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抓了生产和整风这两个中心环节。毛泽东将两项工作称之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毛泽东在思考，在筹划。经过思考、筹279划，一个计划在他的头脑中形成，这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进行生产自救。早在1938年，当时根据地的困难还刚刚显露，国民党尚未停止提供部分经费，但某种迹象表明，我们将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时，超前思维的特点促使毛泽东提前向八路军留守兵团的负责同志打招呼，要学习搞生产，把生产、学习和战斗结合起来抓。

1939年经济困难已经日益明显。毛泽东决定把问题交给全党讨论。2月2日，延安举行了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他在会上尖锐地提出，面对严重的困难，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的拳头在空中有力地挥动，他的响亮声音在空中回荡。对于这个声音的回音便是在大生产运动的逐步开展。

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独立地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抓部队、机关、学校生产运动的同时，更加强调根据地群众的生产运动。1940年12月3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党委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时指出，经济建设的任务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参与者。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参加者，毛泽东身体力行。他参加警卫班召开的生产动员会议，并且要求战士们订计划时，给他分一块耕地。他告诉战士，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战士们劝毛泽东不要参加劳动。他坚决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和收获都自己动手。对一些不懂的农业技术，就拜懂行的战士和农民为师。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亲自参加大生产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但是毛泽东亲自参加劳动，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安。1943年春节，延安劳动英雄杨步浩随慰问团访问南泥湾，途中获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有生产任务，心里格外不是滋味。杨步浩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为公事操碎了心，他们的生产任务应该由自己来完成。于是，他向有关方面请求，要为毛泽东代耕。毛泽东为杨步浩的真诚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一年6月，杨步浩经过辛勤劳动获得了大丰收，他喜气洋洋地拉着500斤粮食为毛泽东代交公粮。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了杨步浩。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他获得丰收的秘诀。杨步浩就把自己种麦不违农时的经验说了一遍。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并当即坐到办公桌前，提笔给延安县长写了一封信，叫县长重视推广杨步浩的经验。虽然毛泽东答应杨步浩，由他为自己代耕，但实际上毛泽东还是继续开荒种地。在杨步浩交完公粮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到自己种的地里摘了两箱子西红柿送给杨步浩，并告诉杨步浩，这块地好，他舍不得丢掉。

毛泽东是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作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除一般的号召、部署和检查外，还非常善于用典型来指导和推动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在大生产运动中，军队的典型是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农民致富的典型是延安柳林区的吴满有；工业战线的典型是赵占魁；合作社的典型是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等等。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典型的示范作用。

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原是八路军的一支主力作战部队。1938年这支部队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始“屯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部队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而且为根据地战胜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毛泽东知道三五九旅的事迹和经验后，就向其他部队和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三五九旅的经验。1943年7月，他又亲自到南泥湾视察。王震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部队的生产情况以及其他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毛泽东问王震：“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王震告诉他：“平均五钱油，菜随便吃。”毛泽东又问：“星期天要改善生活吗？”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副政委王恩茂告诉他，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有时杀头猪，有时宰几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毛泽东又问在三五九旅还有没有因饥饿而得柳拐病的。几个在场的旅领导异口同声地告诉他，在三五九旅没有一个得柳拐病的，毛泽东非常满意，他又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你们就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王震向毛泽东汇报，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今年每人平均种30亩。去年的口号是“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的指标是6石1斗细粮，6斤皮棉。毛泽东听着，不时点头微笑。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眼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花都靠外国人。

在王震的陪同下，毛泽东参观了战士亲手挖出来的窑洞。他走进厨房，并与炊事员握手，感谢炊事员为部队付出了辛勤劳动。他又到养猪的地方，同饲养员交谈几句。然后他登上山包，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是：不远的山坡



上，牛羊成群，山川里茁壮的谷子、玉米、豆子，在微风中摇摆着；流动的小河边掀起一片片绿色的稻浪。这一切使毛泽东陶醉，又使他浮想联翩。有这样好的军队，有这样好的人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在1942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王震受到大会的表扬。毛泽东在给王震的奖状上题词：“有创造性”。

吴满有是一位贫苦农民，1935年5月分得60垧荒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把60垧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好收成。由于他的辛勤劳动，成为劳动致富的富农。1942年春天，《解放日报》记者发现了这位生产搞得最好的典型。4月30日，《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一事迹，毛泽东立即发出号召，要求边区的农民向吴满有看齐。1942年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详细介绍了吴满有的情况，阐述了学习吴满有的目的与意义。他指出，学习吴满有，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日”。毛泽东把学习吴满有的意义直接与抗日战争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为了全面掀起大生产运动的高潮，《解放日报》于1943年1月11日发表了《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当时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吴满有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农，而且有剥削，他的方向不应当成为边区农民的方向。毛泽东觉得这反映了我们队伍中一部分同志还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认识不清。因此他亲自领导和支持进行了“吴满有的方向”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不仅促进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而且端正了思想认识。

在工业战线，毛泽东发动了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是山西定襄县人，1939年7月入农具工厂当工人，不久当了翻砂股股长。他在平凡的工作中，犹如泉水滴石一般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为边区工人中的模范。《解放日报》于1942年9月11日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毛泽东知道了赵占魁的先进事迹后，立即抓住这个典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推动了边区的工业生产。解放区的赵占魁运动从1942年至1947年，持续7年之久，促使许多工人提高了觉悟，形成尊重先进、争当先进的好局面，许多落后的工厂转变为先进工厂。

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是当时边区办得最好的合作社。它创建于1936年。开始是以单一经营消费品为业务，后来发展到涉及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不仅经营消费品，还经营供销、生产、借贷等20多种业务，成了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1942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南区合作社的方向，高度赞扬了它的社长刘建章的创造。后来在推广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时，群众创造了其他形式的合作社。1943年，毛泽东又根据这种发展趋势，进一步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毛泽东讲过，典型就是政治力量。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发现典型，推广典型，使典型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26日，在延安同时举行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11月29日，毛泽东把全体劳动英雄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动英雄。他作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12月9日，毛泽东参观了生产展览会，又专门找了吴满有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与冯云鹏、安兆甲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李长荣等谈变工扎工的问题，与

田荣贵谈合作社问题，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包问题，一直从下午谈到深夜才结束。在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评价各位劳动英雄对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希望各位代表回去后把大生产运动推向新高潮。毛泽东还亲笔为劳动英雄题词，激励大家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次劳动英雄大会充分显示了劳动英雄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1944年把劳动英雄运动推广到一切部门，边区的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人人都可以争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1944年12月25日至1945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向全体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作了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他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三种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鼓励他们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进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在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任务，强调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分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以及参加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实践活动，促使他对经济财政问题进行思考。正如他在1941年8月6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所说，近日我对边区财政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在毛泽东心目中，边区有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自然，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不研究中心工作。

在研究经济问题过程中，毛泽东表现出充分的民主意识和知微见著的思维特点。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减轻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那天正值雷阵雨天气，雷击礼堂，一根柱子折断，坐在柱旁的延川县县长不幸触电致死。有一个对负担不满的农民便说，老天爷不开眼，雷打死县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干部主张把这个说怪话的农民抓起来审讯。毛泽东却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认为，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毛泽东正确处理了这件事，这反映了毛泽东的高度的民主精神，也转变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和作风，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下决心去解决边区150万群众的“救民私粮”问题。所以后来毛泽东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队、好公民”。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减至16万担。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1943年初，枣园的人民迎来了春节。初一这一天，毛泽东给当地人民拜

年，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枣园乡平均每人有多少地，今年收了多少粮，交了多少爱国粮，大家生产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乡亲们一一回答并感谢毛泽东的关怀。正月初三，毛泽东又邀请乡亲们到枣园礼堂作客。毛泽东再次给大家拜年，并询问大家，在大生产运动中，你们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大家说能。毛泽东又问用什么措施来保证。代表们说，多耕地，多锄草，多上肥。毛泽东称赞说，这样好，但又指出，这还不够，必须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变工队，互助组，还要做到“耕二余一”。谈完后，毛泽东请代表们吃饭，并亲自给代表们斟酒。在餐桌上他又鼓励大家，一定要把生产搞好，支援前线。

毛泽东在指导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经过自己的研究，写下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组织起来》、《论合作社》、《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等著作和讲演。

为了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毛泽东在较长时期研究边区经济问题的基础上，系统地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在一段时期内，与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朱理治、南汉宸、高自立、高岗、陈正人、叶季壮等经济工作的负责干部书信往来不断，了解财政和经济建设工作各方面的情况。

1941年8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谢觉哉，说他对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有兴趣。同日，他为研究边区财经问题，致信林伯渠，请他检寄有关材料。信中说：“前次（在枣园时）你给我之预算表及你的财政意见书，想再看一次，请检寄为盼！再，你的三年计划，我未见到，请检寄一份。”8月9日，他致信谢觉哉说：“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8月19日，他写信给陈正人，告诉陈正人：“我要朱理治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不知他抄了一份给高岗和你没有？如未，请向他索一份，以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并说：“在起草此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定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8月22日，他在致谢觉哉函中提出：“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因此，“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在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不断地收集和补充资料，以丰富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内容。

1942年12月8日夜，他写信给南汉宸说：“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星期五交我。”12月13日夜，他又给南汉宸写信说：“拟再请你对于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12月20日夜，他再次写信给南汉宸，请他将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个部分的有关材料迅速送交，并且嘱咐在材料里“要说政策，说工作”，使广大干部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他还提出，每件材料中“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直至1943年1月10日，即

西北局高干会结束前4天，毛泽东还给王中写信，请他继续收集材料。信中说：“我还要整个敌工委的‘一九四二年的生产总结和一九四三年的生产计划’，以便看出全盘情形。”可见，毛泽东为写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进行了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形成了他的经济思想。

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路线，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必须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关系，变土地为农民的私产，容许富农经济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合作经济。根据这个经济纲领，毛泽东又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政策。在工商政策方面，实行合理负担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税收方面，实行统一累进税；同时改良民众生活。

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具体地说：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和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经济破坏作斗争为目的；第二，有计划地建立国防工业，从政治上动员工人，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物质待遇，改良工厂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率；第三，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保护战区农具牲畜及手工作坊，保证被隔断区域的经济自给；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注意发动合作事业；第五，在有钱出钱的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第六，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及粮食，供给作战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第七，厉行廉洁运动，改订薪饷办法；第八，由政府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毛泽东非常注意生产建设中的产、供、销三个环节。在生产方面，他重视粮食、棉花和纺织，被服等生活必需品，以及盐、毛纺品等获利大的商品生产，要求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在供应方面，毛泽东重视解决原料供应，便利交通运输。在销售方面，他要求在适当市价下随时推销成品，必须集合财政机关、商业机关和人民合作社共同去做。毛泽东主张反对贪污、浪费、提倡节约、廉洁。他警告：“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他极力推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既要开源，又要节流，这是毛泽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主张，并根据这一主张，发动和指导了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的思想。他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上明确指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来说，就大多数同志来说，确实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大后方的人民。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

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毛泽东论述了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他认为，边区政治工作的内容，就是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以及党、政、军、民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政治工作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那末，这种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

在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毛泽东深深地体会到，必须按照农业是第一位的，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畜牧业是第二位的，商业是第三位的顺序安排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充分发挥上面和下面两个积极性；必须处理好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恰当地发展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公营经济指导和帮助民营经济的发展，公营经济活动应与人民经济活动取得协调，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而引起人民不满的均不许作。毛泽东号召在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时，要组织互助合作，提高生产力。通过组织起来，组成一支劳动大军，依靠群众的力量，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组织互助合作社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助合作，不改变所有制和分配形式；组织合作社时必须采取群众容易接受的形式和方法，实行群众自己管理。

毛泽东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他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他认为，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的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入灭亡。他要求全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

总之，毛泽东推动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又通过总结大生产运动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构成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大生产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两个关键性环节之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巩固根据地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毛泽东曾分析说，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积极的一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是，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

与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集中主要精力抓的另一项工作，是整顿党的作风，并将全党整风运动看作工作的中心环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毛泽东的名字是紧密相连的。

中国共产党在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的同时，也同自身内部的“左”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曾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特别是1931年至1935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的革命。1935年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瓦窑堡会议又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在这以后，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还写了许多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政治、军事著作，同样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实际上都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的。这种批判工作，到1941年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王明等人所犯错误的影响，还没有肃清。1940年3月，王明还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加“序”再版。这年12月，中央在讨论毛泽东的《论政策》一文时，还有人赞同王明的观点，对王明所犯错误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

严重性，认为如果不统一全党对王明错误的认识，不肃清王明错误的影响，将会影响全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团结。

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空前的发展，到 1940 年，全国共有党员 80 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没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没有更多的实践经验。然而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许多入党不久的党员很快走上领导岗位，担负指挥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工作的重任。这些同志比较容易地接受和欣赏那些空洞的革命词句，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提供了土壤和气候。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运用整风的形式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以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以及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足，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毛泽东在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深有感触他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 100 个至 200 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为此，他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这时起，实际上开始了整风的准备。

在这之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指导抗日战争的实践，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他多次强调学习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调查研究则是中间环节。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自己调查研究，而且号召、组织和领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 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编印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并撰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教育全党提高对调查研究的认识，提出了进行调查研究应持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这些都为整风运动的开展作了重要的准备。

1941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集 120 多位高级干部，在延安举行整风学习会议。5 月 19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一报告深刻论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总结了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他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要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即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强调无论做实际工作还是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都要坚持“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实际上是整风运动的思想动员。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同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使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任务，要求全体党员增强党性锻炼，服从党的利益，克服错误倾向，加强党的团结。8 月 1 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

全党克服主观主义习气，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中共中央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担任主任。同时，把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对如何进行研究工作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研究现状。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敌、我、友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引出结论。还要研究日本、研究蒋介石、陈果夫、阎锡山，以求得彻底的了解和掌握。第二，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也要研究孙中山、研究戴季陶、研究胡适的思想。第三，要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理论。

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改组了中央党校，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成立时事政策研究室等，加强对现实斗争状况的研究，纠正在教学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深知，一个政党要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然而，再好的路线，再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需要人去贯彻、去执行、去落实。因此，毛泽东考虑最多的是关于爱护、保存、发展及科学合理地使用革命的有生力量，大量地培养、提拔干部，放手地任用他们，尽可能地把每个干部安置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特别重视党校和党校工作，把党校看成是培养人才、造就干部的阵地和熔炉。他为中央党校亲笔题写“实事求是”的校训，把这一句古老的格言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毛泽东还亲自到党校讲课，关心学员的成长。到党校学习的同志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学员中，有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骨干，也有经过学习将要走向领导岗位的新同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如何，政治立场是否坚定，工作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本领怎样，都关系到我们党的现在和未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倾注满腔心血。

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强调要了解中国的实际，并非轻视理论的作用。他也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当然他的理论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了便于理论研究，毛泽东希望有个人能在理论研究方面做他的助手。中央党校推荐一位20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约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联共党史等方面的问题，他如同在党校讲课一般，不问情由，滔滔不绝，一套一套他讲得十分得意。毛泽东听后很不满意，批评他说：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你们讲的都很对，但离中国革命太远，对目前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没有解决。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于是毛泽东打发这位同志回去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风教育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指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和克服办法。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大前后的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准备，整风运动进入了全党普遍整风阶段。

1942年2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里座无虚席。中央党校正在

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走上台去，作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目为《整顿党的作风》）。大家都在用心听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在礼堂内回荡着……

毛泽东首先指出，在我们党内，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毛泽东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主观主义在党内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违背有的放矢的原则。一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照搬马克思主义，无的放矢；另一方面，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非常形象地说：“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经验主义，即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从狭隘的一时一地的经验出发，指导全局工作和现实的斗争，把局部的偏于感性的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给革命造成危害。克服的方法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分析批判了宗派主义。他指出，党内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错误地对待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错误地对待个人与党的关系；错误地对待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关系；错误地对待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宗派主义倾向在党外关系上则表现为一部分党员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藐视、排挤党外人士。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因此，宗派主义必须克服。

2月8日，毛泽东又出席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发行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要求全党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最后残余加以彻底肃清，以便使党的各方面达到更健全的地步，毛泽东深刻揭露了党八股产生的根源和种种表现。他指出，党八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界形式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语言文字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新教条主义。毛泽东用准确、生动而鲜明的语言，揭露了党八股的八大表现形式，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着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了，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因此，必须克服党八股，普遍采取和发展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提倡宣传工作和创作工作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提倡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的中国气派。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四个文件：一、列宁是怎样进行宣传的；二、季米特洛夫论宣传的群众化；三、鲁迅论创作要



怎样才能好；四、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毛泽东对《宣传指南》一书作了详细的解说，并要求人人加以熟读。

毛泽东的两次报告在延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党整风正式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号召全党开展整顿三风的运动。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要把整风运动开展成为全党的学习运动，通过整风，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较大的提高。1942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毛泽东担任总学委主任。在他的主持下，集中把党的历史上代表正确路线和代表错误路线的文件，在上年编出《六大以来》的基础上，又编辑成《六大以前》，供干部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用。并列出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等十余部著作，组织学习，联系实际，开展讨论。

经过深入学习讨论，弄清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何以纠正了瞿秋白的错误，又出现了李立三的错误；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又出现了王明的错误，而且错误的程度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形态一次比一次更完备。从思想方法上讲，就是以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其共同点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不符合客观。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对于全党取得上述共识，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忧虑。一些同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总结历史经验上，而是提出对党内历史上的错误要寻根究底，追查责任。或者说，把主要精力放在查明历史上的那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起草人的动机与意图是什么？如何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大有追查个人责任之势。毛泽东及时觉察到这种倾向。他在不同场合下多次强调，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的提醒对保证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整风的过程中，还随时注意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针对运动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的干扰，于1942年3月底在改进《解放日报》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他的讲话，防止和纠正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还从1942年12月开始，进行了审查干部工作。本来，通过学习提高以后，党的组织对自己的干部进行审查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一些预想不到的原因使审干发展成反特斗争。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日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提出“抢救失足者”以后，错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审干，特别是“抢救失足者运动”，虽然也清查了一些真正的特务，但严重扩大化了，通过“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许多革命者和进步青年蒙受不白之冤。

毋庸讳言，毛泽东对此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随着审干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发展，党内和根据地内受到打击的对象越来越多，对立情绪也越来越严重。任弼时发现问题后及时报告给毛泽东，任弼时在反映情况的基础上，并提出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毛泽东采纳了任弼时的建议，并着手纠正那些错误做法。但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又犹豫了一下，认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尽管情况有所缓和，但事态并没有彻底扭转过来。

毛泽东经历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恶劣环境的严峻考验。那时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永远难以从他的记忆中抹去。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于1943年7月1日提笔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好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7月30日，毛泽东再次重申了防好工作的正确路线，指示要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制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了九条方针。

但是，康生不执行正确路线，大搞逼、供、信，而且开始大量抓人和杀人。毛泽东知道这些消息后，及时制止，并于1943年10月9日明确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方针，避免了更严重后果的出现。

从1944年春起，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4月，毛泽东约见李克农、周兴和师哲等人，专门谈论逼、供、信的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表示对各类口供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他回忆起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说，在江西反AB团时，每一个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团是怎样出来的。毛泽东问李克农等是否也在搞逼供信。当毛泽东知道审讯科长是江西过来的，送给他的口供材料是这位审讯科长提供的时，毛泽东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说，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我只看了1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给我送来了。毛泽东继续解释他为什么不想看这些口供，说，是因为这些口供像写文章、小说，不像口供。他反问李克农、周兴和师哲，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有人回答，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毛泽东听后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是假话？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毛泽东最后强调，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严格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李克农等深受教育，茅塞顿开，也使全党受到教育。

毛泽东还亲自抓各种案子的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1943年底，延安大学合并到行政学院。这里被审查过的同志意见很大，有些同志给毛泽

东。周恩来写信申诉，说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毛泽东接到信后，亲自到行政学院，在 1000 多名教职员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这像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他还说，有些好同志被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并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叫实事求是。现在要对审查过的同志进行复查，甄别定案，错了的平反纠正，帽子戴错了摘下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听了毛泽东讲话以后，学院选调了一批干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开展甄别定案工作。这项工作毛泽东的关心下进行得很顺利。

1945 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的同志作报告，讲到审干问题时，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以严以律己的精神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们对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给人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注意慎重；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们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了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好工作就会好得多。在会上，毛泽东把手举到帽檐下，对被戴错帽子的同志赔礼说：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向你们行个礼，赔个不是。接着他又说，你们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不久，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大上，对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再次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当他讲到这句话时，举起右手，沉重地说，我向你们道歉！毛泽东这种胸怀，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全场代表。

整风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它丝毫不影响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不影响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的实现。

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扫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整风文件，统一全党对王明“左”右倾错误的认识。1941 年 5 月以后，毛泽东一面主持编辑中共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一面号召和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并有针对性地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上因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而带来的严重危害及其历史教训。1941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初步结论，认为：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从“九一八”以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三、王明到苏联后，虽然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五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四、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负责长江局工作期间，也犯有严重错误。与此同时，毛泽东几次同王明谈话，进一步明确指出王明在 1937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都有错误，即在政治上犯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具体地说，就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为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王明在统战下缺乏独立性与斗争性；（3）

军事战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的思想；（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和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是极不对的。”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希望通过揭露和批评王有的历史错误，来教育全党，达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清除王明等人的影响的目的。

在整风运动中，王明一方面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以毛泽东为模范”，“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伟大事业而奋斗”，并且公开申明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它的“唯一正确政治方针”。另一方面，又企图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许多同志在会上发言，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强调：检查王明的错误，要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全党要团结，我们的标准是，把党斗好，不是斗翻，这次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时王明因病未参加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去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也去探望，有时和他交谈达5个小时之久。经过细致的工作，王明的思想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王明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决议，承认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他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错误，但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分析，既为全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认识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提供了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同时又如春风细雨给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以真诚的安慰，许多过去犯错误并排挤过毛泽东的同志为毛泽东的坦诚而感动，因而深刻地作了自我批评。这些又使毛泽东由衷地感到高兴。

整风运动中延安是主战场。各根据地的领导先后回到延安，毛泽东总是怀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迎接来自前线或国民党统治区的战友。1943年8月，周恩来偕邓颖超由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率在延安的中央委员、高级干部2000余人参加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陈毅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了。自1934年红军长征后，两位老战友一别多年。延安整风期间，陈毅回到延安。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相见，毛泽东格外高兴，对陈毅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询问陈毅分别后的情况，陈毅一一作答。通过整风学习，陈毅对自己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的误会有了新的认识，他找毛泽东谈自己的认识，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自我批评。毛泽东说，认识了，就好了，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凯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过“左”倾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上是最厉害的一个，甚至到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还声称要“走着瞧！”在整风过程中，他认识了王明的“左”倾错误，也认识了自己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查。毛泽东既往不咎，非常信任他，让他作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几次作整风的报告，都是凯丰主持的。

在经过几年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在全党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清算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各方面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危害，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和统一。《决议》的制定和通过都倾注了毛泽东的满腔心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基本结束。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它像一部播种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播送到每个革命者的心田上，培育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像一座熔炉，锤炼出成千上万的干部，使全党空前团结一致；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航程，为抗日战争以至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切都是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占有重要的位置。毛泽东也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一个方面军。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对于鲁总司令领导下的“文化军队”，毛泽东一直关注、爱护他们，寄愿望于他们。

延安成为“红都”后，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奔向这里。在延安，他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空气，焕发出巨大的创作冲动。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见见毛泽东，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但仍挤出时间来满足大家的要求，还在1936年10月，红军刚在陕北站住脚。1935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关押在南京，1936年才被释放的著名女作家丁玲辗转到达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也前来表示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随后，她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填写《临江仙》一首送给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技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把靠一枝笔战斗的女作家比喻成三千毛瑟精兵，足以看出毛泽东何等重视文艺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更多，不少作家、诗人回忆当年被毛泽东接见和交谈的情景，无不引为自豪。

著名诗人何其芳于1938年8月底，同作家沙汀、卞之琳等到达延安。何其芳回忆起9月初受毛泽东接见的情形时说：9月初的一天，我和同来的几位到达毛泽东的住地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张制造粗糙，没有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的白木桌前，他有些疲劳，但却很健康，充满了精力，黑色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的语言爽朗而幽默。毛泽东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他说，从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在武汉时，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后来上井冈山了，没有车子坐，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毛泽东再次鼓励大家到前线去。我们根据他的要求，到了前方，写出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歌和文章。

诗人臧云远大约是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的。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那时正值毛泽东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时候。臧云远进入毛泽东的窑洞时，毛泽东正在伏案写作。见有客人进来，他放下毛笔，同客人握手。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谈话是从《论持久战》说起的。毛泽东问臧云远在汉口文化界对这篇讲演有什么反映。臧云远告诉毛泽东，汉口文化界交口称赞这篇讲演。毛泽东又问臧云远是哪里人，臧云远说他是山东蓬莱人。毛泽东接着问，那里地势怎么样，有山吗？臧云远告诉毛泽东，胶东像个牛头，蓬莱是牛角，突出在渤海，海里一串岛屿，是渤海南端的门户，陆上丘陵起伏，东南在青岛北面有崂山，面对太平洋，西面有泰山，算是顶高的。当中无数小山，一片片松林。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头。后来根据这些情况，加上其他方面的了解，毛泽东决定派许世友率部在胶东建立了敌后根据地。谈话还在继续。毛泽东又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臧云远一一作答；并告诉毛泽东，在武汉有人提出，战争期间能否写出伟大作品，毛泽东深有感触他说，过去十年内战，革命文艺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在瑞金，中间叫国民党反动派割断了，没有革命的斗争生活，怎样写革命的文艺呀。现在统一战线，举国一致打日寇，文艺跟革命生活相结合，反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在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臧云远问毛泽东对当时文化界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有什么看法。毛泽东又很有兴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因为封建落后，反对愚昧，就要来个启蒙。中华民族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留下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还没来得及有系统的整理考证，理出头绪，还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方面资料很多，杂乱散落，要下一番功夫，弄清楚事实，这是整理和考证的工作。然后，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历史唯

物论的观点，掌握资料来分析批判，看哪些是好的，有用的，哪些是坏的，没用的，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要为新时代所用，这是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要一道来作。他们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由文化而文艺，由诗歌到小说，由现代到古代，由实践到理论，一直谈到深夜。

1939年初春，身居异国的萧三来到了延安。当天下午，李富春告诉毛泽东他当年的老同学来了。毛泽东快步迎上来同萧三握手，深情他说：呵，十多年不见了！晚上，他设便宴招待萧三与其他归来的同志。席间，两位老同学亲切交谈。当萧三说了几个国外的消息之后，毛泽东笑道：“这是洋新闻。”毛泽东回忆起20年前与萧三到天津大沽口看海之行时说，那时期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饭后大家散去，毛泽东约萧三进他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小坐。毛泽东让警卫员把萧三直送到山上“鲁艺”的窑洞后，才返回去。不久，毛泽东又到“鲁艺”看望萧三。两人谈起文学问题。萧三说，当时在国外搞文学的仅他一人，他自称写了几首诗，被别人称为“诗人”，感到惭愧。毛泽东肯定他说：“是诗人。”萧三说他在苏联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你不反对的话，请你翻翻古。毛泽东说，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有味的，等我休息时候同你谈。不久，毛泽东再次约见萧三，告诉他，中央开会决定要他去“鲁艺”工作。毛泽东勉励萧三做出些成绩来，争一口气。后来毛泽东多次同这位老同学交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也谈自己的文艺观。有一次，他同萧三谈起《聊斋志异》时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里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1937年，在抗战的硝烟战火之中，柯仲平来到了延安，在文协供职。当时他只有30几岁，毛泽东快50岁了。一段时间的交往，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晚会，特意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前来观看。当时演出的是传统历史剧，看戏的人很多。毛泽东注意到这种情景，他看了一阵，就侧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边区工会主席齐华说：“看来这种戏很受群众欢迎，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能改成新内容就好了。”齐华点了点头，然后对毛泽东说：“文协老柯在这里，他是专门艺术家。”这时毛泽东又转过身来，问坐在后面的柯仲平说：“是不是应该改？”柯仲平点点头。从此，柯仲平下决心组织一个受群众欢迎的剧团。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4日边区民众剧团成立，柯仲平任团长。民众剧团虽然演了不少好剧，在边区群众中也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也遇到很多困难。毛泽东知道了柯仲平的困难，他就把自己写《论持久战》的稿费300元钢洋捐献给民众剧团，使柯仲平和剧团大受鼓舞。

这一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边区印刷厂的工人开晚会。毛泽东也从凤凰山麓赶来参加。在晚会上，柯仲平当场朗诵了自己的新作《边区自卫军》。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柯仲平用洪亮的云南口音，读得热情奔放，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听得入了神。当柯仲平读完时，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高兴他说，你把工农大众作了诗的主人，对民歌形式进行了吸收、

融化，为诗歌的大众化作出了辛勤的努力。毛泽东还特意把这首诗的诗稿拿了回去。过了一两天，他就派警卫员把诗稿还给了柯仲平，上面还批了几句赞扬的话，说是“此稿甚好，赶快发表”。

毛泽东同文艺界交往的另一条渠道就是同文艺界人士建立广泛的通讯联系。在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信中，既有体现个人情谊的私事，也有涉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方面的意见。老同学萧三写信问可否提供一匹马以作交通工具。毛泽东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代他“查问一下”，同时答应，如果萧三“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毛泽东读《大众习作》第二期后，立即写信给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称赞他们的工作“是意义有成绩的”。他看了成荫等人创作的反映当时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等剧后，又写信给成荫及有关方面的领导，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称赞他们的剧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一些这类的戏。稍后一点，即1944年1月9日，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逼上梁山》在延安公演。毛泽东看完戏后，写信给编导，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他向编导致谢，并请编导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在信中，毛泽东高度评价杨绍直、齐燕铭等在旧剧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说：“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生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1944年6月30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当天，毛泽东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了这两篇文章。天快亮了，毛泽东提笔给丁玲、欧阳山写信，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并希望了玲、欧阳山在当天下午或傍晚到他的住所交换意见。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告诉郭沫若已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运用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的文章。他诚恳地告诉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的书信往来，沟通了思想，交流了观点，建立了友谊，成为了解文艺界情况，指导文艺界斗争的重要形式。

文艺在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单靠外地来的文艺工作者是难以完成它应承担的责任的，必须培养和造就更大的队伍。这是毛泽东通过革命斗争实践得出的重要认识，1938年1月，为了纪念“一·二八”五周年，一些过去在上海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延安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了一出抗日的戏剧。毛泽东看了这次演出。看完后他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是第一个签名的发起人。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参加了这个典礼，招待来宾的同志请他坐首长席。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他一定不肯坐首长席，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在开学典礼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请毛泽东讲话，他又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鲁迅艺术文学院，作了一次



重要的讲话。

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很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观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得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

他说，你们的校歌唱道：“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这很好。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像杀猪，杀不好，猪就会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像陕北人。

他说，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能够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

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毛泽东还问“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哪一种好。他自己回答，“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都会唱。

毛泽东的讲话给鲁艺指明了教学方针和办学方向。1939年，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亲笔题辞：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纪念仪式上，冼星海指挥演唱他的著名作品《黄河大合唱》，演唱像黄河本身那样雄伟，那样惊心动魄，那样表现出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毛泽东为这热烈的气氛和气势所感动。当演唱结束时，他动情他说了几声“好”。1940年秋天，毛泽东亲笔为鲁艺写了八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鲁艺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师生们的努力也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而鲁艺的成长又渗透了毛泽东的心血。

1942年，整风运动逐渐在延安各单位开展。根据中共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化战线的整风运动。而这时的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暴露黑暗”等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文艺界的整风，澄清一些是非。为此，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交谈。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回答说：“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又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几天，艾青将毛泽东委托他收集的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泽东，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接着，毛泽东又三次约请刘白羽谈话。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刘白羽把议论结果告诉他。第二次是听刘白羽汇报。第三次

向刘白羽谈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

毛泽东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藻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还谈到了人性问题，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共约请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谈心。通过交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提出了完整的构想。

1942年5月2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一到会场，周扬就陪同他和大家握手见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宣布座谈会开始后，毛泽东作了“引言”部分的讲话。他指出：我们有两支军队，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又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毛泽东作了《引言》讲话后，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言，抒发自己的看法，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柯仲平代表民众剧团发了言，他针对有些人看不起《小放牛》的情绪，说，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每次演出之后，群众都拿出许多鸡蛋来慰劳我们，我们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向新的演出地点走去，鸡蛋皮就扔了一路。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不用问，只要顺着鸡蛋皮就找到了。听到这儿，参加讨论的毛泽东不禁笑了起来，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毛泽东等领导人不时插话，使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5月16日继续讨论。5月23日开第三次会议。参加的人扩大了一些。会场里挤得满满的。傍晚时分，毛泽东同代表们合影留念。晚饭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会场上，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的木架上悬着一盏汽灯，耀眼的白色灯光燃烧着，更增加了会场的热烈气氛。代表们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声音：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作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作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泽东针对大会讨论的问题，针对文艺座谈会以前延安文艺界的争论和情况，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问题，从理论高度系统地解决和回答了革命文艺运动、革命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

向问题，规定了革命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的命题。这个问题在文艺界长期未能解决，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虽然没有人反对这个观点，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讨论得很不充分。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强调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个原则问题，也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他指出，文艺工作者不站在工农兵的立场去描写工农兵，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去描写工农兵，那只能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

毛泽东论述了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指出，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毛泽东分析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座谈会上，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另一种观点认为文艺和政治“殊途同归”。毛泽东批评了这些观点。他认为，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并反转来给予政治以重大的影响。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强调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但是，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意味着二者关系的完全绝对化，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是好的文艺，否则便是不好的甚至是坏的作品。二是艺术标准，艺术标准主要是看其社会效果。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还提出文艺创作的“古今中外法”。他形象地说，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这就是他后来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形象的语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像灯塔，照亮了文艺工作者的心，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其中也有不精到之处，如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但讲话的历史地位、历史功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出来，不断为实践所证明。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不久，即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应邀到鲁艺讲话。毛泽东用一个生动具体的事例讲了社会生活比文学艺术更丰富，但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又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带有普遍性这个问题。他说：从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

《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他在这个戏中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见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来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艺术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讲到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他用毛儿盖的大树和豆芽菜来比喻提高和普及。他说：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儿盖那个地方，长着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儿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用一些动作来描述和讽刺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最主要的还是讲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他对鲁艺各系的同学们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为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他用柳宗元的《黔之驴》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贵州没有驴驹子，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头驴驹子。

毛泽东借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没有自知之明，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高踞在群众之上，吓唬群众。开头群众也许还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有些尊敬；等到他们看透了你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只不过有一副臭架子，就不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群众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奔向抗战前线，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有的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通过实际斗争的磨练迅速成长，创作了像《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斗争实际的作品，发挥了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应有的作用。

毛泽东领导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胜利开展，使中国共产党在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两个方面，立于不败之地。由于开展了这两项工作，加上其他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措施，使各抗日根据地渡过了难关，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上升了，这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 二 “毛泽东思想”的由来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确立下来，毛泽东思想也逐渐为全党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领袖和革命理论。

还在整风运动期间，1943年3月16日，一次重要而意义深远的会议在延安举行。

这是一次决定中央领导机关的设置和工作职责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着领导全党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属重大的政治、思想、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并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根据决定，中央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下的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这次会议从组织上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地位。

早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职务的变迁，如同晴雨表，反映出毛泽东地位的升降。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就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然而在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少走弯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虽然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原则，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然而，他本人被指责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他的创造性理论并没有力全党所接受和理解。

要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及如何把两者结合，这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问题之一。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看作行动的指南。”他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思想原则。

遵循着这一原则，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一大批理论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有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为“毛泽东

思想”概念的提出准备了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41年3月，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毛泽东杰出的领导才干和理论建树，赢得了全党广泛的赞誉。1942年7月，张闻天深有体会地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可以转危为安；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即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或反对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就会遭到挫折，就会转胜为败，就会从胜利走向困难。

朱德是毛泽东的战友。早在井冈山时期，他们一起战斗，一起探索，他们的名字被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中，朱德更体会到毛泽东的作用。1942年7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又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是王稼祥。1943年7月5日，他在为纪念党的22周年诞辰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概念首次提出。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8月2日，中央办公厅组织隆重的欢迎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发表演讲，提出了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这一断语。他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

但是，毛泽东本人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1943年正值毛泽东50岁生日。

延安的一些同志想为他祝寿，并同时提出宣传他的思想。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把这个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复凯丰的信中明确表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在信中，毛泽东诚恳他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3年12月虽未给毛泽东庆祝50大寿，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却普遍得到公认。毛泽东本人虽然对这些提法默认了，但对于把他的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还是执意不允。

1944年春天，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内容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其中收入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为该书写了一篇编者序言，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于1944年4月2日写信给周扬，认为周扬的序言“写得很好”，而且称赞周扬“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了一课。”但是对把他的讲话同马列并列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但从一开始就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也逐渐被全党所接受。1944年5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5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部选集卷首的“编者的话”指出：“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我们才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同时又指出，《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同志和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经过整风运动以后，全党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旗帜具有无可比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而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趋于一致，全党已不再把它作为单纯每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的科学体系。1945年3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第一次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3月31日，刘少奇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



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刘少奇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中国化了

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规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此，毛泽东非常清醒。他写信给郭沫若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要郭沫若“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1944年年底，毛泽东在同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G·斯但因谈话时说：“我也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历，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便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给他们。”

1942年2月，张如心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的提法，1944年7月1日，萧三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提出应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整个体系。对此，毛泽东在当时虽未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内心是没有接受的。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电报最后说道：“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接到吴玉章的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于8月15日给吴玉章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未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并不反对别人学习他的著作。他把自己的著作始终看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范畴。在给吴玉章的信中，他解释说：“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毛泽东坚持不提毛泽东主义，坚持不把自己同马、恩、列、斯并列，说明他这时是谦虚、谨慎的，在一片颂扬声中，他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科学的唯实精神。更可贵的是，人民拥护他，热爱他，他也热爱人民，同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工作之余，他在延河边散步，碰到老乡，他总是主动打招呼。他关注着人民的翻身解放，也关注着人民的衣食住行，还关注人民的生养死葬。延安附近的侯家沟有两个小村庄的妇女很少生孩子，毛泽东知道后，把

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找去。张汉武还以为毛泽东要同他谈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急事，疾步来到毛泽东的住所，见面就问毛泽东有什么任务。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然后问他知不知道侯家沟有两个小村庄的妇女为什么不生孩子。张汉武回答说，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又问，是不是水有问题？请中央医院去把水化验一下好不好？张汉武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毛泽东严肃他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决不是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谈话后不久，中央医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派人到那两个小村庄化验水，发现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医院指导群众对饮用水进行了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后来，那两个村庄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小事见真情。延安人民从心里感激毛泽东，于是，他们给毛泽东送来金匾。金匾上写着：“民族救星”。

### 三 光明之路

在处理皖南事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娴熟的统一战线艺术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使得他的对手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军事上也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他消灭新四军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授中国共产党以口实，中共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新四军新的领导机构成员。新四军开赴江北，建立了以盐城为中心的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变化。在延安，毛泽东似乎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在皖南事变过程中，毛泽东茶不思，饭不香，睡不宁席。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受到较大的损失，但毕竟其主力没有大的损失，而且“吃一堑，长一智”，对全党上了很好的一课，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国民党蒋介石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讲，皖南事变又是一件好事。

表面上的松弛，并不等于实际上的风平浪静。毛泽东对此非常清楚。正如1942年4月13日他在中央学习组上发表对时局问题的讲话时所指出的：蒋介石“暗中布置，想把我们在国民党区域的力量搞干净”，“想占我们的地方”，尤其是在“英美面对困难”，“苏联尚未脱离困难”，日本“决不会以主力专攻中国”，“天下莫敢予毒的良机下”，他“正好放手反动”。为此，中共中央命令各地党组织及八路军、新四军，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的新的反共磨擦。

但是，在对蒋介石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毛泽东仍然倾其全力以维持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因为他相信蒋介石在此时此刻还“不会投降”，而国民党的中间势力都“不愿内战”。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尽可能减少国共之间磨擦因素，这些措施包括加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恢复同国民党的谈判，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和击退国民党制造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方面，毛泽东提出团结对敌，周密考虑有计划的配合。1941年5月，国民党军队正组织中条山战役。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提出要八路军给中条山战役以配合，并说如配合行动，可发给军饷和弹药，根本问题，也可谈好，还可下令放人。八路军一二九师为配合中条山区友军作战，对同蒲铁路平遥以南，白晋铁路长治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以南诸段进行破击。5月14日，毛泽东就关于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同一天，他就同一个问题给周恩来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在这次被日本侵略者打击以后，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武汉失守后的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付共产党，放松对付国民党，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产党，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向周恩来通报了他同彭德怀商定的关于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原则，以利于周恩来在谈判桌前同国民党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卫立煌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曾去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交往。1941年6月9日，毛泽东等就晋南配合作战问题给卫立煌去电，详细分析了敌、我、友三方态势，表示八路军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

战，提出直接配合和间接配合两种形式供卫立煌选择。所谓直接配合，就是八路军派出主力部队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的破袭任务，以及担任黄河北岸的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造成友军在黄河南岸、西岸堵击的有利局面。所谓间接配合，即我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大、白晋北段及同蒲的破袭任务，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在电报中，毛泽东称：“今之建议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后来在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贯彻反共方针，结果吃了大亏。

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以斗争求联合”的方针，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因此，1941年6月28日，他致电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因此，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的手段。

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长沙，湘北处在危机之中。9月9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战。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为了争取时局好转，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广播讲演，呼吁加强团结。

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年头之一。但国际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即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营最后形成。1942年将是两大营垒空前激战的一年。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趋势判断，蒋介石暂时可能不会发动反共高潮，“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破裂，是拖的局面。”因此，毛泽东决心做更大的努力，争取“国共好转和民主共和国的前途。”(11)根据这个判断，为了争取国共关系的真正改善，中国共产党准备作出重大的让步，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就改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给刘少奇发出指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让步的具体设想。他指出：“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联合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这就是说，毛泽东提出对国民党让步条件已经基本明朗。7月底，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动向国民党方面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把黄河以南部队撤回黄河以北，这是需要极高胆量才能提出的战略设想，它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毛泽东的建议对蒋介石来讲，似乎是不可思议。蒋介石又惊又喜。惊的是毛泽东好像放弃了中共在皖南事变前后所坚持的强硬立场，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喜的是蒋介石不花一枪一弹就基本上实现了他在1940年7月16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的划界要求。毛泽东抛出的政治绣球，蒋介石很快接受。蒋介石两次主动约周恩来谈话，随后又表示愿与毛泽东在西安面商一切。

1942年8月19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同意在西安面谈。

对此，周恩来提出异议。9月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坚持要亲自与蒋介石会谈。他说：“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对此，周恩来仍然提出不同看法。最后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林彪作为自己的代表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仍旧明确指示周恩来：“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毛泽东认为，只要两星期内斯大林格勒守住，日本不攻苏，则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因此，“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随后，毛泽东连电李先念、朱瑞、陈毅、邓小平、陈少敏等各地领导人，要求全党一致“极力争取国共好转”，“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并“不应刺激国民党”。

9月14日，林彪代毛泽东由延安飞往西安。第二天，毛泽东分析国共两党关系与国际国内形势之间的联系，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促成国共谈判是我们目前的任务。他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国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争起，英美苏关系好转，至于今天，国共两党间即没有大的冲突。我们目前任务，是促成两党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毛泽东获知蒋介石已由西安返回重庆，他又指示林彪由西安赴重庆，以期打开谈判之门。

但是，蒋介石在接过毛泽东抛出的政治绣球后，视毛泽东的谈判诚意为软弱可欺。在同周恩来、林彪的会谈中，他采取顽固立场，一是要何应钦、白崇禧代替已经指定的张治中、刘为章为谈判主持人，二是提出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为谈判基础，企图通过谈判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劝说共产党放弃根据地和军队。

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丝毫逃不脱毛泽东敏锐的眼光。1943年1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就对蒋介石的阴谋洞烛其奸，明确指出：“彼方提出以前提案为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为目的？”随后又准确判断：“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尽管蒋介石如此顽固，毛泽东还是坚持仁至义尽，他相信“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因此毛泽东指示各地负责同志：“我们应下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尽管随后出现的种种情况，特别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预示着“国民党有发动反共宣传可能”，(12)毛泽东仍主张共产党方面“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13)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使蒋介石认为反共的时机到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制造反共宣传攻势，企图取消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治。同时，蒋介石增兵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毛泽东从有关方面获悉上述情况，心里又平静又愤慨。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他早有思想准备；同时，又感到愤慨的是蒋介石发动反共宣传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尔反尔。于是，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揭露蒋介石正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他希望董必武在

国统区发动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制止内战。同时，毛泽东指示董必武找张治中、刘为章及英美等国驻重庆使节，交涉制止。毛泽东还致电董必武具体筹划“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

毛泽东的态度和苏美等国舆论界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严重不满，使蒋介石深深的陷于被动之中，他只好采取低调办法，降低反共宣传。这样，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毛泽东随即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虽被击退，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在全国广泛散布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地不声不响的进攻我军。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毛泽东提出，我党政策是尽一切办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打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和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1943年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举行。蒋介石假作委屈求全。尽管毛泽东知道，这又是蒋介石的欺世之举，但毛泽东于10月5日致电董必武，表示“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指示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以示缓和。10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所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社论分析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揭露了国民党准备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共和解放区的诬蔑，对于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总结。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可能走向三个方向：一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是照老路拖下去；三是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严厉警告国民党：走第一个方向是死路，走第二个方向也不是活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才是生路。

在这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趋于缓和。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力避刺激国民党”，“力避由我启衅”，“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同时，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时，再次表示准备坚持“拥蒋抗日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毛泽东开始考虑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毛泽东并不奢望在抗日胜利后，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另起炉灶的政府，但也不允许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继续下去。为了解决建国问题，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渝见蒋介石，并举行谈判。谈判的主题就是建国问题。5月14日，中共中央派出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重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较大的让步，但双方的距离相差太远。毛泽东密切注意着在西安、在重庆的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6月12日，他呼吁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政府”。14日，他又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明确指出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自大骄傲，不可一世”，“没有团结与民主的方针”。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中外记者很难进入陕甘宁边区。1944年6月9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该团一行21人冲破各种阻拦到达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和扩大影响的机会。12日，他在延安接见这些记者，介绍了国内外形势，然后强调：“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

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毛泽东又着重谈了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和工作，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民主必须是多方面的，是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党务上以及国际关系上的。统一是需要的，但这个统一，应该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产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穿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

7月22日，在团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美国军事观察组一行18人分两批乘飞机到达延安。他们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毛泽东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进行了多次谈话，有时长达8小时。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坚定的，现在为中国的抗日民主事业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不管外国人对此是赞成还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都要坚持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并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避免内战，同时，也希望美国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扩大政府的基础，如果不能立即成立联合政府，也愿意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召开党派会议来制定建立联合政府的详细步骤。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友好支持和抗日方面的合作。不论美国在战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我们是否能够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枪一弹，中国共产党都将继续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同美国合作，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协助美国空军人员，在美军于华东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等等。战后，中国共产党也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理解，因为美国对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能够发挥作用。中国必须工业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提高。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中国革命需要国际的援助，但我们决不躺在苏联身上，苏联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它自己的困难。

毛泽东同谢伟思的谈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美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根本立场，这种立场是光明磊落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反法西斯人民的利益。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谢伟思，先后写了50多份报告，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增加了美国政府领导人对中共、对毛泽东的了解。

9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提出“废除一党统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具体阐明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响应。但蒋介石却把这一主张视为“异物”，10月10日他在重庆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公开反对“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1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的评论，指出蒋的演说“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同时指出，这篇演说说明了蒋介石坚决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着他准备反共内战。评论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本侵略者，投降伪

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要求全国人民提高警惕，认识中国的内战危险不但存在着，而且在发展着。

“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提出后，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反映。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10月，史迪威被撤换，由蒋介石所同意的魏德迈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1月中旬，赫尔利开始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时，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它的对华政策，认为必须加紧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扶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但这时美国仍表示赞同国共合作，并让赫尔利居中调处国共关系。美国政府寄希望于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只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战后就可以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因此，赫尔利来华后，参加了国共两党的谈判。10月中下旬，赫尔利还同中共方面的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进行了接触。

11月7日，赫尔利离重庆飞赴延安。从8日开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赫尔利举行会谈。赫尔利一开始便声明，他来延安是受罗斯福总统委托，也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他的任务是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军队“统一起来与美军合作”和“支持民主”。他认为国共两党都是爱国的政党，蒋介石则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并且“真正希望中国统一自由与人民幸福”。他表示愿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和吸收中共代表参加军事委员会。随后，赫尔利拿出了经蒋介石修改过的国民党的提案，表示这只是作为谈判的基础，不是一个同意或拒绝的文件。

毛泽东首先对赫尔利访问延安表示欢迎。接着，他向赫尔利分析了中国抗战形势，阐述了中共的一贯立场和主张。他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也需要民主，没有民主就不能团结，中共愿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原则是不能破坏解放区的抗日力量和不妨碍实行民主政治。对于赫尔利带来的国民党提案中的“五点建议”，毛泽东说明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他强调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不是促进“民主程序”，而是国民党彻底改变其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军队问题，毛泽东指出：应改编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改组哪个军队。毛泽东还表示：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中共确实不能服从。如果要讲服从，一切抗日军队都应服从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对于同等待遇问题，毛泽东嘲笑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每月的薪金只够“支”讨一包美国雪前”。中共军队不会要求与国民党军队享受同等待遇，因为那样做的话，中共军队的战士会像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样，“虚弱得不能行走”。赫尔利在谈判中激动地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辩护，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其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溃败归因于在缅甸战役中消耗了巨大的资源，他甚至指责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是“不公平的”。毛泽东驳斥说，他不过是重复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话。赫尔利迫于事实，不得不有所收敛。当他意识到毛泽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中共不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后，他提出毛泽东与蒋介石举行一次“伟大的会见”。

经过两天的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达成了“五点协议”：（1）国共两党应通力合作，为



打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2）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3）实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4）承认中国所有抗日武装力量，公平分配所有获自友邦的军事装备；（5）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11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在协定草案上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也签字作证。同日，毛泽东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声明这个协定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抗日统一战线中所力争的，中共中央一致接受此协定的全部条款，并努力使其付诸实施。赫尔利在签字前也向毛泽东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当天，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回重庆。

但是，蒋介石认为此协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拒绝了这一协定，并提出三点反建议。赫尔利的态度也发生了180°的大转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2月19日接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时严正指出：中共不能被双手反绑着参加政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

1945年4月，赫尔利回国后公开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并扬言要帮助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在7月召开的没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一次会议上，拒绝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唱一和，双簧演得颇为热闹。

针对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反共言论，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篇评论，以及《再评赫尔利政策》等文章。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于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赫尔利与蒋介石演的双簧戏彻底破产。

尽管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拒绝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这一主张。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时，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用人民的力量，用种种办法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作政治报告，表现出他对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和执著。

中国共产党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国民党坚持实行一党专政，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摆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感到，制定争取一个光明的中国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在历史的车轮进入1945年的时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

毛泽东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高兴。1945年元旦和春节期间，他以少有的轻松同延安人民共度佳节。他参加元旦干部晚会，出席延安枣园春节联欢午餐。大年初一，他又给枣园人民拜年。然而，毛泽东又没有被眼前即将到来的胜利所陶醉。他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当人们为眼前的斗争而思索、而战斗的时候，他已经在探索、规划着未来了。胜利的曙光不等于胜利的实现。

如何将可能的胜利变为现实的胜利，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着的问题。在这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召开耽搁多年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迎接和组织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 1928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1931 年 1 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便决定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做准备工作。当然，那时的毛泽东正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七大”的筹备工作与他无缘。而形势的恶化使“七大”的召开根本没有可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举行会议，又提出了近期召开党的“七大”的任务，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包括王明、朱德、周恩来等 25 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和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等 5 人组成的秘书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随后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七大”筹备工作，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选举“七大”代表。

整风运动开始后，全党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逐渐取得一致看法。1944 年 5 月 21 日至 1945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党的“七大”作了最重要的准备。

这时，各地党组织选举出的“七大”代表陆续到达延安。而代表的资格审查成为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任弼时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告诉毛泽东，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听了汇报后，毛泽东经认真思考后，当机立断他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于是这个难题解决了。

1945 年 4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大”预备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他说，我们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具有领导性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 100 多年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特别是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英勇奋斗的历史，指出这是中国翻天覆地的 25 年，革命经过失败、曲折，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特别讲了“治病救人”的问题，他说，要为了救人而去治病，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个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一切同志，要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团结起来，像决议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的，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以好的态度对待他，对于有缺点的人要团结一致。

毛泽东的报告，规定了“七大”的方针和方向。会议通过了“七大”的议程。

1945年4月23日下午5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的。“七大”开幕时，会场布置得庄严而又简朴，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第一次挂在党的正式会场上。任弼时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大会开幕。

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即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中国有两种命运，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

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毛泽东指出，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泽东列举了已经具备的条件，指出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

在开幕词的最后，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开幕式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论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他说，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广大范围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条路线，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实行积极抗

战的路线即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由于存在着两条路线，便形成了两种战争：人民战争和反人民的片面战争；形成了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两条路线，一条是胜利的，另一条是失败的。

毛泽东对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作了全面、精辟的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式军队比国民党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这个军队之肝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方法，并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生产。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在解放区，民主政府也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认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的和具体的两部分，而一般性的纲领又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最低纲领，以及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两部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最低纲领，是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完全是空想。

毛泽东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纲领。这就是：第一，彻底消灭日本侵

略者，不许中途妥协；第二，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第三，人民的自由；第四，人民的统一；第五，人民的军队；第六，土地问题；第七，工业问题；第八，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第九，少数民族问题；第十，外交问题。毛泽东还具体指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解放区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在解放区，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首先，理论和实践密切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谁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会走向失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通过整风，克服这些问题，党的事业才有新的活力和生机。其次，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显著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共产党人必须相信群众，依靠人民，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力量。最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为了人民的利益，克服我们的错误，纠正我们的缺点。

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迎接胜利日子的到来。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发给大家。在大会上他又以生动、形象而又诙谐的语言强调了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和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和革命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路线、纲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里面有一个队伍，有一个敌人，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所谓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和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没有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一切革命。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就是领导农民。过去的右倾和急性病，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当然，作为党来说，当作领导思想来说，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就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忘记了这一条，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权问题上，和我们争的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我们的方针是既团结又斗争，讲到

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口头报告以巨大的理论逻辑力量震撼着代表们的心灵。在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气氛非常活跃。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七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也是“七大”通过的党章最大的历史特点。

从5月24日开始，“七大”转向选举议程。选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也是毛泽东长久考虑的问题。在筹备“七大”的过程中，党内一些同志有不同的推测。现在“七大”已经进入了这项议程，毛泽东必须代表中央政治局，代表主席团阐述这个问题。24日“七大”举行第16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说，主席团认为应该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按照这样的标准，毛泽东着重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犯过路线错误的要不要选？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因为一个人在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不选他们，并不能保证不出差子，不翻筋斗。七次大会应接受过去的经验，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他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方针。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合作、团结。

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通过整风运动，全党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了比较一致和比较深刻的认识，到“七大”召开的时候，代表们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不愿选王明以及其他犯错误的同志进中央委员会。这与毛泽东长期强调的“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干部路线相悖。因此在选举方针的报告中，他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第二，要不要照顾各方面？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有许多根据地，各地有许多军队，这个事情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消灭山头，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新的中央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这样，我们的缺点就会少一点。

第三，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才选？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委员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不一定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即从集体求完全，而不是从个人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

毛泽东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在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毛泽东又解释了这样的中央岂不是太庞杂了，会不会落伍，会不会再犯错误，这样选是否不公平等问题。

毛泽东借鉴古代政治家的用人之道，提出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任人唯贤的政策。他善于根据斗争任务的需要，果断地组织干部队伍和建立领导核心；他长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广大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干部；他善于运用辩证的观点识别人才，并能用其人之所长；他具有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护人才，以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磨练人才的独特风格。

6月9日，“七大”举行第19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投完自己的一票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代表们投完票，开始唱票时，或三五人一起谈论着，或者在礼堂周围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而毛泽东还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认真听着监票人的唱票声。他心里很不平静。他最担心的是王明不能当选。尽管他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也反复强调要善于团结一切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但他不知道代表们是否接受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耐心地等待着，每当王明的名字增加一票时，毛泽东又稍微轻松一下，直至王明的票数过了半数，他才离开自己座位，加入同志们的谈论中。大会执行主席任弼时宣布中央委员名单，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一些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人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鼓掌。

10日，“七大”举行第20次会议，除了其他工作外，还要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在选举前，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他指出，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他特地提出王稼祥的问题。毛泽东说，在6月9日的选举中，王稼祥未能当选中央委员，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讲几句话，王稼祥是犯过错误的，但他是有功劳的，第一，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作为到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成员，是赞成和信任我们的；第二，对开好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以后在中央主持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毛泽东还提出，东北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其他新加上的候选人，也希望同志们选举时注意。

毛泽东讲完后，大会开始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也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七大”举行21次即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大会闭幕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要分赴

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接着，毛泽东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说，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最后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相互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最后，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执行主席彭德怀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等13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这是一个经过反复比较、反复选择的领导集体。毛泽东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众望所归，希望所在。他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成熟的标志。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正是这个党兴旺发达的反映。

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争取中国走上光明之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继续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70\_0365\_1.bmp}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愿望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1945年2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如何结束党治和改组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而蒋介石拒绝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要组织一个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4月2日，赫尔利也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

国共两党在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不同态度的鲜明对比，毛泽东在“七大”上对联合政府的具体阐明，使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他们纷纷发表意见，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对毛泽东是很大的鼓舞。

在国民党公开拒绝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后，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不仅设宴热情款待，把他们奉为上宾，而且先后同他们促膝交谈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和发展的种种问题。

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黄炎培坦诚相告，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



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到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话引人深思，它既是黄炎培本人观察社会，观察历史，观察人生的真知的见，又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听后，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用民主来打破历代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跳出这种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这种充满自信的见解给黄炎培，给其他人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带来了希望。

通过会谈，中共同黄炎培等达成共识，即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7月5日，黄炎培等离延安返重庆，毛泽东等到机场送行。

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从酝酿到提出，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他执著地为建立联合政府而呼吁，而奔走，而努力。尽管联合政府因国民党蒋介石的作梗而未能成为现实，但它毕竟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

## 四 民族曙光

战争是残酷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14）在人们心目中，战场上的战争，是残酷的，是悲壮的，是可歌可泣的。

殊不知，幕后的战争同样惊心动魄，这里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仍然充满着军事统帅的胆识、智慧、谋略的角逐。而军事统帅的细微不慎都将给战争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指挥战争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精雕细琢的艺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虽然没有到前线去放一枪一弹，也没有直接指挥一次战斗，然而，他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那炉火纯青的战争指挥艺术让人叹为观止，让人感慨万千，而让敌人，让对手胆战心惊。

还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毛泽东就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及战争的发展规律，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战争必然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科学的。

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到来后，特别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到来后，毛泽东面对这些变化，面对新情况，不能不思考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部署和怎样渡过难关，坚持抗战。他认为，为了坚持抗战，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1941年11月7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在新形势下我军对敌斗争的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毛泽东强调，由于敌人进行残酷的“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更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和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同敌人周旋。他要求每个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组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三部分。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主力军和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山岳地区一般是二比一；平原地区一般是一比一；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群众武装是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他们占人民群众中青壮年的大多数。

根据地的军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艰苦抗战，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抗战典型。位居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山西省沁源县军民在围困指挥部的指挥下，以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和伏击战，对沁源县城及其周围据点的日伪军展开了群众性的长期围困战，大量消耗和疲惫日伪军，迫使其两易部队，三次收缩阵地，最后被困于城西的山头上。1945年4月，被困日伪军不得不在沁源1000余日伪军接应下撤退。毛泽东利用这个典型来动员各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4年1月17日，他致电祝贺沁源县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胜利，指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大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毛泽东注视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科学地预测战争的进程和发展趋势。1942年8月，德国法西斯集中精锐部队100万，企图攻陷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指挥苏军进行艰苦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当这次战役激战犹酣之际，毛泽东即已敏锐地预见到这次战役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意义。10月12日，他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明确指出：“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

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预计，“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影响到毛泽东对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估计。

1943年1月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战争进程作公开的时间估量。他指示陈毅、饶漱石需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6月1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又指出：抗战还需准备三年，我党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需讲究最善方案。12月1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就目前国际形势下敌后的任务问题致电邓小平，指出，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的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毛泽东具体分析到，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6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日军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并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其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对蒋诱降政策，堵塞了蒋寻求妥协之门，给予归还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之势。德黑兰会议肯定美英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对日反攻相违背。时局对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毛泽东善于把握时机，迅速把战略相持转化为我军的战略反攻。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到1943年，各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困难，开始了恢复和再发展的局面。从1944年春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了局部反攻。为了在战略反攻时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毛泽东要求部队进行严格的整训。1944年8月22日，他与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常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要加强旅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五大项的学习。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毛泽东想得更深更远。由于我军长期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两地区抗战，抗战胜利后江南大片河山将轻易地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派部队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阳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尔后与广东东江纵队打通联系，并依托五岭山脉创建根据地的战略设想。

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从三五九旅抽调部队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等率领挺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10月31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南下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在这期间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在中央党校学习一个半月，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习敌后工作经验。10月25日，毛泽东到中央党校大礼堂给南下支队干部讲话。

毛泽东说，同志们，你们当中很多同志不久就要到前方去工作了。大家在学习中出了一个题目要我讲，叫做我们的总方针，从哪里讲起呢？我想先讲一点时局。

毛泽东从分析时局的变化开始，深刻阐述了抗战的形势，我们的任务和策略。他说，在中国，现在有两个东西：一个没有希望，这就是国民党。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腐败，经济衰竭，正在一天天垮下去；另一个大有希望，这就是共产党。中国要胜利，日本要赶走，中国人民要解放，只有靠我们。我们一天比一天壮大，不仅数量多了，质量也提高了，全国人民现在望着我们。同志们要到敌后去开辟工作，和你们闹麻烦的很多：第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国民党。对于国民党，你们不能气一上来就要打倒它，要照顾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大敌当前，日本人站在面前。

毛泽东强调，由于形势发展，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需要发展。所以我们就分别派人出去，头一批叫做湘、鄂、豫，就是粤汉、平汉这两条铁路。第二批是长江下游，第三批是山东，现在可以发展的根据地，还有很多地方，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胜利。

毛泽东反复指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一直到湖南，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

11月1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陕北的初冬，延河结着薄冰，被初升的太阳映得晶莹闪亮；宝塔山在淡淡晓色中，显得更加雄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部队。毛泽东向即将出征的将士讲了话。他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衷心地祝大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南下支队肩负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于11月9日告别延安，开始南征。南下支队像一把利剑直插南方。后来因为战局发生急剧变化而使原定南征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随后南下支队北返。至1946年9月27日重返延安。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欢迎大家的归来。这是后话。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抗战的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战略反攻的条件逐渐成熟。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他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战场的形势，明确指出：1945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在论述解放区在对敌斗争方面的任务时他特别强调，解放区军民的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毛泽东的号召化作巨大的力量，八路军各部队于1945年发动春季攻势作

战，共歼敌 5.7 万余人，收复县城 24 座，扩大解放区 8 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400 万。新四军发动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 3.8 万余人，扩大解放区 8 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40 余万，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捷报传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预感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1945 年 5 月，德国法西斯被打败。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从 5 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对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经过夏季攻势，对敌占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逐步取得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8 月 8 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从 8 月 9 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9 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沿 1200 里战线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战略后备队关东军大举进攻。8 月 6 日、9 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

8 月 9 日，就苏联对日宣战问题，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对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表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了加强对敌人的进攻，毛泽东指出，必须注意解放区的巩固工作，并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内战的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在这胜利来临的时候，毛泽东恨不能把一天当十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领导和将领。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 10 多个小时，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乒乓球台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

8 月 14 日，日本天皇宣布愿意放下武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全城沸腾，锣鼓喧天，爆竹齐鸣。当天夜晚，满山遍野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

9 月 2 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抗战的八年，是战斗的八年，是胜利的八年！

这八年，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是实践更加丰富的八年，是理论完全成熟的八年，是领导地位确立和巩固的八年。他在窑洞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思考；他构筑中国的大思路；他指挥千军万马，同日本侵略者，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殊死的斗争；他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既是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又是最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他领导全党清算教条主义，把

中国共产党建设成有全国影响的，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历史重任的党。窑洞纪录他的业绩，延河留下他的足迹，宝塔山矗立着他的丰碑……

胜利了，他登上宝塔山，欢庆的洪流尽收眼底。面对胜利，他在想，他在思考，他想到了过去，思考着明天。明天，仍然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日子，明天还有更艰巨的斗争在等待着他。

“今日长缨在手”，“缚住苍龙”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 注 释

### 第一章 奠基西北

在此之前已用电报和个别转告方式向团以上干部作过一些传达。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4 页。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9—50 页。

### 第二章 迎接抗日高潮

五项要求是：（1）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1）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3）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指马步芳、马步青。

指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回忆》，《解放军报》1978 年 12 月 28 日。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斯诺在中国》，第 283—284 页。

### 第三章 唤起全民抗战

《王稼祥选集》，第 141—142 页。

### 第四章 走向自由王国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41 页。

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25—826 页。

### 第五章 把握未来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31 页。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 年 12 月。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9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01 页。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41 年 10 月 8 日）。

王明：《学习毛泽东》（1940 年 5 月 4 日）《中国青年》第 2 卷第 9 期。

王明：《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1940 年 2 月 29 日），《解放》第 100 期。

指鲁迅。

湖南方言，意即说说过去的事情。

《解放日报》，1943 年 7 月 8 日。

(11)《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2 年 6 月 26 日）。

(12)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有发动反共宣传之可能等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3年4月30日)。

(13) 《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应刺激国民党等问题致周恩来并告林彪电》  
(1943年5月8日)。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



## 主要参考书目

- 《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
-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
-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中、下），档案出版社 1984 年 9 月、1985 年 7 月、1986 年 5 月版。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15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1992 年出版。
- 《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 《毛主席在陕北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吴吉清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毛主席在保安的故事》，白黎著，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 《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口述，赵骛整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 《毛泽东在陕北》，贺清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
- 《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册，高树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版。
-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 《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
- 《历史的回顾》（下），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 《回忆与研究》（上），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 《我的回忆》第 3 册，张国焘著，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
- 《青春的步履》，吴黎平著，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 《星火燎原》选编之三、四、五、六、七，战士出版社 1980 年—1981 年出版。
- 《周恩来传》（1898—1949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周恩来年谱》（1898—194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二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长征史》，李安葆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伟大的长征》，《伟大的长征》编委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长征在雪山草地》，朱成源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共中央在陕北》，赵振军、温瑞茂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杨云若、杨奎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50 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党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等刊物中的有关资料 and 文章。

